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现代前期文学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尽管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呈现衰落状态，但仍然是文学的主流，在整个世界文坛影响最大。同时，自然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的出现，又使文坛在丰富多彩中显得光怪陆离。无产阶级文学也获得了重大成就。亚非各国的文坛，则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上，突出了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统治和表现改良要求进步的两大主题。本书对这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发展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对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勾画，并重点介绍了主要文学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分析了主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原因。

世界现代前期文学史

一、概述

世界现代前期主要是指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这一历史时期。具体时间为 1870 年至 1918 年。

这一时期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世界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欧洲地区，在先后爆发了如法国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和英国 1832 年的“议会改革”等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于 1871 年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亦即本书所要论述的这一历史时期，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俄等国，其工业生产愈来愈集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国际市场，执行了一套侵略扩张、剥削压榨殖民地人民的政策，引起了被压迫人民或民族的反抗，同时也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无产阶级则以资本主义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开创者的姿态，继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在八九十年代又掀起了更加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相继成立。但工人阶级内部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化，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1889 年成立的第二国际，随着恩格斯的去世，领导权落入修正主义者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不得不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转移到俄国。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1917 年终于爆发了开辟人类新纪元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时期的欧洲，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在哲学思想方面出现了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和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国的泰纳（1828—1893）继承了实证主义哲学，用科学实验方法解释社会现象，把社会罪恶说成是由于种族、环境造成，从而否定了社会现象和精神活动的阶级内容。泰纳的决定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 19 世纪晚期，对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化思潮产生过重要影响。法国的柏格森（1859—1941）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代表，他反对泰纳的决定论，强调人的主观认识作用，认为只有通过非理性、非科学的直觉——不可言传的内心体验才能认识事物的实质，“真实”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这是一种反理性、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奥地利的弗洛伊德（1856—1939）的心理学，更把人的意识和一切社会活动，都看成是“潜意识”，特别是“性的本能”冲动的产物，文艺创作和一切精神活动也只是受潜意识支配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另外还有德国尼采（1844—1900）的超人哲学和叔本华（1788—1860）的悲观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也影响很大。尼采鼓吹意志的力量，蔑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宣扬极端个人主义，认为弱肉强食是一切生物的本性，他的思想被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和吸收，他本人也被法西斯主义者尊为思想先驱。叔本华否认社会 and 自然的发展规律，以“唯意志论”助

长了 19 世纪末的悲观主义思潮，后来也为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而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号召无产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自己的政权，进而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些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欧洲文学流派亦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另外还先后出现了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及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文学。同时，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也蓬勃发展起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 19 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世界文学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就是直至今今天仍有巨大的认识价值。

欧洲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及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期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以“真实地摹写现实”和让文学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唯物主义创作原则。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不回避现实矛盾和醉心远古题材，而是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无情批判统治阶级的丑恶灵魂；不满足于表现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侧面，而是力求广泛地表现充满复杂矛盾的整个社会和时代；不醉心于伟大人物或非凡人物的业绩，而是满怀激情地描写普通人的生活遭遇，比较广阔真实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具有相当的深度。马克思称赞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在艺术手法方面强调艺术的真实性，要求艺术按照生活本身的面貌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而不像浪漫主义那样，强调生活的理想、奇特、不平凡性。“忠实地再现现实生活”几乎是所有现实主义作家共同的创作原则。在人物塑造方面自觉地强调塑造既有共性又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并且把典型人物放在环绕他们的典型环境中进行刻画，即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另外，在景物描写、肖像刻画、心理分析、情节结构、人物语言、讽刺艺术、对比手法等方面，也都达到了此前艺术表现没有达到的顶峰。不过，由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大都站在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不甚了解无产阶级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且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作为批判的思想武器，因而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第 335—33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见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 2 卷第 416 页，时代出版社，1953 年版。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周扬译：《生活与美学》，第 107 页，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第 686 页，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性。如他们在深入揭露社会弊端时，又大力宣扬阶级调和、人性向善、博爱忍让等社会主张，既不满社会现状，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们不可能在黑暗的现实中找到光明的出路。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否定的形象，但没有肯定的答案。苦于没有结论的探索，使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不同程度地杂有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色彩。即使在艺术描写上，他们也常在描写典型环境时，只强调环境对人们的机械直观影响，看不到人物对环境的能动改造作用；在描写人物性格时，则常立足“善”与“恶”的斗争或“人性”与“兽性”的对比，不能真正剖析其历史阶级根源。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它的重要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欧洲 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由于各国历史情况的不同，大致以 1871 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前段主要在法、英等西欧工业进步国家比较兴旺繁荣，后段虽然在法、英等国出现衰落状态，但却在俄国、挪威、意大利等东欧、北欧、中南欧国家取得了很大发展。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司汤达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被称为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被看作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巴尔扎克由 96 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如《嘉尔曼》（1845）、大仲马与小仲马的社会小说《基督山伯爵》（1844—1845）和《茶花女》（1848），以及 40 年代雨果和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兼有的《悲惨世界》与《包法利夫人》等，把批判现实主义推向繁荣阶段。在法国的影响下，英国也很快掀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杰出作家作品有狄更斯和盖斯凯尔夫人及其《艰难时世》与《玛丽·巴顿》，以及爱米莉·勃朗特与夏洛蒂·勃朗特及其《呼啸山庄》和《简爱》。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及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尖刻、激烈，具有较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此时期德国、匈牙利和丹麦也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这一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正是本书所要论述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虽然总体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呈衰落状态，作品的批判力量普遍比前期减弱，但仍然是其文学的主流，影响最大，并且在一些地区还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在西欧的法国，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左拉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有较突出的成就。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中篇小说《羊脂球》、长篇小说《漂亮的朋友》，左拉的长篇小说《萌芽》等，对第二帝国统治下的社会罪恶进行了揭露，左拉还大胆地反映了极端尖锐的劳资矛盾。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对帝国主义时代反动势力的猖獗和精神文化的堕落大加抨击。在英国，哈代、伏尼契的长篇小说，肖伯纳的剧作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哈代的《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等，对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农民的流离破产和社会的黑暗残暴，进行了深入描绘与揭露。肖伯纳的《鳏夫的房产》、《巴巴拉少校》等剧作，揭露了资产者的虚伪寄生和垄断资本家的凶恶残暴。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这一时期才繁荣起来，出现了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等作家。但是由于这些作家不了解或惧怕无产阶级革命，并受到唯心主义哲学、自然主义和颓废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虽然揭露批判社会黑暗面，但不能正确地揭示社会矛盾，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

在中欧、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各国，随着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形成和发展起来，特别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及保加利亚等国。在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培尼托·贝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的《民族演义》（1873—1912）共有46部之多，全书以19世纪西班牙资产阶级五次革命为背景，从1805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入侵开始，到1875年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封建势力复辟为止，展示了19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面。维森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的《茅屋》（1898）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地主压迫下，西班牙农民的悲惨命运。伊巴涅斯的《启示录四骑士》（1916）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暴露德意志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在欧美很受欢迎。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北欧和俄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北欧的挪威，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易卜生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法律、妇女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虚伪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同时比较生动地描绘出了挪威中小资产者的心理面貌，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作品，代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托尔斯泰继承了西欧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并有新的创造和发展。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社会画面开阔，生活内容丰富，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教会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反映了1861年至1904年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特点及威力与局限，表达了农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情绪。但他又是个充满矛盾的作家，他的博爱思想和宗教观念是他作品的突出特点。契诃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等对社会丑恶现实的讽刺与揭露具有一定深度，但他的忧郁与伤感，正反映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前夕这一代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所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尔基的出现才把俄国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欧洲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和象征主义文学的出现，使欧洲文坛丰富多彩中又显光怪陆离。自然主义文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并很快传遍欧美。其中法国作家左拉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在《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小说家》等论著中，倡导小说家应像医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把人和人和社会当作病例或生物来解剖与实验，以找出遗传因素在不同环境和时代中的表现。根据这种理论写成的作品，总是着重对生活琐事、变态心理和反常事例本身的详细描写，缺乏对社会的艺术概括，

以至模糊歪曲事物的本象，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但左拉的大量作品并不完全符合他的理论，有的如《萌芽》、《金钱》等基本上是现实主义著作。较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有法国作家爱得蒙·龚古尔（1822—1896）弟兄的中篇小说《翟米尼·拉赛特》（1865）、瑞典作家斯特林堡（1849—1912）的剧作《朱丽小姐》（1888）、英国作家毛姆（1874—1965）的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等。自然主义对当时欧洲文坛影响较大，法国的莫泊桑、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人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其影响。80年代末，在德国还产生了以史拉夫和霍尔茨为代表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前苏联十月革命后，自然主义文学走向衰落。唯美主义文学也最早产生于60年代的法国，并很快得到英、法、德等国一些作家的响应。他们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反对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代表作家有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但丁·迦百利·罗塞蒂（1828—1882）、法国的泰奥菲勒·戈蒂耶（1811—1872）等人。象征主义文学也同样最早出现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国，且很快传遍欧美，形成一种跨世纪的文学流派。象征主义文学以主观世界来象征客观世界，主张以一种隐晦的、谜语式的诗歌语言来感知超现实的理想世界。它抛弃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反对如实描写客观世界，反对作家明确表现自己思想，要求作家逃遁到奥秘的个人内心世界中。如法国作家梅里美（1842—1889）、魏尔兰（1844—1896）和兰波（1854—1891），在自己的诗作和论文中，把诗歌表现为梦幻、神秘的世界，认为“诗是一种神秘”，只有“叫读者走进梦幻世界，这才是诗的真义”。另外，这一时期有些作家还为强权政治服务。如法国的巴莱斯、德国的李林克隆，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歌颂强权，宣扬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英国的吉卜林还把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说成是白种人的“神圣义务”等。

这一时期，欧洲无产阶级文学也获得了重大成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产生的巴黎公社文学，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与斗争精神。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参加者在公社诞生前后20年间所写的大量诗歌、小说和散文，它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其中欧仁·鲍狄埃（1816—1887）是其杰出代表。鲍狄埃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他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公社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创作的《国际歌》传遍全世界。《国际歌》以坚定不移和高瞻远瞩的革命气概，在揭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指出一切阶级调和都是虚妄幻想和劳动人民全靠自己救自己的基础上，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武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创建国际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国际歌》以其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杰出的艺术水平，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将来，都将教育和鼓舞着革命人民，并永远载入革命史册。公社文学重要者还有小说家列昂·克拉代尔（1835—1892）及其《独眼》、《雅克·拉塔斯》等；茹尔·瓦莱斯（1832—1885）及其自传体小说《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等。无产阶级文学在其它国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

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俄国后，在俄国出现了以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1863—1949）、别德内依（1883—1945）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高尔基的《海燕》用象征手法，以暴风雨象征革命，以大海、波浪象征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以风云雷电象征反动势力，以海鸥、海鸭、企鹅象征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以海燕象征革命者，反映了波澜壮阔、气势浩大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图景。他的《母亲》（1906）则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它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无产阶级文学以其社会描写的空前深度和广度正式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并逐渐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现代前期的亚非国家，除日本外普遍遭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与奴役。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其它大多数的亚非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时期。如随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等国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分别沦为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殖民地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南、朝鲜也先后沦为法国和日本的殖民地，19世纪的30到50年代，伊朗、埃及和中国等国也沦为半殖民地。这样，就使这些国家本来在其封建社会内部已产生了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受到挫折或被迫中断，社会发展受到阻滞，人民遭受欺凌。面对此情，这些国家中逐渐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所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如中国、印度、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等。而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则对西方侵略势力从妥协投降发展到与他们相互勾结来共同镇压本国人民。但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与斗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帝国主义者对亚非地区的重新瓜分和对人民剥削的加重，亚洲各国人民继承过去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其中重要者如越南安世农民的反法起义（1887—1913）、朝鲜甲午农民战争（1894—1895）、中国义和团运动（1900—1901）、印度人民运动（1905—1908）等等，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高潮。与此同时，非洲地区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人民群众，也都英勇地展开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可以说，亚非各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不断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过程。这一斗争对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亚非国家的文学在继承其传统的基础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首先，表现亚非人民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生活是其重要主题。其次，在文化启蒙思想运动推动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如阿拉伯、伊朗、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文学家和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另外，明显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为

了达到借鉴和推动本民族文学发展的目的，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少翻译介绍与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与著作，从而推动了本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堪称世界一流的作家与作品。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要求社会改革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如号称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的大批诗歌，描写了一系列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一些诗歌还描写新事物、新文化，要求社会进步。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以大量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诗歌散文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及改良运动，曾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严复是个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较深的作家，他猛烈攻击君主制度，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其作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特别是他以谨严的古文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形成别具一格的散文，对传播新思想和东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另外，章炳麟、秋瑾等资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战斗性与鼓动性，对推动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由于其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所以与其它国家多有不同，其文坛派别众多，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等流派都有，进步的、民主的文学在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是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批判了日本官僚社会的腐朽、卖国求荣知识分子的卑鄙无耻以及小市民贪财附势的庸俗心理，反映了民权运动后知识分子的苦闷迷惘。森鸥外的小说《舞姬》又为日本近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开拓了道路。岛崎藤村是此时期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破戒》、《春》、《家》等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有力地批判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残余思想，提出了人权解放的民主要求，是维新思想的反映。特别是此时日本文坛上异峰突起的夏目漱石，他的《我是猫》等作品，以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了明治社会的丑恶，与自然主义倾向现实主义的作品，汇成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推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

此时期的印度文学，随着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大批成熟的作家及其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散文、戏剧与非宗教性的诗歌。他们认识到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的重大危害，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般金的历史小说在某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虚构与夸张，并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表现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思想感情。弟那般豆的戏剧同情劳动人民疾苦，反对剥削压迫，对印度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闻名于世的诗人泰戈尔，创作了大批反对殖民统治，要求国家独立强大的小说与诗歌。他的诗集《吉檀迦利》（1913）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他产生世界级的影响。

此时期的阿拉伯、伊朗及东南亚诸国的文学也在反对殖民统治与文化改

良的影响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 世纪下半叶，在阿拉伯诸国掀起了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运动，并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使其作品民族意识空前加强，但也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影响。埃及著名爱国诗人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是此时阿拉伯诗歌复兴运动的急先锋。他的诗歌强烈地表现了对外国统治者的愤恨和对祖国命运的忧伤，给阿拉伯诗歌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诵。黎巴嫩诗人易卜拉欣·雅齐吉、叙利亚作家艾迪卜·伊斯哈格等人的作品也具有这一特点。另外，辽出现了一批教育家和翻译家如埃及的塔哈塔威、黎巴嫩的苏莱曼·布斯塔尼等人，给阿拉伯文坛带来了新的思想气息。伊朗在这一时期曾发生了改良主义运动和立宪运动，在文学方面也进行了一场革命。阿洪德扎德最先提出文学要改革，他认为过去的东西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创作适合人民口味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著名诗人巴哈尔积极参加立宪运动，他的诗作揭露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拯救祖国。德胡达是立宪运动刊物《天使号角》的主要撰稿人，他的清新活泼、尖锐泼辣的文章也具这一特色。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涌现出了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杰出作家。如菲律宾的黎萨尔、越南的阮庭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黑非洲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上口头传说比较多，其现代文学或作家文学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诞生。由于非洲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所以其文学领域里产生了既有理论又有作品的反对殖民同化、维护民族特色的文化运动。西非著名诗人，塞内加尔的文化活动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提出与殖民同化论相对抗的“黑人性”理论，对发展维护民族文化起过巨大作用。非洲文学创作由于外国入侵等原因，造成既有民族语文学（如：豪萨语、斯瓦希里语、默里纳语、克列奥尔语文学等），又有欧洲语文学（如法语、英语、葡萄牙语文学等）。两者都属非洲文学。列涅·马兰（1887—1960）是塞内加尔用法语创作的安的列斯作家。他的《巴杜阿尔》（1921 年获龚古尔奖）真实地描写了殖民主义者的所谓“传播文明”，实质上是强盗式的掠夺和残酷无耻剥削的罪行。其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对塞内加尔以及西非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马兰《巴拉杜尔》所奠定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塞内加尔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桑贝内·乌斯曼那样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著名作家。非洲地区在现代前期只是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起步期或奠基期，到了现代后期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达到成熟和繁荣期，但前期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美国建国时间不长，其文学以 1776 年独立为起点，至今才有 200 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加之受欧洲文学的明显影响，所以其文学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其南北战争（1861—1865）以前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是为主流。代表作是惠特曼的浪漫主义诗歌《草叶集》。进入 19 世纪下半叶，由于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社会弊病日趋明显，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思

潮的影响，所以人们的幻想美梦被打破，逐渐重视起社会现实来。美国文学也开始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美国作家已摒弃了同时代如豪威尔斯（1837—1920）等人宣扬“美国梦”的论调，对美国社会采取了一种揭露与批判的态度。其中著名者有马克·吐温、欧·亨利，以及赫·加兰的《大路》（1891）、斯·克莱恩的《街头女郎梅季》、弗·诺里斯的《章鱼》等。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侵略扩张、南部蓄奴等进行了揭露批判。他的短篇小说《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1870）暴露了所谓“人人平等”的美国对华工的迫害，《竞选州长》（1870）揭穿了美国的假民主。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批判内战后美国政治上的腐败现象和弥漫全国的“投机”风气，具有一定的深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将追求自由与解放黑奴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描写一个白人孩子哈克与黑奴吉姆结伴逃亡的故事，展现了社会的野蛮黑暗及作者的种族平等思想。欧·亨利是闻名世界的短篇小说家，他善于在平凡的生活发现突出的人和事，构思巧妙。如他的《麦琪的礼物》写一对贫穷夫妇之间真挚的感情，构思出人预料又在情理之中，十分脍炙人口。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1902），揭露了美国在拉美推行殖民政策、进行掠夺的罪行。进入20世纪初，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弗·诺里斯的论文集《小说家的责任》（1902）系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杰克·伦敦的作品，代表了20世纪初美国文学的新成就。他的中篇成名作《荒野的呼唤》（1903）描写一只从城市卖到北方寒冷地区的狗，表现了对强者生存观点的推崇，但涉及到人世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强权政治。小说集《北方的故事》描写美国北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教育的各种人物，把原始纯朴的北方大自然与资本主义都市文明中的腐化堕落作了对照。社会小说《马丁·伊登》（1909）有作者自传的性质，它通过水手马丁的追求及其幻想的破灭，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冷酷与空虚，同时也表现有才能和正义感的作家的悲惨命运。这些都显示了美国文学虽然发展历史比较短，但由于受到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流派的明显影响，加之本国科技文化的发达，使其文学名符其实地跨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

综观世界现代前期文学，欧美各国是一个重点，文学流派纷呈，名家名作层出不穷，同时亚非各国也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统治与表现改良要求进步是其两大主题，从而共同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是为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

二、世界现代前期的欧洲文学

1. 概述

19 世纪末，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20 世纪初，随着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所产生的尖锐矛盾，形成了以德、奥、意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并于 1914 年至 1918 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虽然“协约国”一方取胜，但也大大削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加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产阶级的觉醒，终于在俄国爆发了十月（公元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917 年 10 月 25 日）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政权。

世界历史的这种发展和社会的剧烈动荡，对欧洲文学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造成这时期欧洲文学主潮已不象其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交替发展，独领风骚，而呈现多元化发展倾向。重要者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其中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虽然仍占据重要甚至主导地位，但现代派文学也已产生并呈兴旺之势，为下一时期现代派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无产阶级文学亦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出现起了开先河与被借鉴的作用。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从欧洲文坛整体看，呈现出衰落之势，批判力度已不如其前。但由于它和其它类型现实主义一样，始终坚持唯物论的认识原则和文艺是客观现实再现的美学思想，不仅正确地概括了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具有社会认识价值，而且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审美结构与社会功能，能继续前进，所以仍涌现出不少著名作家与作品，仍不失为欧洲文坛的重要文学流派。如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策源地法国，有左拉及其《萌芽》等，莫泊桑及其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等，罗曼·罗兰及其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英国有哈代及其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等，肖伯纳及其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等，伏尼契及其长篇小说《牛虻》等；德国有台奥多尔·冯塔诺及其长篇小说《暴风雨前》、《艾菲·卜利斯特》等，亨利希·曼及其小说《垃圾教授，或名一个暴君的末日》、《小城》等，托马斯·曼及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等。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北欧、中欧、东南欧和俄国，有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及其剧作《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波兰作家玛丽亚·柯诺普尼茨卡（1842—1910）及其长诗《巴尔采先生在巴西》等；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1850—1921）及其长篇小说《轭下》等；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及其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及其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等。这些作品通过对客观真实的真实反映和对典型人物的塑造，

继续深入地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矛盾及腐朽落后。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因其形象地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整个欧洲大陆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被誉为欧洲大陆的社会史诗。肖伯纳的《巴巴拉少校》等无情地批判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凶残与虚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及教会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反映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家虽然不同程度地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改良主义、悲观主义等思想倾向，但他们均不满资产阶级黑暗统治，同情普通百姓疾苦，有的人还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靠近或迈入了无产阶级阵线。如罗曼·罗兰与巴比塞等人。他们有的塑造出了全新的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而战的革命战士形象，描写了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者的觉醒与成长，有的人如罗曼·罗兰还将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总之，这一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继承了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矛盾，具有很高的认识意义与文献价值。

现代派文学，又称现代主义文学，它是一种反传统、反理性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它的成熟期和真正形成期应该在世界现代后期和当代时期，但溯其源，世界现代前期或更早一些已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意识流，在世界现代前期已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奠基性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体现了此一时期文学流派的多样性。法国作家梅里美、魏尔兰和兰波等人，在自己的诗作和论文中主张以一种隐晦的、谜语式的诗歌语言来感知超现实理想世界，认为诗就是一种神秘，只有叫读者走进梦幻世界，才是诗的真义。1886年9月15日，法国诗人让·莫雷亚斯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正式提出象征主义的名称，奠定了现代派文学的基础，标志着现代派文学的起点。在法国象征主义影响下，又出现了比利时诗人爱弥尔·维尔哈伦（1855—1916）、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及其《青鸟》（1908），德国剧作家盖尔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及其《沉钟》（1897）等一批象征主义文学家及其作品。紧接着表现主义也在欧洲取得了较大发展。瑞典的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被认为是欧洲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三部曲《去大马士革》（1898—1904）是欧洲最早的表现主义戏剧。其代表作《鬼魂奏鸣曲》（1907）让死尸、亡魂、活人同台演出，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敌视与倾轧，达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表现主义在小说领域的最杰出代表是奥地利的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他的小说《审判》（1914—1918），以象征手法写一个银行职员无缘无故被秘密法庭宣布逮捕，求情和抗辩都无效果，最后竟被秘密处死，揭露了奥匈帝国官僚制度专横暴虐、人权无保障的社会现实。表现主义戏剧语言短促而不连贯，内容荒诞离奇、结构散乱、情节突兀变化，对后起的荒诞派戏剧有重大影响。意识流小说在此时期也已产生并得到发展。英国女作家

恰瑞生的《尖尖的屋顶》(1915)是首次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小说。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是意识流小说的重要作家。他的15卷本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出版于1913年,通过主人公对40年往昔岁月的回忆,唱出了没落阶级的挽歌。其后的意识流文学实肇造于斯。

现代派文学的某些表现形式在此期的出现与发展,是与欧洲当时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及科学技术等密切相关的。社会方面当时欧洲屡发战争,统治黑暗,百姓穷困,人们的精神受到巨大创伤,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崇尚理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在现实面前碰的粉碎,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非理性”、“反理性”的现象,普遍存在悲观失望情绪。这就为现代派文学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哲学思想方面,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法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奥地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宣扬本能、意志、直觉、潜意识等观点,对现代派文学的反理性主义起了推动作用。另外,此时欧洲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推动了其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对现代派文学更起了一种催化剂作用。如科技的注重实验、事实和精密准确的方法,被文学家利用来描述社会人生。首先是现实主义作家利用此方法反映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描述其间人的心理畸型和变态,但这种畸型变态的心理原因和细致感受,则是现代派文学作了描摹,从而促进了现代派文学的产生发展。

此时的无产阶级文学也在欧洲革命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形势下发展了起来。在此前英国宪章派文学和法国革命诗歌是无产阶级文学的雏形,此时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而产生的巴黎公社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中法国无产阶级诗人鲍狄埃是代表人物。他的《国际歌》(1871)以恢宏博大的气概,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创建共产主义。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可永彪史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心转移俄国,在俄国出现了以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海燕》和长篇小说《母亲》等,以其对社会描写的空前深度与广度,至今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了其后社会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进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 法国文学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是法国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向发达阶段转变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秩序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法国日趋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其具体表现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改革的深化,资本主义文明的建立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870年爆发了普法战争,结果以拿破仑三世当了俘虏、法国惨败而告

终，从而使拿破仑建立的第二帝国在法国的 20 年统治结束。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巴黎人民，面对入侵者和腐败政权，掀起了反抗的热潮。自普鲁士入侵法国后，巴黎 30 万工人组成了国民自卫军直接展开武装斗争。经过几次武装起义，终于在 1871 年 3 月 18 日赶走了反动军队和反动派头子梯也尔，解放了巴黎全城，建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巴黎公社。但公社力量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于同年 8 月又被反动势力所打败，梯也尔成为共和国总统，开始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这段时期在法国的历史发展中充满了屈辱与丑闻，被称作“不光彩的共和国”时期。但又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海外殖民不断扩张，资产阶级政治趋于稳固并走向制度化，社会改革不断深入的时期。与此同时，还有社会主义力量的稳步发展与政治生活的左倾趋向。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钢铁生产量的猛增，新兴工业如铅、钠、化学工业的兴建，铁路、远洋运输的发达，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等。社会变革诸如议会制度建立，允许集会与集社，出版言论自由，教育与宗教信仰改革等。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发展，第二国际的成立，工人党党员获得众多议会席位等。

在这种形势下，表现在文学方面就是全面发展，普遍繁荣。曾兴盛于欧洲地区甚至美洲地区的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发源地就是法国。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书被认为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又被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紧接着由 96 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与《茶花女》的作者大仲马、小仲马等人的出现，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繁荣期。学术界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称作法国乃至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前期阶段。后期阶段指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

纪初期这一时期，亦即本章本书所论述阶段。这一阶段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呈现衰落状态，但仍是法国的主要文学流派，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作家与作品。如左拉及其由 20 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家族史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是法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宏伟巨作之一。其中《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等都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杰作。莫泊桑的出现意味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艺术达到了世界高峰，他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中经典性的名著比比皆是，使他成为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的“短篇小说之王”。他的长篇小说如《一生》、《漂亮朋友》等也是在这个时期步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杰作。都德的短篇小说中有《最后一课》、《柏林之围》这样不朽的传世名篇，他的长篇小说《小东西》成为法国文学中经典性的名著，他富有特色的艺术风格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园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罗曼·罗兰更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作家。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誉为 20 世纪第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和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他也因此而获得 1915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全面广泛地反映了法国的社会

现实，但由于受作者思想认识和阶级的局限，以及自然主义的影响，批判力度不如前期，有时流露悲观主义情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前期比较，这一时期法国现实主义处于衰落期。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龚古尔弟兄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他们弟兄的《勒内·莫普兰》、《热曼妮·拉瑟顿》等小说，写社会下层、写病态，把生理学引入文学描写，亦是写实文学的一种新演变与发展。左拉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如《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家》等，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备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左拉的理论 and 创作实践是互为矛盾的。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于 19 世纪 40、50 年代的法国，成熟于 80 年代。其代表人物有梅里美(1842—1889)、魏尔兰(1844—1896)和兰波(1854—1891)。后期又出现了莫雷阿斯、雷尼埃、萨曼·雅姆斯等象征主义诗人。这一文学流派有理论有作品，不仅在法国有较大影响，而且对世界文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这一时期法国文坛还出现过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亦对世界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界文学史上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巴黎公社文学亦发生于法国。它主要以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为契机，包括了其后 20 多年公社成员所创作的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欧仁·鲍狄埃及其《国际歌》。另外还有瓦莱斯、克莱芒、米歇尔等人。它同样对其后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法国文学的全面繁荣，不仅表现在文学流派众多，杰出作家作品不少，而且从文学形式看，小说、诗歌、戏剧、评论各个类别都取得了全面发展，各类别中风格特点呈多样化。如小说中，除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外，还有心理小说、异国题材小说、哲理寓言小说等。每种倾向小说中又聚集了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心理小说中不仅有布尔热，而且还有弗罗芒丹、普雷沃、埃尔维欧等；异国题材小说中也不仅有洛蒂，还有法雷尔、夏夫里戎、贝尔特朗等一批后继者；实证主义理论批评中不仅有泰纳，还有法盖、布吕纳介、郎松等一个强大阵容。这样就为现代后期法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左拉及其长篇小说《萌芽》

爱米尔·左拉(1841—1902年)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流派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作品反映了 19 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社会历史，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由于他创作与世界观方面的矛盾，使他的作品亦呈现出某种矛盾。如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又对这种制度表现出某种赞赏。

左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工程师家庭，7 岁丧父，家境贫寒。他勉强读完中小学后，即为生计到码头做工。1862 年又到巴黎图书出版公司当包书工，不久升任广告部主任。此间他结识了不少文艺界名流，引发他进行文学创作。1864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初获成功。1865

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柯劳德的忏悔》。他这些早期作品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后来，他逐渐对现实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泰纳的环境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遗传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理论。他在1880年至1881年连续发表的《实验小说论》、《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家》等文艺评论著作，全面论述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并成为这一流派的领袖人物。他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并且在毫不掺杂主观意念的情况下，照像式的记录现实生活。显然这种理论抹杀了文学的思想性，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等同起来，否定了文学的思想意义与社会作用。

但左拉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他强调深入生活，所以在创作实践中往往现实主义占了上风。他受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写成了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该书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组成。从第一部《卢贡家族的家运》（1871）到最后一部《巴斯卡医生》（1893），整整花去20年时间。全书将卢贡家族5代32个成员安排在社会各个阶层，并让他们充当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1852—1870）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左拉自己及一些评者称此书为“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其中又以《萌芽》（1885）与《崩溃》最为重要。《崩溃》（1892）描写的是第二帝国的灭亡及巴黎公社起义等内容。作者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描绘，揭示了拿破仑三世溃败的原因。对巴黎公社社员的街垒战斗充满同情，但对巴黎公社理想的描绘还不够深入。

完成《卢贡·马卡尔家族》这部巨著后，左拉又写了《三大名城》三部曲：《卢德》（1894）、《罗马》（1896）和《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在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另外还写了不少高质量的中短篇小说，如《磨坊之役》（1880）便是世界公认的名著。《磨坊之役》热情讴歌了法国人民在普法战争中誓死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

1898年，左拉写了《我控诉！》一文，为被政府诬陷的德莱福斯大尉主持正义，招致政府迫害，流亡英国伦敦。一年后返回，可惜过了3年即因煤气中毒身亡。

《萌芽》是左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的取名源自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月份，此时正是法国大地回春、种子发芽的时期，以此来象征觉悟的工人犹如种子，将在土地中萌芽壮大，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正如作者在此书草稿中所写：“这部小说是表现了工人的愤怒。是对社会的一个冲击，使社会为此而震动。总而言之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宣告将来，提出一个将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问题。”

《萌芽》描写的是发生在蒙楚煤矿公司的一次罢工运动。当时资方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降低工人工资，从而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

工运动。其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是艾坚·郎杰。艾坚·郎杰是马卡尔家族后代，是个机器工人，因酒后打了工头而被解雇。失业后郎杰又到服娄煤矿当推煤工。矿下劳动条件极为恶劣，资本家为克扣工人工资又在挖煤工人与推煤工人之间挑起事端，企图分裂工人队伍。郎杰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了罢工运动。资本家采取了饥饿与镇压以及种种欺骗分化手段，致使罢工运动失败，工人又不得不重新下井。但就在复工的第一天，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为了和郎杰争夺领导权，竟暗中矿坏矿井的排水设备，使整个矿井被淹没。郎杰也被陷在了井下。当郎杰被抢救出来以后，他在可能派赖塞纳胜利的笑声中，否定了暴力革命，离开矿场，到巴黎找布郎基主义者普鲁砂去进行议会斗争去了。小说中的工人领袖艾坚·郎杰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人物，他对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十分愤慨，对旧世界的必然灭亡，工人阶级管理机器和矿场时代的到来坚信不移，但他对罢工的方向理想却是十分模糊的。因此他在罢工的关键时刻显得软弱无力，手足无措。这也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萌芽》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矿工劳动和生活的凄惨状况。如马安一家 10 口人挤在一间只有 4 张床的小屋子里，睡觉只能轮流替换。全家早晨 4 点钟起床，男的挖煤，女的推煤。井下是高温、瓦斯气、地下水，条件极为恶劣。推车的女工在狭窄的坑道里不得不跪着往前推。马安一家最后差不多都死光，只剩马安嫂为了养活幼儿还在推煤。马安一家的遭遇，代表了广大矿工的悲惨遭遇。

《萌芽》还歌颂了广大矿工团结友爱、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高贵品质。他们对剥削者同仇敌忾、坚决斗争、英勇不屈，在井崩时互相帮助，充满正义感和同情心。而富有者却弱肉强食、腐化淫荡，过着寄生虫生活。

《萌芽》在艺术特色方面感情充沛，结构完整，描写细腻。如对马安嫂一家悲惨遭遇给予深深的同情，对他们的艰难生活进行了详细刻划，同时还还将马安嫂两个面黄饥瘦的孩子与大股东格雷歌亚健康美丽的珊茜尔作了对比描写，安排巧妙，形象地表明资产阶级幸福建立在剥削工人之上。

《萌芽》真实地反映了第二帝国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劳资冲突以及工人的贫困生活及他们的斗争，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无产阶级斗争的小说。其中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工人阶级形象，但同时又因为作者受自然主义等的影响，过分强调人物的动物本能，使人物表现出某种不足甚至丑化现象。如主人公郎杰总体看缺乏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思想和气质，不少工人又常被写成一群粗鲁、愚昧、盲目的乌合之众，表现出作品的局限性。

（2）莫泊桑及其短篇小说《羊脂球》

基·德·莫泊桑（1850—1893）是 19 世纪后期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闻名世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出身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没落贵族之家，在卢昂中学上学时就爱好文学，练习写作。1870 年进入大学法律系，适逢普法战争爆发，同年 7 月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小职员。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写作，并拜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为师。福楼

拜教他敏锐观察事物的方法和不落窠臼的文笔。80年代，莫泊桑又与侨居法国的著名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多所交往，向他学习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如谋篇布局、叙事抒情、典型提炼、细节刻画、流畅文笔等。这些文学大师的帮助指导，对莫泊桑创作的走向成熟起了重要作用。莫泊桑早年曾有诗集《墙》和《水边》等，但没什么反响。1880年4月，他的第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短篇小说《羊脂球》在左拉主编的小说集《梅塘晚会》上发表，使他一举成名，并从此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他的绝大部分传世之作就是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期间创作的。其中有中短篇小说350多篇，长篇小说6部，游记3部，文学理论和政论文章若干。1890年后莫泊桑重病缠身，加之又吸毒并患有精神病，终于1893年7月6日在一所精神病院里去世，年仅43岁。

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主要以短篇小说创作最为突出。其中从题材方面来看，又以反映世态炎凉，讽刺拜金主义；同情劳动人民疾苦，赞扬他们的淳朴正直品质；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等方面为主。

反映世态炎凉，讽刺拜金主义与虚荣心的作品主要有《我的叔叔于勒》、《项链》、《一家人》、《老人》等。《我的叔叔于勒》写哥嫂一家日夜盼望从美洲发财归来的弟弟于勒，而一旦发现他穷得在火轮上卖牡蛎，就赶快躲开，唯恐被认出而受牵连。小说反复渲染哥嫂一家盼望的殷切心情，造成悬念，而弟弟一旦出现，故事却急转直下，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描写得活灵活现。

描写百姓困苦，歌颂他们淳朴正直品质的作品有《归来》等。《归来》主要写水手马尔丹出海遇险12年未归，妻子携带孩子苦等10年未见，不得已同渔夫韦司克结婚，且又生有孩子。12年后马尔丹回来，前夫、后夫、马尔丹大妈会面，表现了互敬互谅的品质。

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爱国情绪方面的作品，是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精华。如《羊脂球》、《蜚蜚小姐》、《两个朋友》、《米龙老爹》、《索瓦热老婆婆》等均为名篇。莫泊桑在这些作品中控诉了普鲁士侵略者的罪行，讴歌了下层人民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壮举。《蜚蜚小姐》写妓女拉赛尔刺杀敌军少尉的动人故事。侵略者普军军官对法国妓女拉赛尔等进行野兽般的玩弄和欺凌，并任意对法国和法国人民进行诽谤。拉赛尔怒火中烧，瞪眼望着一位绰号叫“蛮蛮小姐”的普军少尉大喊：“法兰西的妇人，你们休想弄到手，我是个妓女，对普鲁士人用这个来对付就足够了。”说罢用一把水果刀插入蜚蜚小姐脖颈，自己乘乱逃脱。《米龙老爹》则写米龙老爹不甘心普军的野蛮侵略，勇敢地杀死了16个敌人的英勇壮举。这些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分别是《一生》、《漂亮朋友》、《温泉》、《皮埃尔和若望》、《像死一般坚强》、《我的心》等6部。其中主要是揭露统治集团内部腐朽、贪婪、尔虞我诈、荒淫无耻生活及第三共和国的黑暗政治内幕等。总体看不如短篇小说影响大，但其中《一生》、《漂亮朋友》等也被

列入世界名著之林。

短篇小说《羊脂球》是莫泊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以普法战争为背景，描写 10 个乘客同坐一辆马车出逃的沿途表现。这 10 个乘客中有 3 对上流社会夫妇，2 个修女，1 个民主党人和 1 个名叫羊脂球的妓女。他们出逃时只有羊脂球带有食物，羊脂球将食物分给大家共同享用。后车到多特小镇，大家住进了一家旅店。当地一个普鲁士军官以扣留众人为要挟，要求羊脂球与他过夜，遭到具有爱国心的羊脂球的拒绝。而同伴出于自身考虑，软硬兼施，迫使羊脂球违心地答应了敌军官的要求。可第二天上路后，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却把羊脂球当为贱货，连话也不和她说，并自己吃着各种食物，将羊脂球饿在一边。

《羊脂球》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是围绕旅店里羊脂球是否答应敌军官的要求而展开。在同车的旅伴看来，羊脂球是个妓女，与人睡觉应该不成问题，但羊脂球却不答应。她不答应就危及同伴的安全，故事也就起了波澜。作者正是在这种波澜中刻划了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羊脂球虽然是个妓女，但她具有乐于助人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她有强烈的爱国心，她对敌军官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而那 3 对上流社会夫妻，一个个道貌岸然，实际出逃是为了躲避战争、转移财产和发国难财。他们劝说羊脂球也是为了自己能脱身上路。至于那个民主党人更活脱脱是个夸夸其谈、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and 色鬼。他们地位比羊脂球高，爱国高调唱得比羊脂球响，可一到关键时刻就暴露出了其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本性。作者用这种对比描写的手法，揭示了所谓的上流人物，在大敌当前，连个妓女也不如。从而通过一个侧面，比较生动地反映了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社会风貌，以及各阶层人物的立场态度。

《羊脂球》以一个简单的故事，概括反映重大社会主题，可看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首先，作者善于精心挑选故事给予高度概括和典型化，从而反映重大主题并赋予各个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其所属阶级党派的共性特征。其次，作者非常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如羊脂球将所带食物分给同伴享用和那些上流社会人物顷刻食尽的细节描写，既反映了羊脂球乐于助人的品质，也有力地揭示了那些正人君子的虚伪与贪婪。《羊脂球》的艺术成就，代表了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擅长于从平凡小事中提炼概括重大主题，以及题材丰富多样，构思新颖精巧，人物唯妙唯肖，语言生动活泼等艺术风格。

（3）罗曼·罗兰及其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又是反帝、反法西斯的文艺战士。他出生于法国尼埃夫尔省一个小城克拉姆西，在故乡度过了童年。15 岁时随父迁入巴黎，20 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上大学期间与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有书信来往，得到托尔斯泰的教诲。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形成了曼罗·罗兰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文化持批判态度的创作风格。大学毕业后，罗兰到意大利两年，研究造型艺术，同时探讨意大利几个杰出作曲家的生平和创作。回国后，他写的关于

欧洲歌剧史的博士论文答辩成功（1895），获得音乐史教授职称，先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罗曼·罗兰的思想及其创作演变，大致可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分作前后两期。30年代以前，主要有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8）、《丹东》（1900）和《七月十四日》（1902）；三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还有从酝酿到完成达20年之久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站在坚持人道主义、反对一切战争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收入其《超出混战》（1915）和《先驱者》两个论文集。其中著名的《精神独立宣言》，号召世界各国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30年代后期至罗曼·罗兰逝世，罗兰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势力猖獗，大批知识分子倒向反动阵营的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认识到自己所谓的“精神独立”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从而发表了《向过去告别》（1931）一文，对自己过去所走道路进行了反省和批判。从此他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和平活动。1935年他访苏，与高尔基相交，感触之下指出人类的希望在于十月革命后蓬勃发展的前苏联。这期间他创作有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四部：《安乃德和西尔薇》（1922）、《夏天》（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者》（1933）及论文集《十五年斗争》（1935）、历史剧《罗伯斯庇尔》（1939）等。二战爆发，法国沦陷，罗兰面对纳粹占领军的威胁与迫害，坚贞不屈，坚信法西斯必然灭亡。并写有回忆录《内心旅程》（1942）和友人传记《查理·贝玑》（1944）等。他自己也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朋友。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代表作。全书以四集十卷的篇幅写了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其中第一集主要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第二集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对黑暗社会和虚伪文明的不满与反抗；第三集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友谊与爱情；第四集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经过矛盾，绝望最后得到精神“解脱”。全书以克利斯朵夫一生的抗争为经，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三十年的欧洲社会生活为纬，表现出作家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立场和坚持人类进步文化的艺术观点。

小说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穷音乐教师家里，天赋音乐才能，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里，出身卑微的他受尽了歧视与凌辱。贵族资产阶级的专横、自私，人民群众的苦难，更激起了他巨大的愤懑。因而他从小就有反抗意识，长大后对豪门权贵更充满鄙视仇恨，这样就使他处处受到统治阶级的排挤与打击。后因打死欺侮农女的军士而逃到巴黎，而他发现法国也和德国一样腐败。巴黎文艺界到处充满淫乱与罪恶，金钱可以左右一切，使他原以为经历过大革命风暴的法国应该是个自由幸福乐

园的幻想遭到了破灭。他单枪匹马进行反抗，抨击法国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和艺术，因而受到法国上流社会的敌视。后来，他在打死一名杀害好友奥里维的警察后，又不得不再次逃亡到瑞士和意大利。晚年，他避居意大利，专门从事宗教音乐创作，以求内心的平静和精神上的自我完善。从而完成了他反抗—失败—妥协的人生三部曲。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他的小资产阶级地位使他对社会现实不满，但又对统治阶级抱有一定的幻想；他日趋破产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接受和帮助人民，但个人主义思想又使他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并远离人民；他进步的艺术观使他主张艺术应造福于人类，而对艺术的偏执信仰又使他认为艺术高于一切；他具有不畏强暴的反抗性格，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又使他最终趋向妥协。作者塑造的克利斯朵夫这一人物形象，代表和反映了十月革命以前整整一代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精神面貌，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克利斯朵夫形象中还包含了丰富的时代社会内容。小说通过克利斯朵夫的经历和遭遇，揭示了法德两国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艺术和腐败的政治，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表现了作者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作者以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矛盾，以自然景物来衬托人物性格，并与音乐的某些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颖别致的风格。在结构上也犹如交响乐的几个乐章，分成序曲、发展部分、高潮和结尾，气势浩荡，浑然一体。所以有论者称之为“音乐小说”。不足处是有时结构显得松散，某些表现手法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约翰·克利斯朵夫》被高尔基称之为“长篇叙事诗”，是20世纪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曾获得1913年法兰西学士院文学奖金和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它经傅雷汉译出版，在我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4）巴黎公社文学

巴黎公社文学是指公社诞生前后近20年中英勇的公社战士们的文学创作。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昂扬的战斗姿态出现在19世纪文坛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巴黎公社文学包括诗歌、政论、散文、小说等样式，其中又以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公社最伟大的诗人是欧仁·鲍狄埃，他创作的《国际歌》震撼了世界。另外重要的诗人还有路易丝·米雪尔（1830—1905）、让·巴底斯特·葛莱蒙（1836—1903）和葛洛维斯·于格（1851—1907）等。

公社诗人们在起义酝酿时，揭露普鲁士军的侵略罪行，抨击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卖国活动，号召人民起来自卫，起来革命，热情呼唤公社的诞生。如米雪尔的《和平示威》，描绘劳动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大规模示威运动，揭露普法两国统治者发动争夺霸权战争的罪恶目的。弥尔·特勒在《巴黎换

一块牛排》这一首政治讽刺诗中，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与统治不惜出卖祖国的丑恶本质。

公社成立及起义战斗中，公社诗人们写了许多优秀诗篇，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印成散页的传单，或在工人俱乐部中朗诵，或在战壕与街垒中合唱。这些诗篇及时地反映现实斗争，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可惜由于公社的失败，这些作品大部分或被销毁或遗失。今保存下来的有拉叔赛的《我们要弟兄般友好》、塞内沙尔的《共和主义者联盟》等少数作品。他们揭露剥削者的残忍，号召各国被压迫人民团结友好，共同反对各国专制制度，表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

公社失败后，被流放或流亡国外的公社诗人，怀着极大的悲愤，创作了大量诗篇，控诉凡尔赛分子的血腥屠杀，缅怀先烈与公社事业，号召人民继续为公社的事业而斗争。爱弥尔·特盖尔的《浴血的一周》（1893）、葛莱蒙的《“上墙根去”队长》（1885）、特洛埃尔的《牺牲者和刽子手》、于格的《狱中歌》（1873）等诗，都愤怒地控诉梯也尔之流野蛮屠杀巴黎人民的卑鄙行径。敌人的屠杀，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葛莱蒙在《浴血的一周》（1871）中写道：“这不会长久，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当心我们报仇，所有的穷人都动手。”亨利·勃里沙克（1826—1907）在《装口袋》（1874）一诗中，坚信公社的思想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定会广泛传播，“你要像火山喷石一样，散布在世界上！”

公社起义造就了一大批英勇的无产阶级战士。如米雪尔就是公社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和诗人。她亲自参加了公社起义，经常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勒洛亚在《米雪尔与黑旗中》一诗中就赞扬了她英勇战斗和被俘后的坚贞不屈精神。米雪尔自己也写有《赠我的弟兄们》（1871）、《革命失败》（1871）、《囚徒之歌》等诗，描绘了公社英雄形象。七、八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法国工运的发展，公社诗歌对此也作了反映。如鲍狄埃在1884年创作的《铁匠的梦》和《起义者》等诗，塑造了为公社理想继续斗争的觉醒了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另外，公社诗人对无产阶级诗歌创作还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如葛莱蒙的《诗歌集》的序言中（1885）指出，无产阶级诗歌要有战斗性，要能预知社会的发展，并号召作家深入社会实际反映无产阶级的要求。

欧仁·鲍狄埃（1816—1887）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诗人。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在贫困中长大，13岁开始做工，最后成为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1830年开始创作活动，写了反映巴黎人民反对波旁王朝统治的《自由万岁！》，次年出版诗集《年轻的诗神》。1848年参加了巴黎工人起义，1864年加入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巴黎公社时期，被推选为公社社员，参加了保卫公社的街垒战斗。公社失败后流亡英美等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回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884年出版诗集《社会经济诗》和《什么叫做疯人？》，1887年出版《革命歌集》，同年逝世于巴黎。鲍狄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

献了毕生精力，是一位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和战斗者。

鲍狄埃一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他于 1848 年写的《1848 年 6 月》、《人民》、《该拆掉的老房子》、《谁将为她报仇》等诗，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反动腐朽，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1870 年普法战争时，他写了《自卫吧，巴黎》、《威廉和巴黎》、《一八七一年十月三十日》等诗，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揭露统治者的卖国投降，号召打倒无耻统治者，尽快成立红色的公社。在公社起义的血与火的日子，他写了《纪念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起义者》、《巴黎公社》、《一切还没有变》等诗，歌颂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强调公社原则永存。《公社社员纪念碑》、《白色恐怖》等诗揭露资产阶级的血腥暴行，号召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他的这些诗歌贯穿一个信念就是坚信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无产阶级要将斗争进行到底。

《国际歌》是鲍狄埃写的传遍世界的优秀作品。它作于公社被血腥镇压的日子里，是用无产阶级的鲜血凝成的诗篇，包含了公社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原诗有 8 段，比尔·狄盖特（1848—1932）在谱曲时（1888 年 6 月）节取 1、2、6 段，并将“复唱”作为“副歌”列于每段之后，这就成为今天的《国际歌》。

其第一段：“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气势磅礴，情绪激昂，号召人们以摧毁旧世界，成为历史的主人为目标。第 2、3 段以雄辩的语言，指出创造新世界“靠我们劳动群众”。并号召人民要不失时机地起来革命，争取“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副歌部分一咏三叹，进一步强调《国际歌》团结战斗、争取胜利的主题。

《国际歌》风格刚健豪放，音律整齐化一，结构完整系统，语言生动有力，非常准确酣畅地表达了其主题思想，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结合的典范。它对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体现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一百多年来一直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

3. 英国文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如发动对南非的布尔战争，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等，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加紧剥削劳动人民，增加赋税，国内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发生了多次规模浩大的罢工运动。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广泛传播。表现在文学方面，涌现出了多种文学流派。如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沙文主义文学等。这一时期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前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的优良传统，继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黑暗腐朽给予揭露。唯美主义文学是在法国唯美派的影响下，企图用艺术的“美”来抵销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丑恶现象，或排遣苦闷悲观情绪，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沙文主义文学是为了迎合英国统治阶级推行殖民政策而产生的，其内容多鼓吹好战的沙文主义，美化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宣传冒险、犯罪等。

这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有梅瑞狄斯（1828—1909）、哈代（1840—1928）、高尔斯华绥（1867—1933）、威尔斯（1866—1942）、肖伯纳（1856—1950）、哈克奈斯和莫里斯等。他们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文化等进行了批判，有的还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有的宣传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有的还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号召起来与资产阶级斗争。梅瑞狄斯早期属于“前拉斐尔派”，他的小说如《利己主义者》（1879）刻画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形象，揭发了资产阶级、贵族的自私自利，对当时社会政治有一定批判，但他的思想仍属启蒙范畴。高尔斯华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他的作品充满批判现实的风格，但也流露了明显的调和主义思想。他的由三部曲组成的长篇巨著《福尔赛世家》（1906—1921），以福尔赛家族为经，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由盛到衰的过程。其中第一部《有产者》（1906）成功地塑造了资产者索米斯·福尔赛这一人物形象。描写索米斯整个灵魂浸透着铜臭，他可以把任何东西，甚至自己的妻子都看成是私有财产，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进行了辛辣而深刻的批判。但在其第二部《骑虎》（1920）和第三部《出租》（1921）中，这种批判锋芒却大大削弱了。把索米斯描写成一个已经克服了占有欲，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资产者，表现了作者调和阶级矛盾、否定阶级斗争的思想倾向。

这一时期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哈克奈斯、莫里斯、哈代、肖伯纳比较优秀。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生于19世纪50年代末，他的小说《城市姑娘》（1888）以缝纫女工耐丽被资产者阿瑟·格兰特诱骗遭弃的悲惨故事，揭露了资产者的虚伪与道德沦丧，对受苦的工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威廉·莫里斯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早期作品受“前拉斐尔派”的影响，虽对当时社会现实不满，但却企图从资产阶级以前的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好理想，所以有不少取材于古代和中古的故事。随着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也在英国广泛流传，莫里斯于1884年与马克思的女儿艾莲诺娜·马克思·埃维林组织了“社会主义同盟”。1887年，他还参加了伦敦工人示威游行，目睹了政府对工人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英国人民要想争取美好的未来，只有起来斗争。此时他的诗集《社会主义歌集》（1883—1886）号召受奴役的人们与其受压而生，不如起来斗争。其中《工人进行曲》中写道：“听吧/雷声隆隆/看啊/阳光下/大地上/出现了愤恨/希望和奇迹/人民的队伍在前进。”对前途充满信心。长诗《向希望前进的人们》热情地歌颂了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莫里斯写有两部幻想

小说。《梦见约翰·保尔》（1888）描写作者梦见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约翰·保尔与他交谈，向他叙述1381年后英国历史的发展演变，预言人民力量一定会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最终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乌有乡消息》（1890）预言200年后英国将发生变化，那时会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统治阶级还要进行反抗，但最终人民还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莫里斯这两部小说采用了英国文学中乌托邦小说的形式，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肯定暴力革命，但没有肯定无产阶级政党在其间的作用，他的共产主义也具有乌托邦性质。莫里斯小说不但具有批判现实的内容，而且还具有无产阶级文学的某些特质。另外，还有罗伯特·特莱斯尔（1869—1911），他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描写了一群建筑工人的遭遇。其中重点刻画了觉悟了的英国工人欧文的形象。作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性，要求改变工人受剥削压榨的社会现实，摧毁剥削制度。其对英国社会的反映是真实而深刻的，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超过了同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有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等人。王尔德在法国唯美主义文学影响下，创作了大量童话、小说、戏剧和论文等唯美主义作品。他早期创作的著名童话故事《快乐王子集》（1888），虽然谴责残暴的当权者，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并歌颂他们的善良纯朴，但已流露出了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如其中的名篇《快乐王子》，描写某城市中心矗立着一快乐王子的塑像，它同情受苦的穷人，让一只燕子取下它身上的金银珠宝救济他们。后燕子由于耽误了归期而被冻死，塑像也由于失去光泽而被拆毁。此篇虽然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但也可看出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快乐王子的塑像由于失去了“美”，所以人们就把它拆毁了。王尔德认为美是永恒的，快乐王子在上帝的天堂将会永存。

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是反映他唯美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它描写年青貌美的道林·格雷，希望自己青春永驻，画了一幅自画像，但当他恣意作乐为非做歹时，自画像就变丑；当他向自画像猛刺一刀，自画像复原，而他却死去了。作者通过这荒诞不稽的情节，宣扬了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观念。即只有抛弃任何功利目的，全身心投入艺术，追求“美”，才能创作出真正“美”的艺术作品，另外，王尔德的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理想的丈夫》（1895）、《名叫埃耐斯特的重要性》（1895）等，虽对上流社会的虚伪奸诈作了某些批评，但却通过一些玩世不恭、俏皮颓废的人物形象，宣扬了享乐主义。

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思想，还用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加以解说。如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心灵》（1891）一文里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为生计考虑是不能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家不为任何功利目的服务，艺术才能得以繁荣。显然，他这里又把政治与艺术两者对立起来，仍然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的这种

思想对欧洲唯美主义作家影响很大，甚至对其后的一些现代派作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随着这一时期英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盛行，为其服务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其中代表人物有罗德雅德·吉卜林（1865—1933）等人。吉卜林当过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创作了不少诗歌和长短篇小说。他的诗歌集《兵营谣曲》（1892），采用英国民歌谣曲写成，歌颂英国的殖民政策，把侵略者说成是为国争光的英雄。《白种人的负担》（1899）、《教训》（1899—1902）、《新生》（1914—1918）等诗，针对英国的侵略受挫，利益受损，煽动沙文主义情绪，鼓动英国人要为其侵略战争做出牺牲。他的童话体小说《森林之书》（1894），亦采用较隐晦的形式宣扬他的殖民主义主张。小说描写一个印度森林中“狼孩”的故事。“狼孩”由母狼养大，为了生存和野兽竞争，暗示人类也和动物界一样，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企图将动物界的法则适用于人类，为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张目。他的另一部小说《勇敢的船长》（1897），把一个经海上风浪考验、由纨绔子弟变为勇敢青年的人物，描写成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理想接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但他的这些小说语言流畅，人物和场面描写得很生动。如《森林之书》中对狼、虎、猴等各种动物描写十分切合动物习性，《勇敢的船长》等人物描写也很活泼生动。这样更为他宣扬大国沙文主义帮了忙，所以也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1）哈代及其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19世纪末期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英国南部的道塞特郡，父亲是建筑师，母亲喜好文学，对他有一定影响。他22岁时到伦敦学建筑，并研究文学、哲学和神学，6年后还乡，当了几年建筑师，后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一生基本在家乡农村度过。

哈代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诗歌及剧本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被他自己命名为“性格和环境小说”的一组长篇小说。有《绿荫下》（1872）、《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无名的裘德》（1896）以及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1891）等。这一组长篇小说写于19世纪后30年，反映了英国工业资本侵入农村后乡镇人民的悲惨命运。哈代的第一部小说《绿荫下》描述一对情侣克服种种困难终成眷属的故事，美化了农村田园生活，充满诗情画意。说明他对残存的宗法制还抱有幻想，企望到恬静的田园生活中去躲避险恶的社会现实。但在他的第二部小说《远离尘嚣》中，这种观念就有所改变。他在这部小说中描写破产的农民沦为佃户，遭遗弃的姑娘惨死贫民窟，说明他已开始面对现实。随着他的这种认识的深化，他在《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和《德伯家的苔丝》等小说中，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无限同情。如《卡斯特桥市长》，描写打草工人亨察尔因酒醉拍卖了妻子女儿，后极度痛悔，于是勤劳致富，并当选为市

长，妻子女儿也重新回到他身边。但狡诈的合伙人伐尔伏雷使用阴谋手段使他破产，妻子也死去，女儿又被人领走，弄得他家破人亡，最后死于一个破草棚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际间的尔虞我诈。《无名的裘德》写一个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石匠裘德与两个女性的悲欢离合故事。他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的生活，干出一番成绩，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的这些理想处处碰壁。他与并不相爱的屠户之女爱尔伯拉结婚，后遭抛弃，与真心相爱的表妹同居，后也由于孩子凶死，表妹认为是上帝惩罚而离他而去。最后穷困潦倒，还是再婚后的爱尔伯拉为他送终。裘德一生奋斗努力，但却仍然默默无闻，且最后穷困潦倒而亡，这本身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控诉。哈代这些作品由于受他生活环境的局限和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不仅生活画面不够开阔，而且还有较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及悲观主义情绪，描写方面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色调也很明显，这是他小说的不足处。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哈代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它主要描写了美丽善良的穷苦姑娘苔丝短促而凄凉的一生。苔丝出身于一贫苦农民家庭，全家9口人靠一匹老马维持生活，后老马不幸被邮车撞死，苔丝不得不到地主亚当·伯雷家的庄园去当雇工。亚当是个满肚男盗女娼的家伙，他将苔丝污辱怀孕后又将她抛弃。可怜的苔丝在周围人的歧视和道德压力下，孩子病死后，又到牛奶场当女工，并与牧师的儿子、大学生安琪·克莱相识、相爱，直到结婚。可当新婚之夜苔丝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一切后，安琪却由于不能原谅苔丝的失身而离开了她。苔丝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忍辱负重又到一家农场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并苦苦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可此时卑劣的亚当乘苔丝父亡母病全家人沦落街头的危难之机，又来纠缠苔丝，苔丝也在绝望中再次接受亚当保护，答应与他同居。然而，恰在此时安琪也从巴西匆匆赶回。苔丝悔恨交加，刺死亚当，与安琪躲进森林里过了5天幸福的生活，然后被判刑处死。小说就是描写了苔丝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过上幸福生活，但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接二连三遭到打击，最后以悲剧结束。

小说通过苔丝一生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工业资本侵入农村后，小农经济的崩溃和个体劳动者的贫困化，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法律、道德、宗教和婚姻制度。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农村普遍推行，新式农业机械开始广泛使用，雇工剥削代替了劳役地租。小说中克里克老板的大牛奶场和葛露卑的农场，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苔丝及其伙伴就是农村的雇佣劳动者。她一生几度易主的辛酸经历，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血泪控诉。苔丝经济上遭受农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不能养家糊口，另外生理心理方面也受到严重摧残。亚当这个唯利是图、道德败坏的新兴资产阶级代表对苔丝先奸后弃，给苔丝生理造成严重伤害，而安琪这个巧于伪装实际自私自利的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对苔丝的抛弃，则更主要的是对苔丝心理精神方面的摧残。虽然作者从

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出发，对安玑有所美化，如写他厌恶城市资产阶级文明，愿到农村与农民一起，并真心爱着苔丝等，但哈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还是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安玑虚伪、自私、冷酷的本性。安玑到农村来是为了学习农牧技术，以便将来管理自己的羊群、牛群，他爱苔丝一方面是为了苔丝的美貌，更主要的还是看中苔丝的勤劳能干，将来可作自己管家，所以一旦当苔丝向他吐露了自己曾经失身的事实时，他就认为有碍自己的前途，就毫不犹豫地离开苔丝，给苔丝以致命的一击。后来苔丝走上杀人的道路，和安玑的抛弃是有重要关系的。苔丝毅然杀死亚当，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的最后反抗。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苔丝这一贫苦妇女形象，并寄予了作者深深的同情。苔丝纯朴善良、美丽勤劳，但在阶级压迫下极富反抗精神。她不管碰到多大困难，从不低头，她在生活重压下，积极奋斗，从不自暴自弃；她对安玑的爱出于真心，而不是觊觎其地位财产；她起初一心信仰上帝，但在生活磨难中体会到其虚妄后就脱离与教会的关系；她遭到亚当强暴后，一直怀恨在心，最后终于刺死了这个恶棍。作者在这些描写中不仅赞扬了苔丝的可贵品质，而且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揭露与否定。作者还特意以“一个纯洁的女人”作小说的副标题，并把绞死苔丝的八角楼说成是“全城美景中的唯一污点”，但作者又把苔丝的悲剧说成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在作祟，这又体现了作者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的局限性。他的其它几部小说也流露了这种思想倾向。

《德伯家的苔丝》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作者善于通过优美的景物描写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表现主题，以及通过偶然事情的巧妙组合来增强小说的生动性。如苔丝赶车劳累，让邮车撞死老马，迫使她出外打工；苔丝婚前写信告诉安玑自己的失身，而信却未让安玑看到，造成新婚之际安玑的离开；苔丝偶遇亚当在传经布道，导致亚当对她的纠缠等等，偶然性中有必然性，使故事情节既紧凑又高潮迭起，体现了作者长于谋篇布局和展开故事情节的高超技巧。

（2）肖伯纳及其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和《巴巴拉少校》

乔治·伯纳·肖（肖伯纳，1856—1950）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剧作家，也是欧洲文学史上继易卜生之后的又一社会剧大师。他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父亲是个破落贵族，母亲是个很有才能的音乐家。他14岁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即出来工作。先在一房地产公司任职员，20岁时移居伦敦，开始练习写作，并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图书资料。其间研读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他最终并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加入并成为费边社的组织者之一。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团体，主张用渐变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反对暴力革命。这造成肖伯纳思想的很大局限性。

肖伯纳的政治观点是比较复杂的，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受当

时欧洲流行的柏格森、叔本华等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最终是个改良主义者。他辛辣地讽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虚伪狡诈，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进行了无情鞭笞。他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等国家武装干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他曾于 1931 年访问苏联，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1933 年访问中国时，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作家的热烈欢迎。但他却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企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渐进到社会主义。因此他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有时会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和宿命论思想。他的这些思想矛盾明显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

肖伯纳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他从 1879 年至 1893 年，创作了 5 部长篇小说。其后的 58 年共创作了 51 个剧本。此外还写了一些有关戏剧、音乐、文学、艺术方面的评论文章。其中又以戏剧的成就最大。

肖伯纳在 19 世纪创作了 10 个剧本，分别收入 3 个戏剧集。

《不愉快的戏剧集》包括《鳏夫的房产》（1892）、《荡子》（1893）、《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等 3 部；《快意的戏剧集》包括《武器和人》（1894）、《康蒂妲》（1894）、《风云人物》（1895）、《难以预料》（1896）等 4 个剧本；《为清教徒写的戏剧集》包括《魔鬼的门徒》（1897）、《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7）、《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1898）等 3 部。这些剧本从多方面批判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丑恶，塑造刻画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绅士、淑女和达官贵人的形象。其中又以《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最为重要，曾久演不衰。《鳏夫的房产》主要写一个医生原来抱有同情心、正义感，责备房东不该压榨剥削贫民区住户，可当他发现自己的收入也是来自贫民区房租的时候，就心甘情愿地成为房东的同伙了。此剧形象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财富就是来源于对穷人的搜刮。

肖伯纳在 20 世纪写的剧本中，重要者有《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7）和《苹果车》（1929）等。《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通过一英国土木工程公司老板到爱尔兰发家致富的经历，怒斥了英国殖民者对爱尔兰的政治欺骗和经济掠夺，并谴责了爱尔兰的出卖民族利益者。

肖伯纳大量的剧本中，《华伦夫人的职业》和《巴巴拉少校》是其代表作。《华伦夫人的职业》描写一个痛恨娼妓制度的女大学生薇薇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当她发现自己的母亲华伦夫人的职业就是妓院经理时，非常气愤，质骂其母亲堕落。华伦夫人无奈中倾述了自己的辛酸经历。华伦夫人出身贫微，很早就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以至不得不以出卖自己和他人的肉体为职业来养家糊口。薇薇听了母亲的讲述后，知道母亲原本并非坏人，是逼良为娼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了卖淫现象。此剧正是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手法，大段大段的对话，讲述了一个场面颠倒、出人预料的故事，阐明了贫穷迫使华伦夫人从事妓院行当的道理。从而对资产阶级体面生活的背后所隐

藏的种种罪恶给予了尖锐地揭露批判。此剧曾遭到英国政府的禁演。但肖伯纳由于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虽比较尖锐地揭露了社会现实，可对如何改变的回答却是软弱无力的。如薇薇听母亲讲得有道理，自己又无力改变这种罪恶，只好独善其身，埋头本职工作了。

《巴巴拉少校》描写一个大资本家、大军火商安德谢夫的女儿巴巴拉参加了宗教慈善事业，在救世军中担任少校。她与未婚夫柯森斯教授一起募捐钱物，救济穷困，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无比高尚的事业。可当她知道救世军原来是她父亲一类的资本家出钱兴办的后，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不过她最后还是向她父亲妥协了，柯森斯也做了她父亲的助手，进而管理整个兵工厂。

《巴》剧集中反映了肖伯纳的思想矛盾。它既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其组织兴办救世军等慈善机构目的是为了缓和工人的不满情绪，又充满妥协性。如该剧最后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由才智出众的个人（教授或小姐）按照军火商所定条件管理兵工厂，只是内部做一些调整。这是典型的费边主义思想的表现。其中还提出建设“人人发财、人人富裕、人人道德”的“百万富翁的社会主义”，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体现。

《巴》剧成功地塑造了安德谢夫这一形象。安德谢夫一家世代经营军火，靠战争发了财。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生财之道，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道德准则，只要谁出钱，他就将军火卖给谁，军火卖得越多他也越有利。他扬言英国政府离下开他，其宗教、议会、法律等都是为他服务的。巴巴拉称他是“混世魔王”，社会的一切无不在他们这样的资本家控制之下。作者通过他赤裸裸地撕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假面具，指出资产阶级政府的内外政策就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艺术手法方面，安德谢夫吹嘘的越厉害，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露就越深刻。

肖伯纳的戏剧创作受易卜生的影响很深。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是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批判，均推崇知识分子和孤独者的反抗，均有对人民群众不够信任和人物概念化的倾向。不同处是易卜生剧本充满悲剧色彩，而肖伯纳剧本更接近于闹剧。易卜生剧本局限于提出社会问题，在揭露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方面没有肖伯纳那样深刻。在运用讽刺手法方面，肖伯纳又明显地受到狄更斯的影响。如他在《巴巴拉少校》中，运用夸张又不失真实的手法讽刺描写安德谢夫，其尖锐、辛辣颇有狄更斯遗风。安德谢夫声称“战争毁灭性越大，我们越喜欢”，“我就是你们的政府。……什么对我们有好处，你们就做什么。战争对我们有利，你们就宣布战争；战争对我们不利，你们就维持和平。”作者通过这些夸张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虚伪与侵略本性。肖伯纳也正是由于这些夸张语言的使用，才使他成为对现代英国社会的最辛辣、尖锐的讽刺者。另外，他的语言的机智、灵活，被认为是英国口语和对白的大师。

肖伯纳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他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使他获得了

1925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4. 德国文学

1871 年普法战争后，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及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其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 1890 年前后，进一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其政府执行了一套对内残酷压榨，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但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当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已差不多让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德国的扩张势必引起这些老牌殖民者的反对。这样，帝国主义内部争夺日益剧烈，世界充满战争危机。到了 20 世纪初，形成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两大对立军事集团，并终于在 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不但未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反而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也在发展壮大。1869 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于 1875 年 2 月与另一派合并，建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党（1890 年改称社会民主党），开展了反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1878—1890）的斗争。但随着斗争的深入，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致使工人运动不能保持团结一致。20 世纪初右翼夺得党内领导权后，左派遂分裂出来，于 1918 年 12 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德国共产党。由于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及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背叛，给了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致使其后的希特勒纳粹党日益壮大起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德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是非常尖锐复杂的。这种尖锐复杂性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文学方面来，造成这一时期德国文学政治倾向性非常鲜明，作家们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和动荡的时局面前，纷纷用自己的作品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见解。于是乎在文学方面亦流派纷呈、观点林立。其中主要有坚持民主主义立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反映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等文学；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文学等。

自然主义文学是在受左拉、易卜生等人的影响下产生的。其代表作家有约翰内斯·史拉夫（1862—1941）、阿尔诺·霍尔茨（1863—1929）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等人。史拉夫与霍尔茨合作所写的短篇小说集《哈姆雷特爸爸》被称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样品”，在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发展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哈姆雷特爸爸》描写演员尼尔斯·梯思维勃从走红到落魄的心理状态和生活遭遇。尼尔斯当初与妻子一个演哈姆雷特，一个演奥菲莉亚，荣耀非常。后落魄潦倒，与生病的妻儿住在一个又脏又湿的阁楼里勉强度日。一次，尼尔斯为了使吵闹的孩子安静下来，竟然将其闷死。从此他借酒浇愁，饮酒成癖，最后酒精中毒而死。这篇小说的影响主要在它的语言

运用方面。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和日常习惯用语来描绘人物心理和其生活遭遇，如不完整句与叹息等，体现了其认为现实中的人怎样讲就怎样写的观点。另外作者还运用大量极其自然的对话来烘托环境，刻画人物心理，以反映局部的生活。思想内容方面则反映城市贫民生活及德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两极分化。

史拉夫和霍尔茨还合作写了剧本《塞利克一家》（1890）。该剧是一部典型的“分妙风格”作品。作者规定了详尽的导演提示、布景、语言感情色彩及演员姿势步伐等。唯恐在演出时破坏了“自然”。该剧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戏剧冲突，只是照相一般地写了一个孩子在圣诞节前濒临死亡和其母守候在一旁的情景。由于其不重视戏剧规律和语言艺术，所以很难取得成功。

另外，霍尔茨还主张诗歌革命，他写的《诗歌革命》（1899）强调诗的自然节奏，认为诗歌不应以勉强的韵脚和格律为中心，要体现“自然”。史拉夫也写三幕剧《欧茨师傅》等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但在德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影响的自然主义文学家还是霍普特曼。

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从暴露社会黑暗、描写现实生活等方面来看，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它否认艺术构思，实际上是取消了艺术。因此它是没有前途的。霍普特曼后期创作实际上已逐渐离开自然主义，写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德国印象主义文学也是在法国印象主义文学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基础是唯美主义和印象主义。代表作家有李林克隆（1844—1909）和戴默尔（1863—1920）等人。李林克隆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他的诗题材比较广泛，有描写历史的，也有描写恋爱战争、荒野景色和海滨风光的，风格有浪漫主义，也有写实的。这些作品感伤悲观情绪非常浓厚，艺术技巧方面非常重视语言运用。如其著名诗篇《军乐队来了》，描写一支军乐队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声音由低而高、由高而低的过程，突出它给人的视觉、听觉印象，体现了印象主义的创作特色，即力图表达瞬息间获得的印象和偶然产生的感觉，追求诗歌音调的和谐、节奏的强烈。如其诗句“克玲玲，崩崩，钦达达，是波斯国王凯旋回家？街角上传来嘈杂的音响，如同末日审判的喇叭声。……”就体现了这种特色。戴默尔早期创作受古典主义影响，中期表现出对劳动者的同情，晚期主要写情欲与激情。他的诗作富于节奏，形式多样，晚年作品《有些夜晚》、《静静的夜》等，表现出对前途的忧虑和企求内心的宁静。

德国象征主义文学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明显影响，它反对客观描写现实，认为应用象征手法反映理想世界。这“象征”必然导致语言晦涩难懂，充满朦胧与神秘主义色彩。同时由于象征主义重视语言的音乐性，所以其文学样式主要是诗歌。其代表作家有盖奥尔格（1868—1933）、里尔克（1875—1926）和霍夫曼斯泰尔（1874—1929）等人。盖奥尔格遍游欧洲各地，在法国结识了当时象征主义魁首魏尔兰和梅里美。回国后于1892年创办了宣

传象征主义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反对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不为功利目的。他的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使他非常讲究格律，注重辞藻和形式。他曾一反德语传统，名词从不大写，也不用逗号，而是自创用右上角的句点来代替逗号。政治上他继承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看不起凡人俗子，将自己关入艺术的象牙之塔，严重脱离现实。所以他的代表诗篇《追随者》中的“超人”思想，得到一些纳粹分子的崇拜。他还有《生命之毯》、《第七个戒指》等。里尔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从1894年开始创作，先后有诗集《祈祷书》、《图象集》、《杜伊诺哀歌》和长篇日记体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纪事》等。他反对印象主义者所主张的诗歌要写直接印象的观点，强调诗歌要传达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即表现一个内在的“我”。这样就使他不可避免地堕入沉思冥想之中。他的作品有颓废、神秘、宗教情绪、厌于生活的消极的一面，也有不满资本主义现实、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的积极的一面。里尔克对当时及现在的现代派诗人的影响都比较大，今天西方研究里尔克及其著作的人亦很多。

表现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流派应该说是诞生于德国。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鼎盛期，1924年后走向衰败。它把文学创作中的传统形式结构完全推翻，喜欢不合常情的怪诞情节，叙述上喜欢跳跃性，蒙太奇化，语句短促，节奏感强。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不满现实、要求改革，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虚假伦理道德的倾向，但由于作者重在凭借“灵魂”来表现，特别强调“激情”，所以下能够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德国表现主义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但其人物形象往往苍白无力，常常是抽象概念的化身和象征。为了弥补此不足，表现主义戏剧常用灯光、音响、面具等来加强语言表达能力，表现人物内在心理，对戏剧革新有积极作用。

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有海姆（1887—1912）、魏德金德（1864—1918）、凯泽（1878—1945）、施特恩海姆（1878—1942）等人。海姆是德国表现主义诗人，他的诗比较讲究韵律，但思想内容方面流露出明显的悲观厌世情绪。如其诗《隆冬》：“每种生活都没有出路，每条小路都混乱迷糊，谁也不知尽头。”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文人既不满现实又寻找不到出路的“世纪末”情结。魏德金德是表现主义戏剧先驱作家，被奉为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始祖。他的剧本抨击资产阶级的伪善与小市民意识，要求人性的自然发展，结构上下求场次间的连贯，爱用长篇抒情独白和蒙太奇手法。如其成名作《露露》[包括《地神》（1895）和《潘多拉的盒子》（1904）两种]，描写美丽多情又放荡任性的露露，先做出版商修恩的情妇，又嫁高尔医生。其间与画家施瓦茨偷情，气死高尔医生，转嫁富有的施瓦茨。但她仍不安份，仍去纠缠修恩，施瓦茨得知后气愤自杀。露露从此感到自由，转而去与修恩结了婚。可她仍与各色男性保持不正常来往，其中包括修恩的儿子。修恩忍无可忍逼露露自杀，却反被露露枪杀。警察搜捕露露，发现了她不少玩弄男性的证据。

露露最后沦为娼妓，被嫖客奸后杀死。此剧表现了作者认为人都有兽性情欲，不同人只不过是不同动物的思想。其中对“上等人”的伪善进行了揭露。

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史上虽然流派很多，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像其它文学流派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而是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继承了 19 世纪中前期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对这一历史阶段德国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批判，将德国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期，涌现出了不少大师级的文学家。其中如台奥多尔·冯塔诺（1819—1898）、亨利希·曼（1871—1950）、托马斯·曼（1875—1955）等人。亨利希·曼的主要成就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有《在懒人乐园里》（1900）、《垃圾教授》（1905）、《团城》（1909）等。另有两篇论著《精神与行动》（1910）和《伏尔泰——歌德》（1910）阐述了他进步的思想观点与文学要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主张。他的代表作《垃圾教授》副标题为《一个暴君的末日》，猛烈地抨击了德意志帝国教育制度和虚伪堕落的资产阶级道德。小说主人公拉特教授，绰号“垃圾教授”，他对待学生犹如暴君，给学生灌输绝对服从的思想，学生只要有一点独立思考，他就视为是犯罪。他害怕革命，不学无术，但却极力想往上爬。作者正是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他这种趋炎附势与奴才思想。

另外，随着这一历史时期德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德国无产阶级文学也有了发展。其中有工人阶级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的诗，杰出工人运动活动家梅林、蔡特金（1857—1933）和卢森堡（1870—1919）的文学论著。李卜克内西的诗歌反映了德国人民对德意志帝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愤怒与仇恨，表达了对革命斗争前途的无比信心。梅林、蔡特金和卢森堡的文学论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对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及一切进步文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梅林及其文学理论著作《莱辛传奇》

弗朗茨·梅林（1846—1919）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史上杰出的评论家、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早年是民主主义者，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1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6 年参加左派组织斯巴达克派，1918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期，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党中央领导人。他曾与恩格斯有交往，并与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卢森堡等革命家关系密切。

梅林在投身革命运动的同时，有不少著作问世。如《莱辛传奇》、《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卡尔·马克思》、《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等。其中《莱辛传奇》是他文学评论方面的代表作。此书主要内容是对 18 世纪的普鲁士国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剧作家、文艺批评家莱辛的评价。当时一些受沙文主义影响的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将弗里德里希二世吹捧为开明君主，认为他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德国启蒙文学的促进者，称他为“复兴国家的英雄”，并把普鲁士的兴起看作是

拯救德国的希望。梅林在《莱辛传奇》里列举了大量的事实，驳斥了这种观点，揭发了普鲁士推行军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本质，并用莱辛的生平和事实证明正是普鲁士的侵略好战阻碍了德国的启蒙运动。此书出版后，引起恩格斯的重视，他在 1893 年给梅林的信中对这部书做了评论。恩格斯认为，此书虽然在方法论方面有些欠缺，如对于思想观念的形成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的辩证关系考虑的不够等，但仍不失为“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关系。”

梅林还有不少文艺论著及文章对德国和其它国家的文艺思潮进行了评论。如他对自然主义的评论，认为自然主义虽然有勇气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但最后却陷入“奴性地模仿自然”，不能够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什么办法。他对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唯美主义倾向明显的文学流派也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文学和艺术就是要反映社会现实，作家和艺术家就是要深入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去，而绝不能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单纯地为艺术而艺术。如他说：“作家和艺术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浮游在云端里的，而是生活在他们的人民和时代的阶级斗争中。”他还要求作家“不仅要把握住旧世界，而且还要把握住新世界；不仅能够从鄙陋的统治世界里挖掘出今天的祸患，还要能够挖掘出明天的希望。”梅林的这些论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显然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起了积极作用。

(2) 冯塔诺及其长篇小说《艾菲·卜利斯特》

台奥多尔·冯塔诺（1819—1898）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出生于一个药商家庭，早年在柏林、莱比锡等地药店里工作，17 岁时参加了柏林一个文学组织，并立志从事文学事业。后来曾当过几家报馆的记者和编辑，1870 年普法战争时曾是普鲁士的前线记者。将近 60 岁时，冯塔诺才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并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

冯塔诺最早是从事诗歌和游记的写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勃兰登堡漫游记》，描写勃兰登堡的贵族生活和风土人情。但真正代表他文学创作最高成就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他从 1878 年年近 60 岁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起，到 1898 年去世时止的 20 年间，共创作了 20 多部小说，主要是长篇。如《暴风雨前》（1878）、《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迷惘与混乱》（1888）、《燕妮·特莱勃尔太太》（1892）、《艾菲·卜利斯特》（1895）、《施泰希林》（1899）等。

《暴风雨前》是冯塔诺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它描写了 1812—1813 年解放战争前夕勃兰登堡的贵族、市民以及农民的生活，是冯塔诺走上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开始。《沙赫·封·乌特诺》通过普鲁士军官沙赫和一位曾经是

1893 年 7 月 14 日恩格斯致弗·梅林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502—503 页。

转引自杨周翰等人编《欧洲文学史》，1982 年，人民出版社版。

美女但后来因得天花而成了麻子的姑娘的恋爱婚姻，批判了普鲁士社会虚伪堕落的道德观念。《艾菲·卜利斯特》也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丑恶进行了批判。《迷惘与混乱》是冯塔诺描写现实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贵族少年与贫民少女的恋爱故事，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社会偏见与习惯势力给予了揭露批判。《燕妮·特莱勃尔太太》则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思想。冯塔诺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曾说，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揭露资产阶级观点的空虚、冷酷、傲慢与伪善。燕妮·勃莱特尔太太就是 70 年代已经变得富有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冯塔诺这些作品对德国历史、现实，贵族、贫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作了多方面的描写反映，表现了他憎恶贵族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暴发户，同情下层贫民和歌颂他们善良品质的思想。

《艾菲·卜利斯特》是冯塔诺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它主要描写贵族小姐艾菲·卜利斯特的婚姻悲剧。艾菲·卜利斯特年方 17 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她母亲青年时的情人殷士台顿男爵。殷士台顿是海滨小城凯辛的行政长官，他与比他小 20 岁的艾菲·卜利斯特结婚后，只顾钻营仕途，从不关心妻子。这样使得艾菲十分寂寞孤独。而这时殷士台顿的朋友，一个善于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克兰巴斯少校乘虚而入，与艾菲发生了暧昧关系。后来殷士台顿调职柏林，艾菲就此摆脱了克兰巴斯。可六年后，殷士台顿无意间发现了克兰巴斯给艾菲的情书，感到他贵族的荣誉受到了损害，于是决定与克兰巴斯决斗，结果打死了克兰巴斯，并且和艾菲也离了婚。离婚后艾菲被赶出家门，离开了孩子，父母迫于社会舆论也不敢接纳她，最后艾菲在痛苦绝望中抑郁病死。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通过艾菲·卜利斯特的不幸婚姻遭遇，揭露批判了普鲁士社会道德习俗的虚伪和残酷，指出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人们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必然与其产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又必然是个人的毁灭。艾菲是这部小说中刻画得最成功可爱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冯塔诺所有作品中最成功可爱的人物。艾菲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对生活的唯一奢望就是希望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爱情。但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下，她的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她在父母之命下，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又是她母亲情人的殷士台顿，这本身就埋下了祸根。加之殷士台顿又是个不懂感情、只知往上爬的人物，就又为第三者的插足提供了条件。而一旦当艾菲的私情暴露后，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殷士台顿就毫不客气地将她赶出家门，最后造成克兰巴斯送了命，艾菲以悲剧结束，殷士台顿也并不幸福。作者在描述这种失败的政治婚姻时，并没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哪个人，而是对准了普鲁士的整个上层建筑，形象地说明是普鲁士的社会道德准则使其间人物变得冷酷无情。

这部小说艺术手法方面最突出的特色是结构非常紧凑，它不像一般小说有一个主线，还有副线，另外加一些穿插与插曲性叙述，而是以一个事件即艾菲的婚姻为中心一贯到底。这也是冯塔诺小说的一贯创作手法。这种创作

手法使他的小说一般人物比较少，故事情节非常集中，因此卢卡契称他的长篇结构具有“中短篇小说的倾向”。在具体细节描写方面，冯塔诺也服从于他这种指导思想，写得简练含蓄。如对艾菲私通并没做过多的直接的描写，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对于决斗这种很富戏剧性场面的描写，也只是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在自然风景和社会环境描写方面也限定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不为描写而描写，而是为了衬托和突出人物的心情和动作，因此不仅不延缓情节的发展，反而对其起了推动作用。这在欧洲小说的一般注重大段大段心理刻划和景物描写中是比较少见的。其次，这部小说还很善于通过对比描写来刻划人物形象。如通过艾菲和她的丈夫以及和其它贵族女性的对比，使艾菲性格更突出，更引起人们的同情。另外，此小说艺术方面的高超处还表现在成功的对话。每个人物的对话都表现了个人和他所处阶级的心理活动，都与情节发展和社会道德制度联系起来。如殷士台顿与威勒斯道夫的对白，阐明他决斗的动机就是为了维护贵族荣誉，结尾处老布利斯特见到老犬洛洛在艾菲坟前的一番感慨，指出人性不如狗的本能等，对发展情节、点明主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使《艾菲·卜利斯特》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3）霍普特曼及其剧作《日出之前》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是德国文学史上具有世界影响的自然主义剧作家。他出生于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祖父在普鲁士军队中当过兵，父亲是旅店老板。他少年耽于幻想，喜欢雕塑，曾入布雷斯劳艺术学院学习。1884年到柏林大学学习，与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相识，并接触了左拉和易卜生等人的作品，开始练习写作。1888年，他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带有自然主义特色的小说《道口工蒂尔》发表于慕尼黑的《社会》上。1889年，他的五幕社会剧《日出之前》的发表，确定了他自然主义戏剧家的声誉，并奠定了他自然主义文学的领袖地位。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剧本《织工》（1892）、《獭皮》（1893）、《弗洛里昂·盖耶》（1896）、《车夫亨舍尔》（1899）、《罗泽·贝恩特》（1903）、《大老鼠》（1911）等。1888年至1911年这20多年是霍普特曼创作的旺盛期，他的文学成就便主要是这一时期取得的，他也因此于191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另还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希特勒上台后，年已71岁的霍普特曼蜚居家乡写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次年（1946），他逝世于西里西亚老家。

霍普特曼的创作倾向是多样化的，他虽然早期以自然主义文学家著名于世，但后来又创作了现实主义杰作《织工》、《车夫亨舍尔》等。中间还有象征主义甚至神秘主义作品《沉钟》、《汉奈蕾升天记》等。从题材来看，霍普特曼作品既有反映当时人民苦难生活的，也有宗教神秘题材、童话题材和关于希腊神话的题材。从文学样式来看，除他得以成名的戏剧外，还有诗歌、散文、小说、回忆录、游记等。戏剧方面又有悲剧、喜剧、悲喜剧、历

史剧、宗教神秘剧等。从语言角度来看，霍普特曼的创作既有诗体的，又有散文的，既有使用标准语的，也有使用方言的。这些都反映了霍普特曼创作的极为丰富。他一生有 54 部剧本、18 部中篇小说、6 部史诗、3 部诗集和大量的回忆录传世。其中《织工》是他后期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该剧叙述了 1844 年西利西亚织工反对工厂主残酷剥削压榨工人而举行的一次斗争。其中工厂主德莱西格及一些织工的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反映了劳资双方的尖锐矛盾。

《日出之前》是霍普特曼赢得自然主义戏剧家声誉的代表作。它主要描写发生在西利西亚农村里的一个故事。某公司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煤矿，开始从农民手里大量购买土地。村民克劳塞靠出卖土地富起来，并成了大资本家。但他成了富翁后，沉湎酒色，无所用心，致使他的妻儿女婿也成了酒徒。克劳塞后来还寡廉鲜耻地追求起他的女儿来。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克劳塞的小女儿海伦娜对此非常厌恶，可也无计可施。可就在这时，海伦娜认识了来西利西亚采访矿工贫困与资本家暴发的新闻记者洛特，对他提出的要改革不平等社会的主张非常崇拜，并产生了爱慕之情。洛特也答应带她离开这里，两人共同劳动，开始过新的合理的生活。可是后来洛特发现了海伦娜的父亲是个酒徒后就抛弃了她。海伦娜在洛特离她而去后，失望至极，于是便在日出之前自杀了。此时她的父亲克劳塞也正从酒店喝得烂醉归来。

《日出之前》对现实的批判是很明显的，它揭露了工业化时期的贫富两极分化，指出颓废、道德沦丧、酗酒等现象正是工业化时期的社会不健康产物。另外还对德意志帝国的穷兵黩武给予了谴责。该剧是德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被誉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范本，霍尔茨赞扬它是“用德语写的最好的剧本”，冯塔诺也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在德国上演曾引起很大轰动，震撼了沉闷的社会空气。该剧是一出悲剧，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悲剧，洛特不是战士，而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海伦娜也不是英雄，而是牺牲品，这些可看出左拉理论与小说的明显影响。霍普特曼以自然主义理论解释，酗酒是环境的产物，是一切不幸和堕落的根源，而这些在个性发展和个人的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遗传性。另外，海伦娜的自杀表明作者面对现实环境毫无办法，作者虽对海伦娜深表同情，但也认为人只能受制于环境，反映了自然主义作家面对现实的消极态度。《日出之前》剧名的含义是：当时的人们正处于黑暗和光明的交界处，这又从某种角度象征了作者对光明的到来的向往与坚信。

（4）托马斯·曼及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托马斯·曼（1875—1955）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北德古城吕贝克的名门望族，父亲是当地的大商人和参议员，母亲出生在巴西，有葡萄牙血统。他在家乡读完中小学后，于 1893 年随母亲迁居慕尼黑，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见习生。就在这工作期间，他创作了第一个短

篇小说《倒下》，发表在康拉德所办的自然主义杂志《社会》上，引起文坛注意，并成为慕尼黑著名幽默杂志《西木卜里切斯木斯》的编辑。1901年，托马斯·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他获得了192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赢得了世界声誉。但这期间托马斯·曼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曾于1918年发表了政论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进行的是“民族”的战争。从190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托马斯·曼创作的丰收期。除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外，他还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王爷殿下》（1909）和短篇小说《特里斯但》（1903）、《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在威尼斯之死》（1912）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又有长篇小说《魔山》（1924）和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出版，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和糜烂。1933年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托马斯·曼的政治认识有了提高，并积极参与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因此被迫流亡国外。他先是流亡捷克、瑞士，1938年到了美国。1933年至1943年间，托马斯·曼完成了《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这组长篇小说取材于《旧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描述犹太人受苦难的情形。作者对犹太人善良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给予了赞扬，借此批驳了希特勒种族主义者残害犹太人的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托马斯·曼发表了论文《反对布尔什维克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预感到共产主义潮流势不可挡，表明他对未来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看法。1947年，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一个颇有才华的资产阶级艺术家，由于对前途丧失信心，最后发疯自杀。作者在这里不仅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且对一些颓废艺术家也作了批评。1954年，托马斯·曼出版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第一部），以轻松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招摇撞骗的冒险家，尖锐地讽刺了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和自私自利本质。此书的后面几部只留一些片段。1955年，托马斯·曼逝世于他晚年定居的瑞士苏黎世近郊。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托马斯·曼的代表作，其副标题为《一个家庭的没落》。它通过对大资本家布登勃洛克一家由盛而衰过程的描写，反映了19世纪末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段历史。布登勃洛克是德国吕贝克城一家有钱有势的望族。祖父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开设一家大粮栈，在社会上政治经济地位很高。他是一个稳健的自由主义者，遵守“白天要精力充沛地做生意，但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这样，我们晚上就能安然入睡”的准则，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欣欣向荣阶段的代表人物。但到了他儿子小约翰继承家业时，垄断资本主义在德国已崭露头角，暴发户哈根斯特罗姆成了他们强劲的竞争者。小约翰虽然干练、严格，但在斗争激烈、社会动荡的形势下，他死守上一辈的信条，缺乏改革创新精神，加之孩子们不争气，牵扯了他不少精力，使他经营已非常困难。布登勃洛克家族第三代托马斯经

营家业时，与哈根斯特罗姆家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方面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但此时托马斯弟兄群起争夺遗产，家庭丑态暴露无遗，加之托马斯优柔寡断，又投机失利、战争爆发，终于使布登勃洛克家族在与不择手段、投机钻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哈根斯特罗姆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老约翰购置的大房子也落到哈根斯特罗姆的手里，托马斯死后，第四代汉诺体弱多病，又毫无创业精神，根本不能适应那种弱食强食的社会。小说就以汉诺夭折，曾经烜赫一时的布登勃洛克家族彻底覆亡而告终。

这部小说在描写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的兴衰过程中，对其第一、二代在“忠厚诚实”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剥削聚财表现了某种同情，表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但他对不讲道德、投机钻营的暴发资本家是持批判态度的。特别是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间一切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是非常反感的。如小说中对小约翰的女儿安冬妮的几次结婚离婚及布登勃洛克家子弟争夺遗产纠纷的描写，就体现了作者这种思想认识。结婚是一笔买卖，爱情毫无地位，财产和嫁妆才是真正目的。父子间感情的基础是财产，为了争夺遗产同胞可反目成仇。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是金钱。托马斯·曼对布登勃洛克家族衰亡的描写，客观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加之作者具体刻划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衰落，从而体现了这部小说的巨大批判现实主义价值。但小说也流露了作者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对人生的消极悲观情绪。

这部小说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通过他们的交替出现反映历史的变化。结构方面也非常严谨，全书分十一个部分几十个章节，环环相扣，有些情节虽然重复出现，但也不显单调，反而对刻划人物、前后关照有好处。语言方面也精炼生动、幽默风趣。另外，这部小说取材上看似家庭琐事，但正是这些琐事的描写，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描绘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兴衰过程，因此有人还把它比作中国的《红楼梦》。

5. 东欧北欧文学

(1) 东欧文学

19世纪后半期，东欧及巴尔干半岛诸国在英法等国革命运动和俄国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高潮。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后，保加利亚从土耳其长达500年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罗马尼亚也摆脱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隶属，塞尔维亚也取得了独立。其后的巴尔干战争（1912—1913）使土耳其人的统治最后崩溃，阿尔巴尼亚等国又独立出来。这些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使这些国家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其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在农村等地区封建制度的残余还仍然存在，阶级分化更加加剧，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同时工人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无产阶级政党也相继成立，特别是 1905 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和 1910 年巴尔干国家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对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文学以反对异族奴役和封建专制及争取自由独立为主题，创作流派方面浪漫主义已衰落，现实主义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欧已出现衰落的情况下，取得了杰出成就。使一向不为世人所注意的东欧等弱小国家的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在波兰涌现出了奥若什科娃、柯诺普尼茨卡、显克微支、普鲁斯、什罗姆斯基、莱蒙特等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描绘了波兰社会经济变革的历程，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落后，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号召人民起来求解放。

艾利查·奥若什科娃（1841—1910）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曾全力以赴地参加了 1863 年至 1864 年波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的起义，这对她世界观的形成和创作影响极大。1866 年，她的第一篇小说《荒年》在华沙的一份杂志上发表。接着她又有中篇小说《马尔达》（1876）、《下贱人》（1883）、《久尔济一家》（1885）和长篇小说《涅曼河上》（1888）、《寻求金羊毛的勇士》（1899）等出版发行。这些作品揭露了土地改革后波兰贵族地主的腐化堕落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私残酷，描绘了处于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下的波兰与白俄罗斯农民的悲惨命运。对波兰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作了较全面的反映。

玛丽亚·柯诺普尼茨卡（1842—1910）是位杰出的女诗人和散文家。她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小贵族家庭，曾做过抄写工和家庭私人教师。她创作起步比较晚，1877 年她 35 岁时才发表了第一篇诗作，但就以其独创性和清新的格调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她的第一本诗集（1881）主要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是颇富特点的社会叙事诗。第二本和第三本诗集的出版，标志着她的创作达到了成熟期。其中组诗《吹起芦笛》、《从草场和田野》、《露未晞》、《从农舍里》等，采用摇篮曲、礼仪歌、婚礼曲、舞曲等民歌形式，反映普通农民的心声及他们的道德情操，具有强烈的大众化、民族化特质。另外，柯诺普尼茨卡诗歌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社会解放是其重要主题，她也因此遭当局迫害而流亡国外。她的著名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1910）描写一批被迫移居南美的波兰农民的悲惨遭遇和有他们参加的一个南美港口城市港口工人罢工的宏伟场面，表现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人民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历史事实。这篇长诗当之无愧地成为波兰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亨利克·显克微支（1846—1916）是波兰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从小接受小贵族阶级解放运动的传统精神教育，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曾于 1876 年作为《波兰报》的记者到美国采访，三年间目睹并体验了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写了《旅美书简》

和小说《为了面包》、《奥尔索》、《灯塔看守人》等，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黑暗龌龊和描绘了波兰移民的悲惨处境。80年代，显克微支把注意力转向了波兰历史时期，写出了反映17世纪波兰人民抗击异族入侵的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这三部曲历史小说在当时波兰人民反对异族压迫、要求民族解放的形势下出版，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晚年，显克微支又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和《十字军》（1897）。《十字军》被认为是显克微支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是波兰历史叙事作品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以15世纪波兰人和日耳曼法国条顿骑士（十字军骑士）的冲突为题材，描述了1410年格吕沃尔德大战中，条顿骑士团的军队被斯拉夫联军打败的历史事实。作者把许多虚构和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实结合起来，比较丰富多彩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如小说描绘了十字军骑士团入侵波兰、立陶宛一带的烧杀掳掠罪行，波兰人民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特别是这部小说在激励波兰人民的民族自觉和爱国主义精神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也奠定了作者在波兰文学史上的地位。

鲍列斯瓦夫·普鲁斯（1847—1912）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贵族家庭，早年丧父，由其兄长抚养长大。在其兄长影响下，他参加了1863年的波兰起义，并被沙皇当局逮捕入狱。他于1872年开始文学创作，并以其幽默的短篇小说见称。其后他着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的中篇小说《前哨》（1885）描写波兰农村生活，比较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六、七十年代波兰农村的阶级分化以及德国殖民者对波兰农村的入侵。他的长篇小说《傀儡》（1887）被视为19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傀儡》以城市生活为背景，以由铁匠变为资本家的沃库里斯基对贵族小姐——“傀儡”依查别拉的悲剧性恋爱为线索，描绘了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些新型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堕落、残暴自私。艺术技巧方面，普鲁斯特有的幽默风格表现得最为明显。普鲁斯另外还著有一部反映古埃及生活的小说《法老》（1895），借以表现要求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思想情绪。

斯泰芳·什罗姆斯基（1864—1925）是波兰杰出的小说家，亦是20世纪初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思想指导者。他出生于一个没落小贵族家庭，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中短篇小说《黄昏》、《忘却》、《彼得博士》、《坚强的女人》等注意到了城市贫民的生活境况，并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情景。他的长篇小说《无家可归的人》（1900）给他带来极高的声誉。这部小说鲜明地刻画了一幅工人阶级艰苦处境的现实主义图画。他的《灰烬》又是波兰著名的历史小说，它叙述了波兰人参加拿破仑战争的故事，表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波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反映了劳动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艰难生活处境。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1867—1925）是波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语言

艺术家，他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农民》四部曲（1904—1909），其中包括《秋》、《冬》、《春》、《夏》四部。这套系列长篇小说描绘出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波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广阔图景，被认为是波兰文学创作中描写农村生活的佳作。

在保加利亚，这一时期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涌现出了伐佐夫、雅沃洛夫、埃林·彼林等著名作家。

伊凡·伐佐夫（1850—1921）是保加利亚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创作代表了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他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后来投身民族解放斗争，曾数次被迫流亡国外。他最早从事诗歌创作，先后有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1881—1884）和诗集《旗帜与古斯里琴》（1876）、《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解脱》（1878）等出版。这些诗作以丰富的题材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歌颂了保加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抒发了人民渴望自由的思想感情。另外，他还有不少小说和戏剧作品，其中最成功的当为长篇小说《轭下》（1887—1889）。《轭下》是此期保加利亚文学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以保加利亚 1876 年 4 月起义为背景，成功地塑造了伊凡·克拉利奇（化名鲍依乔·奥格涅诺夫）等一批革命者形象，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在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如作者说：“我的目的是描写奴隶制度最后日子里的保加利亚人的生活与四月起义的革命精神。”《轭下》出版以后，以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保加利亚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如在保加利亚先后再版了 20 多次，并被译成包括汉文在内的世界多种语言文字在诸多国家出版。

别依渥·雅沃洛夫（1878—1914）是保加利亚著名的诗人。他曾于 1896 年在家乡契尔邦城创立了保加利亚第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小组。20 世纪初，他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影响下，创作了大批优秀的诗篇。如在《息息法斯》里，诗人将人民描绘成神话般的巨人，他们准备拿起石头投向暴君。《囚徒》、《起义军之歌》反映农民起义的壮举，并谴责保加利亚贵族的沙文主义野心。特别是他的著名诗篇《农民的申诉》和《在牢墙前》中，预言了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表达了对旧制度的失望和对未来的信心。另外，雅沃洛夫还有《在维托沙山麓下》和《雷声停止的时候》等剧作亦有一定社会影响。

埃林·彼林（1878—1949）原名迪米特尔·伊凡诺夫，是 20 世纪初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加之又长期做乡村教师，所以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他的创作也以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而著称。如短篇小说《在另一个世界里》（1902）、《安得列什科》、《未收的麦田》、《犯罪》（1904）和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及《黑玫瑰》等。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农村富人及贪婪、残暴、伪善的资产阶级政客等反面人物形象，比较全面地反映保加利亚农村的社会现实情况。

在捷克，这一时期出现了聂鲁达、捷赫、伊拉塞克等著名作家，标志着

其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杨·聂鲁达（1834—1891）在布拉格小城区长大，因此对下层穷苦人民的生活比较了解。他认为捷克劳动人民应享有充分的民主与幸福，人的价值应体现在为祖国、为自由进步服务方面。这也是他创作的主题思想。他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先后出版有诗集《墓地之花》（1858）、《诗篇》（1867）、《宇宙之歌》（1878）、《故事诗和歌谣》、《平凡的歌》和小说集《各种各样的人》（1871）、《小城故事》（1878）、中篇小说《流浪汉》（1872）等。其诗开创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民歌体裁的先河，载入了捷克文学史册，其小说以幽默辛辣见长，又富深刻的社会意义。如其代表作《小城故事》，不仅具有幽默、简洁、朴素的艺术风格，而且描绘了布拉格小城区人民的生活及习俗，揭露了捷克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东西。斯瓦托普鲁克·捷赫（1846—1908）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是19世纪后期捷克文学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先后出版有诗集《晨歌》（1887）、《新歌》，长诗《奴隶之歌》（1894）、《收割者》，长篇讽刺小说《勃鲁契克先生新的划时代的十五世纪旅行记》（1888）等。这些作品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号召人民起来与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斗争。其代表作《奴隶之歌》通过两个青年奴隶不幸的爱情故事，以隐喻的形式描绘了捷克人民所遭受的民族压迫，憧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是捷克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捷克历史小说的创始人。他作为小说家先后创作有反映1775年捷克纳霍德边区农民起义的小说《斯卡拉齐的人们》（1875），反映17世纪末捷克边区农民荷德人起义的著名历史小说《狗头军》[汉译名《还我自由》（1884）]；描写15世纪胡斯运动的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在激流中》（1887—1890）、《抗击敌众》和《弟兄们》（1899—1908）；表现民族复兴的长篇小说《弗·勒·维克》和《在我国》（共四卷，1896—1903）。他作为戏剧家有描写胡斯运动的三部曲《扬·胡斯》以及《父亲》（1894）、《伏依娜尔卡》（1890）、《灯笼》（1905）等剧本。他的这些作品以劳动人民争取社会和民族的解放斗争为题材，几乎囊括了捷克数百年间的历史，其中主要人物多为捷克普通人民群众。因此，对了解捷克历史的、现实的社会情况有巨大的认识作用，对鼓舞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有巨大的精神力量。

另外，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有诗人巴沃尔·奥尔萨格·赫威兹多斯拉夫（1849—1923）和小说家马丁·库库钦（1860—1928）等人。他们的作品反映斯洛伐克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其生活状况。在匈牙利有小说家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和诗人奥第·安德烈（1877—1919）等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匈牙利文学已从浪漫主义转向了批判现实主义。在塞尔维亚有诗人约凡·约凡诺维奇·兹玛伊（1833—1904），小说家米洛凡·格利希奇（1847—1908）和剧作家布朗尼斯拉夫·努

胡斯运动（1419—1434）是捷克强大的反封建（以农民为基础）、反天主教的民族解放运动。

希奇（1864—1938）。在克罗地亚有小说家奥古斯特·宪诺（1838—1881）、克萨威尔·迪雅尔斯基（1854—1935）；斯洛文尼亚有诗人安东·阿什凯尔茨（1856—1932）和小说家伊凡·参卡尔（1876—1918）等人；阿尔巴尼亚有诗人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和安东·萨科——恰佑比（1866—1930）等人。这些作家虽然不同国度，但反映其本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其政府的腐朽黑暗，描绘其国家人民的生活境况仍是其共同主题。他们亦为东欧国家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北欧文学

北欧主要包括丹麦、瑞典、挪威和芬兰等国。其地理位置处于欧洲边缘，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直到19世纪初，随着北欧海上贸易的扩大，造船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活跃起来。资本主义的活跃，促使资产阶级先后参政。但纵观北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其资产阶级很少表现出革命性，它们惧怕国内农民运动，采取了和封建贵族妥协的立场。丹麦、瑞典和挪威就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叶先后建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其间在欧洲革命形势影响下，北欧各国人民不满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丹麦统治者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国内的危机，于1863年向普鲁士发动了战争，结果由于惨败丢失了大量领土，更引起各阶层的不满。挪威人民也不堪忍受异族的长期统治压迫，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起来斗争，到1905年终于获得了独立。

在这种形势下，北欧诸国文学普遍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并取得了突出成就。20世纪初无产阶级文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些都为欧洲文学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其中丹麦、挪威、瑞典三国文学的发展表现得更突出一些。

丹麦有勃兰兑斯、尼克索等人。

盖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是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家。他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864年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后去欧洲诸国旅游学习。曾任报刊记者、编辑和大学教授。他的文学评论作品主要收入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共六卷，1871—1890）一书。他高度评价19世纪西欧文学的成就，并以此为榜样，猛烈抨击丹麦文坛。他指出，这一时期丹麦文学创作处于停滞状态，比欧洲落后40年左右，丹麦文学虽具有淳朴的诗意，但内容空洞软弱，缺乏变革精神，这种文学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如其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逃避。”勃兰兑斯进一步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主要是由于丹麦作家大部分出身于官僚、牧师和大学教师，他们受官方和神学思想影响大严重，因此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基于此，勃兰兑斯大声疾呼，要求作家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在文学上造成一个“近代的突破”。同时“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

勃兰兑斯这种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不仅为丹麦文学昭示了某种方向，而且也震动了整个北欧文坛，并虽然他本人不断遭到攻击迫害，但他这些理论却迅速传播开来。如丹麦的雅可柏生（1847—1885），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1832—1910）、加尔伯利（1851—1924）、李（1833—1908）和基兰德（1849—1906）等人纷纷起来响应，一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文学运动。其结果是北欧诸国文学一反浪漫主义脱离实际的倾向，纷纷关注起社会实际来，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残暴进行了揭露批判，从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占了主潮。不过也应看到，勃兰兑斯及其追随者们虽然对社会不满，但也只是“提出问题来讨论”，没有明确的纲领，所以其中不少人后来转向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方面去了。

马丁·安德逊·尼克索（1869—1954）是北欧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他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工人家庭里，小时做过牧童、报童、农场雇工、石匠、鞋匠和泥水匠等，后来勉强上了大学。19岁时他参加了丹麦工人运动，开始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曾到过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对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广泛了解。特别是前苏联十月革命后，使他找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成了丹麦共产党（1920年创立）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到迫害，但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享年85岁。

尼克索从24岁开始创作后，60年来写了大批小说、诗歌、政论和戏剧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三部曲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1906—1910）、《蒂特一人的女儿》（1917—1921）和《红色的莫尔顿》（1945）。这三部曲围绕马克思主义者莫尔顿和机会主义者贝莱这两个中心人物展开故事情节。第一部《征服者贝莱》包括四卷。第一卷《童年》和第二卷《学徒》以贝莱青少年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丹麦普通劳动者在七、八十年代的贫困生活。第三卷《伟大的斗争》和第四卷《黎明》以贝莱成为工人领袖并蜕化为机会主义者的过程为背景，反映90年代丹麦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其间机会主义者的背叛行径。其中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反映社会丰富全面。代表了他早期创作批判暴露社会现实的特点。

挪威有易卜生和比昂逊等人。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著名的戏剧家，也是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少年时即因家庭破产而出外谋生。1849年欧洲革命浪潮波及挪威时，易卜生到首都克立斯替阿尼遏（今名奥斯陆）参加工人和学生运动，并开始文学创作。他前后有25部剧本和一些诗歌散文问世。

易卜生早期创作属于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他在50年代与60年代之间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赫尔格兰德的勇士》（1858）、《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历史剧。这些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再现了挪威人民所熟知的古代英雄人物如英格夫人、霍尔恩等及其事迹，对激发挪威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从而促进现实的

民族解放运动有积极作用。他的这些历史剧的成功为他赢得了一定声誉，他先后被卑尔根剧院和挪威剧院聘为经理及艺术指导。

1864年至1891年，易卜生由于不满本国统治者不支持丹麦人民反抗普鲁士而侨居意大利、德国等地，长达27年。他的创作也从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1866年至1867年他创作了诗剧《布朗德》和《彼尔·金特》。这两部诗剧是他从浪漫主义向批判现实主义转变的重要转折点，表现了他憎恶资产阶级政客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要求个性解放下的真正自由，揭露批判当时欧洲社会庸俗自私风气的思想，1877年以后，易卜生开始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的写作，主要有《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

《社会支柱》描写被称为“社会支柱”的保守党人物、船厂主兼海运家博尼克，他虽然被冠以慈善家、好丈夫与好父亲的美名，但实际上是个欺男霸女、唯利是图的恶棍。作者对博尼克的揭露讽刺，实际上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讽刺，并预示了这个社会的必然灭亡。

《人民公敌》是易卜生剧作中揭露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它描写科学家斯多克芒决心改造有传染病菌的温泉浴池，并提出了改建计划，但因触及了资本家的私利，所以遭到以市长为首的当权者和有产者的强烈反对。斯多克芒对此勇敢抗争，但却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作者借此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及其民主的虚伪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就像那有病菌的温泉一样，亦充满了病菌。

1891年，易卜生回到了祖国，他的创作也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一阶段他的创作重心逐渐从对现实的关注批判转向描述内心活动和精神分析。有《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博克曼》（1896）、《当我们死人醒来的时候》（1899）等剧作。这些作品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面仍有揭露批判，但批判力度已显然下降，不少作品还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与他晚年思想的孤独悲观是密切相关的。

《玩偶之家》（又译作《傀儡家庭》、《娜拉》）是易卜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曾震动欧洲剧坛，对世界文坛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剧通过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夫妻关系的剖析描述，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的问题。所以有人将《玩偶之家》比作“妇女独立的宣言书”。

《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娜拉是个年青貌美的女子，她小时候是父亲的玩偶——“小宝贝儿”，嫁给银行经理海尔茂后，又成为丈夫的玩偶——“小鸟儿”、“小松鼠”。娜拉很爱她的丈夫，曾假冒父亲的签名举债救过病重的丈夫，是个好妻子。海尔茂表面上也很爱他的妻子，俩人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当8年后，格洛克斯泰寄来了娜拉伪装签字借款的信时，海尔茂认为有损他的声誉，便辱骂娜拉是“伪君子”、“下贱女人”，并剥夺了她教养孩子的权利。虽然中途海尔茂由于信件的回回收又对娜拉表示了热情，但未获得谅解，他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娜拉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认清了海尔

茂肮脏的灵魂，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决心摆脱这种处境，于是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去追求新的生活。

娜拉是《玩偶之家》着力塑造的人物，她是个觉醒的知识女性，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在困难面前绝不低头。她还敢于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生活，所以一旦当她发现海尔茂的卑劣低下时，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并对整个社会也有了进一步认识。如她说：“从今以后我不能再相信大多数人的话。”她认为限制妇女正当权利的法律是“笨法律”，宗教也是一些无用的东西。她正是在勇敢地冲破资本主义的法律、宗教和道德的束缚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的反叛”，显示了他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当然，她的这种个人的反叛，是不会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从而也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海尔茂是与娜拉性格相对立的一个人物，是资产阶级市侩的典型概括。他极端自私虚伪，唯利是图，连妻子也成了他的玩物。作者通过对他的这种性格的刻划，揭露了资产阶级卫道士的冷酷无情，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欺诈，从而更加深了其批判力量。

《玩偶之家》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它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基础上，敢于大胆创造革新。当时欧洲戏剧多流行乔装、谋杀、决斗等惊险场面和意外事件，而此剧中人和事仿佛平常人都见过，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其次，该剧和易卜生的其它戏剧一样，把“讨论”作为戏剧的重要因素。如剧中娜拉冒名借债对不对？海尔茂维护公认的传统道德和法律对不对？娜拉最终该怎么办？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剧情的主要线索，而且也是读者观众所关心的。易卜生采用此法，不仅加强了剧作思想性，而且也加强了剧作的艺术魅力。另外，此剧还成功地运用了追溯手法和心理刻划的艺术手法。追溯手法如戏剧中的倒叙，运用得好可以使结构紧凑，情节集中。心理刻划如果成功亦可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易卜生在他的很多戏剧作品中都驾轻就熟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段。

《玩偶之家》在我国的影响也很大，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以《娜拉》为名发表了此剧本，1935年全国各地还纷纷将此剧搬上舞台，这一年被称为“娜拉年”。可见其影响之大。

比昂斯籐·马丁纽斯·比昂逊（1832—1910）是挪威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他作为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为挪威的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戏剧方面，先后创作了《新婚的一对》（1865）、《报纸主笔》（1874）、《破产》（1875）、《挑战的手套》（1883）等一系列著名的社会剧。这些作品由于猛烈地抨击了挪威资产阶级的丑恶行为而震动了社会，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并很快在欧洲其它国家上演，反响热烈。比昂逊也被誉为是与易卜生齐名的作家。

比昂逊的代表性剧作是《破产》，它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种种罪恶。其中主要人物是投机家梯尔德，他为了赚大钱，将农民的储蓄存款骗来去做

交易，使他们流离失所。当他在投机失败后，又企图用哄骗、哀求、恫吓等手段来挽救败局。最后在不得不承认破产后，又想携带工人工资潜逃。剧本对这个资本主义金融家丑恶自私灵魂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不愧为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但《破产》也和比昂逊的其它剧作一样，往往显出对资本家的过多同情，如在该剧的结尾悌尔德又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这也说明作者头脑中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思想。

瑞典有斯特林堡和拉格洛夫等人。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27）是瑞典著名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他出生于一个破产的商人家庭，当过小学教师、图书管理员和化学实验员，一生在贫困中度过。他先后创作了50多部多幕和独幕剧，60多部小说、诗歌和散文集。

斯特林堡的创作道路比较复杂。他早期的作品尖锐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如企业家的冒险欺诈、官僚的因循守旧、慈善家的假仁假义、贵族的寄生生活等，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小说《红房子》（1879）、《新国家》（1882）等。《红房子》通过对建立在商业式利害关系基础上的古拉乌斯·法尔克家庭生活的描写，揭露描述了名士派艺术家的浪漫生活、高利贷者的贪得无厌、报刊界的卖身求荣、好虚荣太太们的假慈悲。

但随着斯特林堡受叔本华、尼采、佛洛伊德等人哲学思想影响的越来越明显，他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便被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代替。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惯用的题材是“超人”的胜利，“贱民”的短视和妇女的道德败坏等。如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自然主义戏剧《父亲》（1887）、《朱丽小姐》（1888）、《伴侣》（1888）和《死亡的舞蹈》（1901）等，虽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们精神的摧残，但由于作者从变态心理出发，直接描写变态的社会关系，所以对问题的解决做了错误的回答，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自然主义主张。这些作品总是把妇女看成祸首，认为妻子对丈夫总是撒谎、欺骗。如在《父亲》一剧中，描写妻子为了和丈夫争夺女儿的好感，不择手段地用诡计把丈夫逼成疯子。这些人彼此虎视眈眈，时刻打算扑过去掐死对方。他们因为自己痛苦，就以别人更痛苦为快。这些剧本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把人生描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对生活做了歪曲的解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斯特林堡又重新修正了自己的立场。他在晚年又回到了自己以前的民主主义原则上来，反对军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压迫，反对文学中的颓废倾向。但他在1902年写的《梦的戏剧》，却又成为欧洲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该剧以无逻辑的梦魇的形式，描写天帝因陀罗的女儿为了了解人类来到人间的见识与感想。她来到人间后，发现“瑞典是一所疯人院”，处处充满剥削和压迫，但这位神的女儿得出的结论是，人间痛苦是由于人的欲望和堕落所造成的。于是乎

她和被折磨的人一起呼号，期望上帝来拯救。作者在剧本中表达了渴望摆脱痛苦的思想，但却又充满由于痛苦

而失去常态的绝望情绪。

斯特林堡对北欧的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文学影响较大。

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是瑞典著名女作家。她出生于瑞典西部伐姆兰省玛巴卡村的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从小喜爱文学，20岁后到斯德哥尔摩读书，毕业后在瑞典南部一个小城担任过10年女子中学的教员。她先后创作有长篇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假基督的奇迹》(1899)、《耶路撒冷》(1901—1902)、三部曲《吕温斯葛尔德的戒指》(1925—1928)和童话《尼尔斯历险记》(1906—1907)、短篇小说集《看不见的联系》(约1891)等。《古斯泰·贝林》是拉格洛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根据瑞典历史上曾存在的具有勇敢、仁慈、侠义、智慧的食客这一阶层及其传说写成，塑造了一个精力充沛、耽于嬉戏的可爱人物——牧师贝林。该小说具有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现实世界和超自然力量混合一起，既有对现实的刻划，也有对理想的歌颂。这部作品问世后，使拉格洛夫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尼尔斯历险记》是拉格洛夫为儿童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作品，但却使她在北欧获得了与《安徒生童话》作者安徒生齐名的美誉。

拉格洛夫于1909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14年又被选为瑞典科学院院士。这两项殊荣是对她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

6. 俄国文学

俄国与东欧北欧诸国一样，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西欧各国晚。当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已确立了统治地位时，俄国还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资本主义才得到迅速发展。此时俄国的农奴制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尤其是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更暴露了沙皇俄国农奴制的腐败，从而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其它人士的反政府情绪，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这一农奴制的改革不但没使农民得到好处，反而遭受了更残酷的剥削压榨，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这就造成俄国与西欧诸国的不同处是，虽然资本主义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农奴制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地主照旧盘剥农民，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农民在双重压迫下，继续举行反抗起义。这种情况引起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意，70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这样造成俄国无产阶级还未登上历史舞台时，平民知识分子承担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责任。但民粹派无视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得到很大发展的这一事实，企图通过半封建的“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理论上认为历史的发展由少数杰出人物所决定，而人民是“群氓”，因此策略上采取

恐怖暗杀手段，结果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失败。80年代，民粹派进一步堕落到自由主义者和富农的代表，蜕化为改良主义者。这一时期（1861—1895）被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日益成长壮大。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传播，1895年列宁领导成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0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做了思想准备。1903年，经过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沙俄势力，为其后的十月革命进行了一次总演习。在1908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年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不少革命同路人动摇变节，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颓废文化泛滥，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者列宁与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作了多方面的准备。终于在1917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这一时期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时期”。

俄国在世界现代前期这一历史时期是一个充满动荡与活力的丰富多彩的时期，它对文学的影响也是直接和多方面的。在这种形势下，这一时期俄国文坛除批判现实主义取得巨大成就外，颓废文学也风靡一时，无产阶级文学也有了长足进步。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进入繁荣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由于它不能适应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而逐渐衰落。其中创始人是伟大作家普希金（1799—1837）。普希金后期创作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吸收了各流派的成就，在诗体小说、戏剧、长诗、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中，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具备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主要特点。此外，其它一些以浪漫主义见长的作家如莱蒙托夫（1814—1841）、果戈理（1809—1852）等人，也于30年代转向现实主义。他们的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对农奴制度的批判。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者，别林斯基称他为“自然派”（19世纪40年代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流派）的领袖。他的《钦差大臣》（1836）、《死魂灵》（1842）等，对专制农奴制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其中一系列农奴主和官僚形象可以与西欧文学中的著名典型媲美。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文学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了繁荣期。这一时期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变化了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传播，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就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身发展看，创作经验已有

见《列宁全集》第20卷《论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了相当积累，艺术手法已相当成熟，大批作家已能写出高度概括、深入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了。于是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如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父与子》（1862），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186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4），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等。这些作品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反动和落后，反映了人民的觉醒，人物形象“多余人”被“新人”所替代，说明贵族知识分子已经丧失其进步意义，平民知识分子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此基础上，进入19世纪70至90年代初，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走向衰落的情况下，仍保持了繁荣并除原有的一些作家仍处创作旺盛期外，又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绥拉菲莫维支、魏烈萨耶夫、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人。列夫·托尔斯泰反映俄国社会大变动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否定地主阶级专政国家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小说《复活》，达到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契诃夫写了大批中短篇小说如《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广泛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亦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成就之一。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和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把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引进了俄国文学，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做出了贡献。

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走向衰落，除少数作家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外，大多已分化转向。如安德烈耶夫（1871—1919）等人倒向反革命阵营，和所谓颓废派合流；库普林（1870—1938）等人不能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大潮，陷入悲观失望，在创作中表现了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绥拉菲莫维支从1905年开始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最后转向社会主义；后起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批判腐败没落的贵族社会。

综观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端于30年代，兴盛于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又取得了顶峰性成就。与西欧诸国文学相比较：时间方面，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走向衰落，而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兴盛繁荣了一段时期；思想内容与创作手法方面，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都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批判，不同处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资本主义丑恶现实和封建残余势力，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揭露专制农奴制及其残余，当然后期也兼及有揭露资本主义的。俄国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不同角度对专制政策的残暴、农奴制的腐朽、贵族上流社会的堕落、“多余的人”的苦闷徬徨、农奴制和城市“小人物”的悲苦命运、平民知识分子的探索以及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事件等，做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反映，一时成了他们创作的重要主题。其次，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讽刺艺术使用方面比西欧更突出一些。

如享有世界声誉的讽刺大师果戈理、契诃夫等人以“笑”作为武器，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普希金、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也以独特的方式对专制农奴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另外，俄国文坛很注意创作与批评的密切结合，一些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及时总结“自然派”的创作经验，批评某些错误性的倾向，促进了创作的繁荣发展，并形成了系统的文学理论。正是如此，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在西欧衰落的情况下，又取得突出成就，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作家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世纪90年代，俄国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俄国文学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突出标志之一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伟大革命家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学从理论方面给予了论述。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文学事业要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还提出“两种文化”的学说。即还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里，有居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文化和处被统治剥削地位的劳动群众文化。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两种文化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纲领和批判继承一切文化遗产的指针，对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基于列宁这一思想，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文学的宣传鼓动作用非常重视，在《火星报》、《真理报》（1912年创刊）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过许多革命作品，培养了无产阶级作家，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前20年，俄国涌现出了不少无产阶级作家。其中较著名者有高尔基、普列汉诺夫、绥拉菲莫维支、别德内依等人。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彼希柯夫，他不仅是俄国的伟大作家，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时跨世界现代前后两期，此处只对他前期创作作一简要论述。

高尔基出身于工人家庭，曾当过童工，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可分为早期创作（1892—1899）和第一次俄国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创作（1900—1916）两个阶段。他最早是以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进入文坛的。这方面代表作有宣传自由高于一切的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2）和著名浪漫主义短篇《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与《鹰之歌》（1895）。《伊则吉尔老婆子》谴责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歌颂献身集体的崇高品质；《鹰之歌》抨击了以蛇为象征的苟且偷安、胆小怕事的小市民习气，赞扬以鹰为象征的追求光明、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行为。这类作品反映了正在觉醒的人民群众反对专制统治、渴望自由解放的心声。另外，这一阶段高尔基还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的中短篇及长篇小说。如中短篇

见《列宁选集》第1卷。

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1893）、《切尔卡什》（1895）、《玛莉娃》（1897）、《科诺瓦诺夫》（1897）、《二十六个和一个》（1899）和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1899）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工农革命者形象，但却也真实地反映底层人物的遭遇与思想感情，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小市民的庸俗保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伪堕落，展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斗争情绪。

1900年后，高尔基直接参加了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接受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教育，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学创作也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他以《海燕之歌》（1901）迎接了20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这首革命颂歌以象征和寓意的艺术手法，充满激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鼓舞人民走向胜利的战斗号角。《海燕之歌》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被看作是一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起了极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列宁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曾在他的《暴风雨之夜》（1906）中引用此诗中的企鹅形象来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丑恶嘴脸，并以此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豪迈诗句结束全文。1905年前夕，高尔基为继续深入批判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罪恶，还创作了不少剧本，较著者有猛烈抨击自私保守习气的《小市民》（1901）和展现流浪汉悲惨生活的《底层》（1902）。

1905年，高尔基投身俄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创作了描写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母亲》（1906）和剧本《仇敌》（1906），反映农村革命斗争的中篇小说《夏天》（1909），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罪恶的政论集《在美国》（1906），批判小市民顽固、落后、保守、自私习气的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1909）和长篇小说《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描写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的童话体短篇小说集《意大利童话》（1911—1913）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的头两部《童年》（1913）、《人间》（1915）等。《母亲》分上下两部，它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地区的工人“五·一”大游行事件，生动地描绘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具体地展示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形象地塑造了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世界文学史中第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形象。《母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它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另外，高尔基还在1914年至1917年先后主持出版了《无产阶级作家文集》，对团结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起了积极作用，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又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之三《我的大学》（1922），描写俄国资本主义兴衰历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形象地再现伟大领袖列宁光辉人生的特写性回忆录《列宁》（1924）等，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他世界文豪的地位。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他的情况留待下面评述。

亚历山大·绥拉菲莫维支（1863—1949），原姓波波夫，少年生活贫困，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参加了革命小组，并曾因写传单声援因谋刺沙皇而被判死刑的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而遭拘捕流放。流放期间，他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浮冰上》（1889）。该小说通过对农民索洛卡深受富民剥削的描写，反映了旧俄时代农民的悲惨生活。19世纪90年代，他又创作了《岔道夫》、《在地下》、《无票乘客》等一系列反映劳动人民悲惨生活，揭露资本主义残酷压榨的短篇小说。1903年，绥拉菲莫维支参加了高尔基领导的文学团体“星期三文学联合会”，逐渐接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05年俄国革命运动高涨时，他成为俄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创作有中短篇小说《炸弹》（1905）、《葬礼进行曲》（1905）、《沙原》（1909）和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1912）等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描写工农运动，反映他们遭受的压迫及其成长历程，揭露资产阶级的残暴，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文学特点。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写的著名长篇小说《铁流》（1924），更使他蜚声世界文坛。

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原名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伏罗夫，他的创作可分十月革命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以政治抒情诗为主。如《连拿事件》（1912）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揭露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树皮鞋和皮鞋》（1912）、《杜鹃》（1912）以寓言体形式嘲讽统治阶级和孟什维克，鼓舞了人民斗志。特别是他十月革命前的代表作长诗《关于土地、关于自由、关于工人的命运》（1917）写两个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反映了1905~1907年这段时期俄国的无产阶级斗争，使他成为俄国早期无产阶级诗人。十月革命后，别德内依的创作取得了更大成就，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成为苏维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这一时期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激昂澎湃，一些贵族资产阶级面对这种形势表现出恐惧、颓唐的心理和仇视反对，体现在文学方面颓废文学风靡一时。其中主要有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等文学流派。最早出现的是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象征派，它不仅受到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且还和茹科夫斯基的消极浪漫主义、费特的“纯艺术”诗歌有联系。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梅烈日柯夫斯基（1865—1941）、巴尔蒙特（1867—1942）等人。他们的诗歌浸透了神秘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为“自我”是唯一现实，即便描写客观世界也以上帝和某种超自然、超现实的东西来象征表现，抒发了一种悲观颓丧、孤独厌世的情绪。

“阿克梅”派出现于20世纪初，“阿克梅”一词来自希腊文，意为“顶峰”。该派的代表人物有诗人古米略夫（1886—1921）和阿赫玛托娃（1893—1966）等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诗作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顶峰，并宣传回到人类原始状态，赞美兽性，渲染色情和贵族资产阶级生活情趣，歌颂帝国主义

的掠夺战争，同时在个人思想意识方面表现出极度的绝望情绪。

继“阿克梅”派后，未来派也喧嚣一时。未来派作家狂热追求形式，空喊“革命”口号，标榜创造“未来艺术”，其作品文字晦涩难懂、佶屈聱牙，实际上是以无政府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些不利于革命的颓废派文学，一些无产阶级作家给予了批评。如高尔基在《保尔·魏尔仑和颓废派》等文里，指出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普列汉诺夫也谴责颓废派在虚伪地宣传艺术的无思想性和追求形式主义。十月革命后，颓废派文学在前苏联走向衰亡。

（1）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的1000多万字的作品，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众多，体裁之全面，艺术之高超，都是同时代之作家难以媲美的。列宁曾著文数篇对托尔斯泰进行了全面评价。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说他“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另外，列宁也指出，托尔斯泰生活于1862年至1904年这一俄国变革的时代，其思想创作充满矛盾，既有对农奴制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又充满消极软弱空想的俄国宗法制农民的思想情绪。列宁这种评论，是我们评述托尔斯泰的指导性意见。

托尔斯泰出生于土拉省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贵族家庭，是一个继承了几处庄园和300多名农奴的伯爵。他一生中大半时间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1844年进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后转学法律，受卢梭和伏尔泰启蒙思想影响，开始对农奴制社会与学校教育不满，于1847年退学回家。1851年至1854年自愿到高加索服兵役，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更增加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不满，并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是他创作的探索与成长期。这期间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幼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和宣扬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及擅长心理分析的艺术特色。《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5—1856）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反映了俄土战争，揭露了贵族军官的贪婪、虚荣和追求名利，歌颂了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表现了作者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通过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进行农业改革失败的经过，反映了作者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前提下改善农民生活理想的破灭，是托尔斯泰早期探索农民问题的总结。此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描写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和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1852—1862年写成的《哥萨克》，通过把哥萨克人的纯朴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见《列宁选集》第2卷。

生活与贵族糜烂生活的对比描写，表现了作者返回自然、生活平民化的思想。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旅行，访问了法、德、意、瑞士等国，写成了短篇小说《琉森》（1857），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文明、平等的虚伪性进行了批判，谴责了资产阶级的自私无耻。1860年至1861年，托尔斯泰再度出国考察，进一步扩大了文学视野，加强了对俄国落后及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虚伪的认识，为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主要围绕贵族地主阶级生活、战争和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三方面展开，反映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因此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是探索型的人物。

中期（1863—1880）是托尔斯泰创作的全盛期，也是他思想上产生激烈矛盾和酝酿转变的时期。他面对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企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于是潜心研究历史，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这部巨著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以四个贵族家庭的生活史为线索，描写了1805—1820年间俄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各阶级、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它是一部反映社会生活广阔、人物众多和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著，不仅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而且也是世界文学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后，已进入70年代。这时俄国社会发生剧变，农奴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这种社会现实引起托尔斯泰的关注与思考，于是他又写成了反映现代生活的《安娜·卡列尼娜》。该小说全面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剧变，对社会的批判更加尖锐，思想探索进一步加强。是继《战争与和平》后的又一部鸿篇巨著。同时也说明他的思想探索已逐步形成一个体系。即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寄生腐朽性有了更深认识，另一方面却错误地把宗法制农民的落后意识也当成了美德。因此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总是把找到“心中的上帝”，找到“爱一切人”的宗教博爱思想作为探索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正是所谓的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为主要内容，以宗教博爱思想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体现。列宁对“托尔斯泰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

1881年至1910年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晚期，也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这时他广泛深入社会实际，目睹了农民的贫困不满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抛弃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采取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指出私有制是“邪恶的根源”，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掠夺人民”的机构，俄国“现有的生活制度应该毁灭”。同时他的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的说教也表现得更为强烈。这在他的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89），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哈吉·穆拉特》（1886—1904）和大量的政论文里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他的长篇小说《复活》里表现的更为鲜明。《复活》具有总结的性质，就其揭露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来说，在俄国和世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都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同时其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表现得也很明显。

托尔斯泰到了晚年陷入一种极度苦闷的状态中，他的平民化思想与贵族家庭生活经常发生冲突。他深深为自己的贵族生活与平民的差距而感到羞愧，因此曾宣布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和著作权，并过起了布衣素食的平民生活。发展到最后，终于在 82 岁高龄离家出走，途中突患肺炎，与世长辞。

《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一条是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幸福的悲剧；另一条是列文面临农村破产而进行的经济探索改革。小说通过这两条线索真实地反映了 70 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农村宗法经济的急剧崩溃，以及这一时期各阶层阶级的思想情绪，既深刻地批判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腐化堕落现象，又浓重地表现了作者的道德说教，是作者世界观激变前夕的完整反映。

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由家庭做主嫁给比她大 20 多岁的官僚卡列宁，与这个刻板自私、伪善冷酷的“官僚机器”度过了 8 年没有爱情幸福的生活。8 年后，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安娜深深地爱上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她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侮辱打击。卡列宁拒绝与她离婚，使她背着不贞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安娜毫不屈服，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展开斗争。可就在这时，渥伦斯基这一彼得堡花花公子的活标本，虽然曾真心爱过安娜，也表示过敢于牺牲名利的热情，但他并未真正理解安娜，只不过是满足一时的虚荣与私欲，当真正威胁到他的名誉地位时，他就对安娜表示冷淡，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迫害安娜的逆流，给安娜以致命的一击。最后终于使安娜在痛苦与绝望中自杀身亡。

安娜的叛逆反抗在俄国当时社会条件下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罪恶的上流社会、虚伪的封建道德、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造成了安娜的悲剧。因此安娜的悲剧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认为她比上流社会那班人好，是社会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对安娜选择的道路又持否定态度，认为她破坏了家庭，违反了上帝的“禁欲主义”和“博爱”的教义，因此也必然受到报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安娜形象的揭露批判力量。

列文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理想人物，带有作者明显的自传色彩。他站在贵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孜孜以求地想寻找一条振兴农业、发展经济的出路。但他努力进行的却只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勤劳、朴素、节俭，另一方面他的改革设想是与农民合作经营，均分红利，以共同富裕的不流血革命来缓和阶级矛盾。显然，他的这种思想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空想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列文改革失败后，即陷入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深渊，最后又从宗法农民弗克尼奇身上领悟到要“为上帝、为灵魂活着”，要“爱人如己”，感到“上帝”就在自己心中。列文及其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生活。它既表现了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又“暴露了他（作者）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眺这个危机的方

法”，表现了作者的“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

《安娜·卡列尼娜》在托尔斯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思想或艺术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思想方面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比过去加深了，但还未达到后期作品那样强烈的程度，阶级调和、宿命论、不抵抗主义说教比前期加重了，但还没达到《复活》那样严重的程度。艺术方面已清楚体现了托尔斯泰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出路的创作特点。其次，作者一贯擅长的通过人物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也有明显体现。如安娜临死前长达数万言的内心独白，以其思维的间断、跳跃性，表现了安娜内心失去平衡后的剧烈活动，并以其独特的思维规律和思维结构，把安娜纷乱的思绪、复杂的感情，通过她的印象、感觉、回忆，联想有机地展现了出来，增强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另外，该小说还通过一连串的心理细节刻划，来反映人物心灵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心灵辩证法”是作者可贵的艺术探索与独创，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华。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花了 10 年功夫，六易其稿而写成的一部震撼人心、轰动当时俄国文坛的长篇巨著。它艺术地概括反映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的社会生活，完整地体现了托尔斯泰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伦理观点，以其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以及其巨大的艺术力量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复活》的主要故事情节是描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在他姑妈的庄园里诱奸了农奴的私生女邱霞·玛丝洛娃，然后又将其抛弃。而玛丝洛娃由于怀孕而被赶出庄园，受尽凌辱，最后沦为妓女。后来玛丝洛娃在一件谋财害命的案件中蒙受不白之冤被押上法庭，与担任法庭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见面。聂赫留朵夫良心受到谴责，决心为玛丝洛娃伸冤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但在上述过程中他看清了沙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专制制度的惨无人道，于是决心与本阶级决裂，并跟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提出与其结婚。玛丝洛娃被他的真诚悔过而感动，并革除了妓女生活留下的恶习，道德上也变得高尚起来，但最后为了不拖累聂赫留朵夫，还是嫁给了同被流放的政治犯西蒙松。聂赫留朵夫最后在《圣经》中得到启示，把“博爱”作为生活道德准则，因而得到了人性的“复活”。

《复活》通过对玛丝洛娃一生悲剧及其冤案的描写，全面批判了沙俄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并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不幸和罪恶根源的探索与如何消灭这种不幸与罪恶的大无畏精神。如通过玛丝洛娃案件的错误审判过程，无情地撕破了沙俄法律制度“神圣”、“公正”的外衣，暴露了其虚伪和草菅人命的本质。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受尽老爷们凌辱的玛丝洛娃，而主审和陪审却是些荒淫无耻、冷酷昏庸的贵族资产阶级老爷。他们的审判根本不是申张正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见《列宁全集》第 17 卷。

义，而是愚弄压迫无辜者，草菅人命。对此托尔斯泰通过聂赫留朵夫之口指出：“依我看，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维持那种对我们阶级有利的现行的社会制度罢了！”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其次，《复活》还把批判矛头指向俄国整个官僚机构。一方面揭露了身居要职的官僚权贵们的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生活极端奢侈化，另一方面暴露了他们的自私贪婪、卑鄙虚伪、昏庸愚蠢和冷酷残忍的嘴脸。作者说他们失去了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所以“比强盗还可怕”。另外，作者在《复活》中还对比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进行了无情揭露，对人民生活痛苦不幸的原因从经济制度方面进行了探索。他在描写农村破产情景时，指出农民不幸的根源在于被剥夺了土地。因而他按照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改良理论，提出消灭土地私有的主张，表达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与情绪。

但是，综观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表达的批判思想，由于采用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所以虽然相当尖锐激烈，可充满矛盾和局限性。如他批判沙皇专制的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批判了官方的教会，却又宣传宗教博爱主义，鼓吹新宗教；批判了土地私有制，却又寄希望于善心地主的改革，等等。这体现了托尔斯泰在观察社会时不愧是目光锐利的巨人，但在寻求解决矛盾的答案时却又渺小得多。这也正是他世界观矛盾的所在。

《复活》围绕男女主人公的灵魂苏醒、精神再生，塑造了两个丰满而又复杂的人物形象。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作品中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女主人公，作者在她身上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关注。她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悲惨命运。她少年时天真烂漫，纯洁美丽，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但当被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强暴又抛弃后，她就再也不相信上帝和善良了，后来沦落为娼，更使她变了样。她每逢精神苦闷就抽烟喝酒，或找一个男人谈情说爱以填补空虚的灵魂。直到被法庭错判流放，她与聂赫留朵夫的再次会面，聂赫留朵夫的忏悔关怀，才使她的爱情又被唤起，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美好品质逐步“复活”。实际上她的真正“复活”是在和革命者的接触中完成的，西蒙松所表示的高尚爱情对她起了重要作用。她的卑下地位，使她和这些革命者的接触中理解了生活的真正含义，并由衷地钦佩他们。从此她憎恶过去，决心弃旧图新，并认识到与聂赫留朵夫这些贵族阶级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勇敢地与革命者结合，完成了她精神上的真正“复活”。

聂赫留朵夫是个“忏悔贵族”的典型，他经历了由“精神的人”变为“兽性的人”，又以“兽性的人”“复活”为“精神的人”这样一个过程。他青年时代曾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纯洁、正直的人。到他进入军队，混迹于上层社会后，由于受环境的熏染，变得追欢逐乐，纸醉金迷，过起荒淫腐化的生活。这时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把她抛弃。直到他在法庭上再次与玛丝洛娃见面，才又引起他内心的强烈震动。他感到玛丝洛娃的悲剧是由他一手

造成的。所以他忏悔，向玛丝洛娃认罪，并为无辜的玛丝洛娃奔波上诉。上诉过程中他体验到了上层官僚们的腐败，并上升到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否定，从而放弃家庭财产，随被流放的玛丝洛娃到了西伯利亚。他在这一“赎罪”、“忏悔”以至转变过程中，还大量接触了工人、农民、政治犯等，他们的苦难以及进步思想对他的转变也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更坚定了他对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和国家机器否定的决心。虽然作者把他的道德复活描写成是领会了《福音书》精神的结果，但却抹煞不了他复活的实际内容，即他否定了自我及其所属阶级，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来，为他们的利益进行大胆辩护。

聂赫留朵夫这一典型反映了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社会阶级斗争接近决战阶段，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事实。同时，聂赫留朵夫也是托尔斯泰塑造的进行精神探索的一系列“忏悔贵族”形象的发展和总结。

《复活》在艺术手法方面也取得了杰出成就。首先，作品以主人公的活动为线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诸如城市、农村、政府机关、教堂、妓院、监狱、旅馆、剧院、庄园、农舍等各个方面，描绘了官僚、商人、军人、僧侣、妓女等各色人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概括力。其次，《复活》运用了强烈的对比描写手法。如小说一开头，作者描绘了一幅春天的图画，接着描写不是所有人都能领略到春光的明媚，而是有很多人被关在监狱里，用春天对照了黑暗的社会；当玛丝洛娃在押解中走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而导致她堕落的人却躺在一高大的弹簧床上；当一批戴着镣铐、冒着严寒、濒临死亡的所谓罪犯奔波在流放路上时，一些乘坐华丽马车的贵族却是为了度夏。这种鲜明的对比描写，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有力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另外，托尔斯泰一贯擅长的心理描写，在《复活》中也表现得非常鲜明。如小说中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内心独白，写出了他内心激烈、复杂、深刻的思想斗争。他在法庭上认出被审判的玛丝洛娃时，心绪复杂。当玛丝洛娃惊恐地四下张望，聂赫留朵夫提心吊胆地想“莫非她认出我来了？觉得血涌上了他的脸。……”这里既有对玛丝洛娃的怜悯，又有他自己的羞愧，真实地表现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理状态。还有玛丝洛娃在风雨之夜，从车站赶回来的那段感受，也展示了玛丝洛娃的心理变化，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此外，《复活》在结构布局、语言锤炼、讽刺运用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总体上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2）契诃夫及其短篇小说《变色龙》、《套中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最后的伟大代表之一。他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短篇小说艺术巨匠之称。另外，他还是一位戏剧改革家，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大冈罗格市一小市民家庭，少年生活较贫困，曾依靠做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 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翌年开始文学创

作。他早期的作品大多为幽默故事，其内容有揭露专横暴虐的权贵及其爪牙方面的篇什，也有抨击庸俗市侩习气的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某些特点。如《小公务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苦恼》（1886）、《万卡》（1886）等，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以及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与庸俗猥琐。《变色龙》和《普里希别耶夫中士》（1885）则鞭挞了专制暴政的奴才们的专横跋扈、暴戾乖张的丑恶嘴脸，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黑暗时代的某些特征。这一时期，契诃夫对社会黑暗的根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探索之余表现了深深的忧虑苦恼，但他对前途还是充满信心。如中篇小说《草原》（1888）表达了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人民必须主宰俄罗斯的观点。《草原》标志着契诃夫创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是其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契诃夫进一步对社会进行了探索。他主动深入社会，接近人民，曾于1890年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考察中亲眼目睹了政治犯的悲惨遭遇及其斗争精神，以及沙皇专制制度的残暴。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来后，他创作了不少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等。《第六病室》描写一座小城医院里发生的悲惨故事。医生拉京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他虔信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哲学，在他主持院务的20多年时间里，他面对医院里的恶劣环境，采取了消极态度，使医院变成一个毫无人道的监牢。最后拉京也由于同情一个主张用斗争来争取自由的所谓精神病人格罗莫夫，引起专制邪恶势力的注意，在格罗莫夫被关入第六病室后，他自己也被关入第六病室，并被折磨致死。这篇小说就是通过对第六病室黑暗生活及拉京毁灭的描写，猛烈地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残暴、腐败、黑暗，批判了托尔斯泰主义“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错误观念，客观上起了唤醒人民的作用。

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契诃夫在俄国革命运动高涨形势的影响下，思想和创作更有了积极转变。1900年他当选为科学院文学部名誉院士，但不久由于抗议沙皇取消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而放弃此头衔，并与高尔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时的作品有《带阁楼的房子》（1896）、《套中人》（1898）、《醋栗》（1898）、《在峡谷里》（1900）、《新娘》（1903）等。这些作品一扫以前的忧郁沉闷情调，充满欢乐自信气氛。如《新娘》相信旧制度一定要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到那时候，这里就会有金碧辉煌的大厦，美妙的花园，奇异的喷泉，卓越的人”。

契诃夫还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和戏剧革新者，其重要剧作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等，这些剧作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追求，艺术方面注重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揭示人物的情绪变化，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其代表作《樱桃园》充

满乐观情绪，反映了俄国新派实业家企业主如何取代俄国古老贵族地主的历史变迁，同时也表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对旧生活的否定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契诃夫于 1897 年因肺病到雅尔达休养。1904 年出国求医，同年 7 月 15 日在德国疗养地巴登维勒尔逝世，年仅 44 岁。

契诃夫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他一生创作了 700 多个短篇小说。其中最能代表他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是《变色龙》和《套中人》。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富有特色的一部优秀作品。它主要描写巡官奥楚蔑洛夫审理狗咬人案件的过程。一个首饰匠赫留金的手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惊动了警官奥楚蔑洛夫来断案。开头奥楚蔑洛夫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声言要把这条疯狗处死，并查明狗的主人，其威风高傲不可一世。但当人群中有人说是将军家狗的时候，他马上浑身燥热，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反而斥责起赫留金来。继而又有人说可能不是将军家的狗，将军家全是大猎狗时，奥楚蔑洛夫经过再三询问认为确实可信时，又变回了原来的观点。但这次奥楚蔑洛夫表现的就老练狡猾了，他一方面安抚赫留金，另一方面说将军家不会有这样的“下流胚子”。这是他的第二次“变色”。第三次“变色”是由一个巡警说他在将军家看到过这样的狗引起的。奥楚蔑洛夫一听又吓得像得了虐疾似的，马上命令把狗送到将军家，并大骂赫留金是“猪猡”、“混蛋”。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将军家的厨师来刚说此狗不是将军家的，奥楚蔑洛夫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将狗处死。当厨师又说是将军哥哥家的狗时，奥楚蔑洛夫马上又毫不迟疑地赦免了狗的“死刑”，并赞扬此狗聪明伶俐，将其送了回去。而赫留金不但没有得到赔偿金，反而遭受了一通侮辱。

《变色龙》就是通过奥楚蔑洛夫在断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把一个媚上欺下、随风转舵的沙皇专制制度的走狗爪牙的丑恶形象，纤细无遗地刻划了出来。同时，这一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力。奥楚蔑洛夫作为沙皇当局的警犬，既有暴戾乘张、欺压百姓的一面，又有趋炎附势、奴颜卑膝的一面。但本质的一点就是一条走狗。所以，作者刻划这一艺术形象，有力地批判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及其豢养的走狗，同时对社会上见风使舵、变节背叛、迎合权势的社会风气也进行了有力地嘲讽。

《套中人》是契诃夫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它塑造了古希腊语教员别里科夫这一典型形象。别里科夫极端保守顽固，害怕并仇视一切新生事物，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道士。他整天把自己装在一个“套”子里，对任何有革新举动的事情都大感震惊，如对别人骑自行车都认为不可饶恕、有失体统，最后终于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得病死去。作者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末俄国处于黎明前黑暗时创作这部小说，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一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实际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别里科夫生活在阴暗窒闷、僵死恶浊、因循守旧这样一个环境里，造成了他的特殊性格，反过来他这类人又为虎作伥，强化了这种政治环境。作者在此作品中发出了“不能再照这样

生活下去”的呼声，提出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死了，可这样的环境还存在，号召人们要为社会人类的进步改变这种局面。这正是该小说的精华所在。

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在艺术方面也取得了极高成就。高尔基于 1898 年写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中就盛赞他“在俄国文学中还没有一个可以与您媲美的短篇小说家”。美国评论家弗朗西斯·纽曼也认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绝顶完美的地步”。综观其成就有如下几点：一、作者善于通过平凡小事来揭示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显示了作者深入挖掘生活和进行高度艺术概括的能力。二、作者塑造了一批具有契诃夫特殊情调的人物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中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人人皆知的典型。三、在创作手法方面，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特殊风格。他的短篇小说多为讽刺小说，其新颖活泼、短小精悍、含蓄简练、富于哲理，以及情节发展的出于预料又在情理之中等，具有强烈深沉的艺术魅力。四、语言运用方面词汇丰富、比喻生动、富有节奏感。托尔斯泰称契诃夫是散文中的普希金，就是指他的语言的凝炼和富于音乐性。

（3）普列汉诺夫及其文艺批评理论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1875 年至 1883 年时基本是个民粹派主义者，上大学时曾编辑过民粹派刊物。后遭政府迫害流亡到国外，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83 年，他在日内瓦组织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向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开始批判他早期信仰的民粹派的一些错误观点，写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无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等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列宁称其“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列宁对他这一时期的总体评价是“他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 1883 年至 1903 年的 20 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但到了 1903 年以后，他思想开始右倾，在工农联盟等问题上与列宁产生分歧，以至在 1903 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倒向孟什维克并成为其一个首领，敌视十月革命。

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他著有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批评唯心主义理论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等方面的著作。如他的《没有地址的信》（1898—1900）这部探讨艺术起源问题的著作，用大量原始部族的史料，论证了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等）起源于劳

列宁：《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

列宁：《论冒险主义》，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

动，批驳了一些美学家认为艺术产生于游戏或内心活动等唯心主义观点。他的《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文章，又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艺术与生活关系。他根据欧洲文学的实际，分析了法国18世纪古典主义衰落和19世纪欧洲颓废文学盛行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社会政治历史和艺术欣赏趣味对文学艺术的重大影响，并且还批评了各种内容空虚的颓废派文学。其间，普列汉诺夫还有不少作品对世界文坛知名的易卜生、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进行了评述。他肯定了先进思想对这些文坛巨匠所起的良好作用，同时又从反面论述了落后思想会给艺术带来危害。这正是他要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观点的体现。另外，他在一些评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文章中，肯定了“美是生活”这一定义。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他的观点中也存在着某些失误甚至严重错误。如他受康德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美是旁观和直觉的，是没有私心的等，表明他的唯物主义美学观还是不彻底的。再如他在对待艺术与科学、感情与理智等的关系方面，往往将二者对立或割裂开来，缺乏辩证观念。到了他晚期倒向孟什维克后，他更接近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列宁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也表示了反对，从他自己早期的观点中倒退不少。

三、世界现代前期的亚非文学

1. 概述

亚非地区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其文学在中古以前是雄居世界文学高峰的。如其间的埃及文学、巴比伦文学、希伯来文学、印度文学、中国文学、波斯文学等，均取得了重大成就。有的还对欧洲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印度著名的寓言故事集《五卷书》由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传到欧洲后，对英国作家乔叟、意大利作家卜伽丘、法国诗人拉·封丹等人的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内容，对东西方文学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1世纪末法国骑士抒情诗人也向阿拉伯诗人学习过诗艺。这些都说明当时亚非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到了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非国家普遍遭到欧美列强的侵略奴役，加之这些国家内部的因素，亚非文学从总体上看，明显地落后于世界文学潮流了。

世界现代前期这一历史阶段，除日本经“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外，亚非各国几乎都沦为西方入侵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保护国。这些殖民主义者对亚非各国的瓜分奴役，造成了这些国家长期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局面。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并未吓倒亚非各国人民，他们继承过去反殖、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同时在内部积极进行文化社会改良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如中国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朝鲜的“甲午农民战争”，越南的“安世农民游击战争”，印度的“民族大起义”，波斯的“巴布教起义”等。所以，世界现代前期的亚非各国史既是一部被奴役、被侵略、被掠夺的历史，也是一部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史和发展自己经济文化的自强不息史。列宁曾对亚洲人民的这种迅速觉醒赞扬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以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亚非文学在继承其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亚非各国的社会面貌、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其中以中国文学（另设专章评述）、阿拉伯文学、伊朗文学、印度文学、日本文学成就较高。

阿拉伯地区包括众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其文学的共同特点是反映民族意识的觉醒高涨和反抗外国的奴役侵略，有明显的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其中代表人物有埃及的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穆斯塔法·卡米勒、赛阿德·宰额鲁勒、穆斯塔法·曼法鲁蒂等人；黎巴嫩的易卜拉欣·雅齐吉，

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突尼斯的穆罕默德·贝赖姆，叙利亚的艾迪卜·伊斯哈格、哲马伦丁等人。他们虽来自不同国家，但都在程度不同地使用不同方言的情况下，保持长期发展起来的统一文学语言，共同为发展阿拉伯文学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由于埃及在政治文化上处于领导地位，其作家贡献更大一些。

伊朗进入世界现代前期，随着反帝反封建的立宪运动的开展和要求文学改革呼声的日益高涨，其文学亦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文学流派增多，创作丰富多彩，爱国主义思想强烈。其中代表人物有密尔扎·穆罕默德·塔吉·巴哈尔、密尔札·玛利库姆汗、阿甫勒·卡赛姆·拉胡蒂等人。

印度文学这一时期随着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也迅速繁荣发展起来。出现了艺术上成熟的、为数众多的、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散文、戏剧和非宗教性诗歌。作家方面有罗姆·莫汗·罗易、般金·钱德拉·查特吉、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弟那般豆·米特拉、迦利布等人，特别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出现，将印度文学推向世界文坛。

日本随着明治维新，西方文化大量输入，其文学也出现了丰富多彩、流派众多的局面。其中现实主义作家有坪内逍遙、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浪漫主义作家有森鸥外、北村透谷，自然主义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人。他们以多种艺术手法反映丰富多彩的日本生活，将日本文学推向了亚洲领先地位。

非洲是块古老的大陆，有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的人民，但其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口头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繁荣起来。其口头民间文学主要包括神话传说、动物童话、民间故事、叙事诗歌等，对保存、传播、繁荣非洲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内容方面十分广泛丰富，早期作品反映了人们渴望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意愿及劝善惩恶、以弱抗暴的精神，有的口头民间文学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广泛流传于非洲地区的关于海神、雷神、火神、蛇神等神话传说故事，不但想象丰富，而且表现优美，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另一传说讲一个名叫肯克伯的人，在大荒之年把粮食藏于山洞不让妻子儿女吃，自己最后也落了个可耻下场，体现了劝善惩恶主旨。鳄鱼传说又表现了小钉子鱼敢于抗霸与凶猛的鳄鱼斗争的精神。而东非关于帕特、蒙巴萨、基瓦尔等国的传说，西非关于创立马里帝国的松迪亚塔国王历史的史诗，虽有虚构成分，但体现了一定历史依据，经整理可成为重要历史资料。

到了 19 世纪以后，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涨，非洲的口头民间文学也进入了黄金时代，内容方面爱祖国、争自由、歌颂民族英雄成为其突出主题。如几内亚关于阿尔玛美·萨摩利·杜尔在 19 世纪末叶领导武装队伍同法国殖民主义者英勇斗争故事的传说，以及其它一些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英雄的诗篇传说，塑造了众多英雄形象，具有强大生命力，成为非洲口头民间文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特征。

这些口头民间文学来自于人民，同普通百姓有血肉联系，具有鲜明的现

现实主义传统。艺术手法方面有丰富的想象、深刻的寓意、幽默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强烈的节奏，艺术感染力极强。特别是有的为了流传方便，采用散韵结合的形式，有的本身就是歌曲。如斯瓦希里语的古体杂诗虽然一般是长诗，但以四行为一节，与民间歌谣相似。佛得角群岛的克列奥尔语民间文学最流行的形式是“莫尔纳”，其既可表现爱情、忧伤、悲愁，又可表现冷嘲热讽、抗暴抑恶的内容。圣多美的“索科佩”是其口头民间文学流行的最普遍形式，它一般做伴脚舞的歌曲，节奏轻松活泼。这些都体现了非洲口头民间文学的艺术特色。

正是在这口头民间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出现了大批作家文学，推动了非洲文学的发展。如西非著名诗人、塞内加尔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马达加斯加的杰出诗人让·约瑟夫·腊伯阿里维洛（1901—1937），扎伊尔著名作家季·穆托姆波，尼日利亚的西普利安·埃克文西等，使非洲文学走上了世界文坛。

综观世界现代前期亚非文学，其描写人民的反帝、反殖和反封建斗争，反映各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现人民的觉醒是其主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其特色。其次，由于这一时期的亚非文学属资产阶级文学范畴，所以文化启蒙、思想教育，揭露殖民者罪恶，鼓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特色亦很鲜明。再次，这一时期亚非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明显影响，对亚非文学的发展变化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此时期亚非文学在文学样式方面也由单纯的诗歌体发展到散文体，由故事体裁发展到现代小说的体裁，由韵文发展到口语。另外，亚非文学毕竟植根于自己的土壤，所以虽然受西方文化的明显影响，但它又不能摆脱本国固有文化的束缚，造成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匆忙结合体，亦即在本国文学史上有过渡性质。但它的承上启下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它为亚非下一步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和先导作用。

2. 阿拉伯文学与巴鲁迪

从18世纪末法国入侵埃及至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富饶辽阔的阿拉伯地区几乎都被英、法、意等帝国主义者所侵略奴役。这种侵略奴役阻碍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激起了人民的坚决反抗与觉醒。另外，也促使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采取了相应的改良措施。在19世纪前半期，以在阿拉伯地区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的埃及为例，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夺取政权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于1826年派遣以雷法阿·塔哈塔威（1801—1873）为首的一批埃及青年到法国留学。这对发展埃及经济是有好处的。但穆罕默德·阿里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埃及人民在专制制度下生活，所以反映在文学方面仍沿袭传统、墨守成规、缺乏生气。文艺欣赏标准以模仿古文（主要是韵文）为尚，创作方面也不敢超出韵文范畴，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新的创造。就连埃及近代文化复兴的先驱雷

法阿·塔哈塔威的《巴黎纪行》和阿里·穆巴拉克（1823—1893）的四卷本小说《伊勒木丁》（1881）也都是用韵文写成。当然使用韵文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内容方面也还是有新鲜东西的，不过也说明阿拉伯文学改革的艰难。这种旧的形式与发展了的新形势是很不相适应的，它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和描写新鲜事物。

到了19世纪下半叶，由于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民族意识的觉醒，西方文学的影响，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和报纸的出现，其文学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表现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民族意识的觉醒是阿拉伯人民对专制独裁统治非常不满，想学习欧洲实行的共和制度。同时，他们看到当时伊斯兰教的软弱涣散，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备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压迫，想振兴伊斯兰教，发扬创教初期的伊斯兰精神。从而提出进行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的要求。埃及维新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1848—1905）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西方文学的影响使这一时期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与欧洲文化有了广泛的交流与结合。西方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故事、诗歌等陆续被译成阿拉伯文。如埃及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塔哈塔威翻译了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费讷隆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黎巴嫩作家苏莱曼·布斯塔尼（1856—1925）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斯曼·贾拉勒（1824—1898）翻译了莫里哀的四个剧本，纳吉布·哈达德（1867—1899）等侨居美洲的文人翻译了莎士比亚、拉辛、莫里哀、大仲马的作品。20世纪初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又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穆斯塔法·曼法鲁蒂（1876—1924）译写了《菩提树下》、《美德》、《为了王冠》等法国文学作品。这些大量译作的出现，开拓了阿拉伯文学家的眼界，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表现手法，从而对改变阿拉伯文学面貌起了有利作用。印刷术和报纸的出现，为文学繁荣提供了现代物质手段。1828年，在埃及最早鼓吹维新的报纸《埃及纪事报》发行，1865年，最早提倡阿拉伯文艺的月刊《蜂王》创刊。另外，黎巴嫩、叙利亚的许多文人也来到埃及主办了《埃及报》、《金字塔报》、《莫卡泰姆报》等报刊，表达了阿拉伯人要求社会改革、抒发民族感情的共同愿望。属文艺性的刊物在埃及还有《埃及作家》、《使命》、《新月》、《文艺撷华》等。正是在这诸多条件下，阿拉伯文学才出现了繁荣局面。

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的繁荣表现为创作题材的扩大。既有政治性、社会性的，也有宗教和其它方面的；既表现作家个人的感受，也反映作家生活的时代和民族的感情等。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埃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详见本章）。他参加了阿拉比领导的反英斗争，后被长期流放锡兰岛。他的诗歌在阿拉伯诗歌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黎巴嫩诗人易卜拉欣·雅齐吉（1847—1906）的诗歌也号召阿拉伯人民起来反抗外国侵略。此时期在贝鲁特和突尼斯等地也出现了一批受过西方教会教育的阿

拉伯作家和诗人。他们在其作品中，号召阿拉伯人民冲破阻碍社会发展的中世纪传统和习惯势力，吸取西方文化，为创造阿拉伯新文化作出了可贵努力。其中伯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编纂了号称百科全书的《知识界》，法里斯·舍德耶格（1805—1887）、纳绥夫·雅齐吉（1800—1871）、易卜拉欣·雅齐吉、穆罕默德·贝赖姆（1840—1889）等人曾致力于创办阿拉伯文的报刊杂志，并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入侵者的罪行，传播西方进步思想。另外，还有埃及作家阿卜杜拉·奈迪姆（1854—1886）、叙利亚作家艾迪卜·伊斯哈格（1856—1885）、哲马伦丁（1839—1898）和埃及著名政论家阿卜杜拉·拉赫曼·卡瓦基比（1849—1902）等人也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作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埃及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提出了结束英国军事占领和实施宪政等改良主义政治纲领。其中代表人物有反对保守、主张创新的伊斯兰教维新派学者、作家穆罕默德·阿卜杜。他著有《论一神教》（1897）和《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科学和文明》（1902）等著作及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并注释了由谢里夫·赖迪编辑的《修辞坦途》和赫迈扎尼的《玛卡梅韵文故事》。他的作品风格典雅、雄浑有力。他的思想对其后阿拉伯作家有较大影响。另外，卡西姆·艾敏（1865—1908）也较著名。他游学欧洲，回国后加入民族独立运动，以维护女权而出名。他著有《妇女的解放》（1899）和《新女性》（1906）等，认为必须使妇女得到解放，埃及社会才能进步，才能摆脱外国的奴役。他的文风平实晓畅，用词精当，论理性强。

这一时期处于阿拉伯文学领袖地位的埃及还有穆斯培法·卡米勒（1874—1908）、赛阿德·宰额鲁勒（？—1927）、穆斯塔法·曼法鲁蒂（1876—1924）、杰尔吉·宰丹（1861—1914）、叶阿古卜·赛鲁夫（1852—1927）等著名作家。其中前两位又是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他们的散文洋溢着追求独立解放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他们的演说词和政论文是阿拉伯文学的宝贵财富。杰尔吉·宰丹与叶阿古卜·赛鲁夫原籍黎巴嫩，长期定居埃及。他们大量的有关历史、社会、宗教的作品在阿拉伯国家有较大影响。穆斯塔法·曼法鲁蒂著有小说集《泪珠集》和社会杂文集《观点集》等。他的作品揭露社会弊端，同情不幸者的苦难，宣扬改良主义思想。其小说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法国文学作品，往往蒙上一层悲戚哀伤色彩，读后令人伤心落泪。语言运用注意节奏和谐，明白通畅。其作品在阿拉伯世界颇为流行。

阿拉伯文学囊括了诸多国家，他们共同点是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改良主义思想，都为创造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这些国家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所以其文学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一历史时期，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处于领导地位的埃及的文学成就最高。紧接着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整体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也加入了阿拉伯新文艺运动，其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20

世纪初，伊拉克也作为一个新成员出现。至于马格里布（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其它国家，除个别作家外，一般来说新文学发展较晚。不过纵观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学创作，各国成就虽有大小不同，但都为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都为下一时期阿拉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巴鲁迪

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是埃及著名诗人和阿拉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锋与代表人物。他出生于开罗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曾做过朝廷的大官。7岁时其父亲故去，他在家人抚养下读完小学，12岁入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军事学校。1854年，巴鲁迪从军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官。但他却对文学非常喜爱，特别是酷爱阿拉伯诗歌，所以他在背诵了大量的阿拉伯古代作家的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开始练习写诗。

巴鲁迪早期的生活取向和诗歌创作，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我满足和嬉戏享乐的状态中。虽然他对当时埃及统治者的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政策非常不满，对其间矫揉造作、落后时代的文学创作持鄙视态度，但由于他在1863年认识了埃及统治者伊司马仪并被委以重任，所以他在平步青云中沉浸在安逸、幸福的享受中，并沉浸在中古时期阿拉伯诗歌的美的格律中。

1877年爆发了俄土战争，巴鲁迪作为支持土耳其的埃及军队中的一员，参加了这次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对祖国的怀念，使他颇多感慨。回国后，又适逢埃及驱赶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陶菲格上台后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与疯狂逮捕爱国人士的倒行逆施的局面，使巴鲁迪的民族义愤和爱国主义精神被大大激发起来。1879年1月，巴鲁迪组织领导成立了反对英法控制和陶菲格卖国政策的埃及第一个政党——祖国党。1882年2月，祖国党人组成新政府，巴鲁迪任首相，拟定了新的方针政策，辞退所有外国阁员。这是巴鲁迪生活道路和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

以巴鲁迪为首的祖国党政府的成立，使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感到非常恐慌，并内外联手对新政府采取了扼杀手段。1882年7月，英国入侵埃及，年轻的祖国党政府虽然带领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巴鲁迪和其他领导人也被放逐到锡兰。巴鲁迪这一流放就是17年。他在流放地写了大量的诗歌以反映他内心的痛苦和对时局的思索。他还在此期间学会了英语，选编了收有阿拉伯古代30个诗人作品的《古代诗选》。

1900年巴鲁迪获赦回到了埃及，并以一个著名文学家、作家和诗人的身份生活于开罗。1904年，巴鲁迪不幸去世。他的遗孀主持出版了《巴鲁迪诗集》两卷和他编选的《古代诗选》四卷。

巴鲁迪诗作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首先表现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实际上是对当时内忧外患时局的抗争和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与鼓励。如他对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的描写：

问问基泽大建筑，

了解你所不曾知。
千年百载尽逝去，
战胜风侵真稀奇。
尽管灾难无数计，
巍巍巨塔旷野立。
历史见证具安在，
展示建者大业绩。
民族盛衰多变易，
时代更替不停息。
雄伟壮丽金字塔，
异口同声大奇迹。
狮身人面兽真奇，
屈膝匍匐卧在地。
怎么建造是学问，

亚当子孙有能力。此诗通过对金字塔的描写，民族自豪感溢于言表。

其次，埃及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和巴鲁迪本人的曲折经历在他的诗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巴鲁迪早期的诗作，即阿拉比革命之前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诗人悠闲的生活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其特点是意境优美、韵味深长。如《咏棉》：

朵朵棉花金灿灿，
恰似娇娘美服扮。
棉桃碧绿如宝石，
花朵绽开星烁闪。
黧黑干条土里扎，
绿色枝杈四下展。
每每瞥见这瑰宝，
实现希望在眼前。

巴鲁迪在被伊司马仪重用后，曾想改革社会，造福于民。但他起初只是想采取一种改良手段，当爆发人民起义，英法武装干涉时，巴鲁迪对时局又充满忧患。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忠告民众，战争是一场悲剧，事情或许不像所想那样的顺利。”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巴鲁迪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用诗句表达了与人民一致的心迹：“他们违背了我的主张，发动了起义。他们本应听我的劝告，但事情已无可挽回，是件好事或坏事不再是秘密。他们若呼唤号召我，我就响应，我的秉性是实现理想，信守诺言。”他的《巴鲁迪鼓动革命》更是号召革命的宣言书：

民众啊，愤起吧！

珍惜宝贵的年华，
以各种方式和途径，
去争得我们的利益。

.....

你们若不是缄默无声的死人，
就应该奋起投入战斗，
把侮辱、欺压统统铲掉。
我呼吁、我号召

.....

巴鲁迪在《起义的原因》等诗里，还通过对祖国历史的回顾，进行了理性的思念，阐述了人民要革命的原因。如该诗说：

在安谧、宁静之后，
埃及时运不济，
王室基础动摇，
混乱、腐败比比皆是。
敲诈、欺凌，农民不得不抛弃土地，
破产、倒闭，商人不得不停止生意。
恐怖笼罩了一切，
时到子夜，青年还未能入睡。
唉，沉睡的埃及！

.....

虽然我可以到别的地方
实现我的愿望，
但那儿不是我的同胞。
不管灾难多么严重，
再有两个月，结果终将揭晓。

巴鲁迪还在一些诗歌里表达了对外国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前途的忧伤。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这一帮歹徒恶棍，给民众带来比殍子更严重的痛苦和不幸。甚至连傻瓜也要把他从内阁中赶出，人们厌恶地唾弃他。埃及由于这帮人而遭屈辱，国基不稳，社会动乱，自豪的国中之花埃及，却要卑躬屈膝，驯服于外人。民族遭到不幸，独立之国埃及遭到不幸。”但诗人并未对前途丧失信心，他在此诗结尾部分写道：“人们啊，不要急躁！美好的未来终将实现。.....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必将使敌人灾难临头。”

阿拉比领导的起义失败，巴鲁迪被流放到锡兰岛后所写的诗作，充满痛苦孤独和思念企盼之情。如《思乡》：“背井离乡，我心凄迷，挚友旧好，相隔万里。形影相吊，举目无亲，同伴见我，悲怆嘘唏。卫国保教，昭昭天

指内阁中的外国代理人。

理，强横定罪，放逐异地？坚忍不拔，决不翻悔，嫉妒之辈，向隅而泣。我择自尊，任凭祸临，壮志崇高，我越坚毅。”还有《悼亡妻》也抒发了他这种思想感情。

巴鲁迪这些诗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激越的感情色彩，艺术方面韵律和谐、描写真实，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巴鲁迪诗歌还明显地体现出阿拉伯诗歌与西方文学交流融汇的特色。巴鲁迪除向阿拉伯文学吸取思想、艺术营养外，还向英国等西方国家文学学习。他有条件游历接触了欧洲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及其文学，并博览了大批埃及古代文学作品，这都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的革新方面，这在同时代其它埃及以至阿拉伯诗人身上是不多见的。他的诗歌创作虽然倾向于古典文学，但他的题材是创新的，是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并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使传统的阿拉伯古典诗歌重放光芒，为其后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确实开创了阿拉伯诗歌的一代新风，是阿拉伯诗歌革新运动的先驱。

阿拉伯诗歌创作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了鼎盛阶段，其后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几百年统治时期走向衰落。巴鲁迪反映现实的诗歌的出现给传统的阿拉伯诗歌注入了活力，受到了阿拉伯人民的广泛欢迎。巴鲁迪诗作从语言等艺术技巧方面来看，既有阿拉伯古典诗歌的结构严谨、朴实简练的特色，又有鲜明的感情激越的个性风格，是阿拉伯现代前期文学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3. 伊朗文学与巴哈尔

伊朗在 18 世纪后期就屡遭外国入侵者的奴役，加之国内封建主之间纷争不已，致使其城乡经济濒于破产。到了 19 世纪中叶后，终于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巴布教徒起义。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况下，伊朗统治者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决定在不触动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发展民族工业、振兴民族文化教育的改良主义措施。其中代表人物有密尔扎·阿卜杜勒·卡赛姆（卡埃姆·玛冈姆）等人。阿卜杜勒·卡赛姆做过伊朗首相，他不仅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与当时流行的古奥陈旧者不同，语言明快，内容充实，颇有创新精神，是波斯现代散文的先导。另外还有密尔扎·法塔赫·阿里·阿洪德扎德（1812—1878）和密尔扎·玛利库姆汗（1833—1908）。阿洪德扎德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他在伊朗近代最早提出文学改革的主张。如他说：“《蔷薇园》和《聚会花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今天，这类作品已经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现在有益于人民并适合人民口味的作品是戏剧小说。”他并且身体力行，写

《聚会花絮》是伊朗 18 世纪的一部散文故事集，作者是贾姆杜丁·穆罕默德·哈桑·姆哲迪。

了不少戏剧和散文小说作品。密尔扎·玛利库姆汗是一位著名作家，曾任伊朗驻英大使。他在驻英期间有条件接触西方文学艺术和进步思想，曾于1889年在英国出版波斯文报纸《法律》。这个具有鲜明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刊物秘密运回伊朗后，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阅，对鼓舞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斗志起了良好作用。玛利库姆汗还写了不少抨击黑暗社会时政的剧本等文学作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爆发了席卷全国的，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召开国会，进行民主改革的立宪运动。人民群众普遍参加了这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等。在这种形势下，加之新闻出版的空前发达，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空前繁荣兴旺的景象。其标志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此时期文坛杰出代表、著名诗人巴哈尔（详论见后）概括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状况时说：“这是一个革命的时期，顾名思义，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散文作品和诗歌作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新的诗风，即以朴实的语言和深挚的感情创作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诗，涌现出各种流派的诗人和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同时，传统形式也继续加以利用，在颂诗和抒情诗方面也有所创新”。

立宪运动时期另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是诗人阿甫勒·卡赛姆·拉胡蒂（1887—1957）。他出生于伊朗西部城市克耳曼沙，父亲是个鞋匠。16岁时，他去德黑兰投亲靠友，继续求学。在德黑兰他接触了进步人士与进步思想，积极参加了立宪运动并开始诗歌创作。立宪运动失败，他被判刑，曾两度流亡土耳其。1922年，他又在大不里士领导了宪兵武装起义。起义失败逃亡到前苏联定居。在前苏联期间他又创作了大批诗歌等文学作品。

拉胡蒂早年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其早期作品热情歌颂劳动人民的价值。如他在《人的意义》（1910）一诗中写道：

呵，能干的受苦人，
你是人类家族的骄傲，
你应该生活得快乐，
是你使世界繁荣兴旺，
没有你，世界变得一片荒凉。

……

只要你两天不去工作，
世界就面临毁灭。
是你使世界如此繁荣壮丽，
是你才体现了人的意义。

拉胡蒂在参加了1908年大不里士人民武装起义后，写了《践约》一诗歌颂一位革命母亲。他在描写这位革命母亲来到与自己并肩战斗的儿子的墓

前时写道：

她取出怀里的面包，摆在坟上
这时，她突然变得像一头怒狮：
“孩子，不要责备我不忠于誓言，
我曾在你血洒的战壕里苦苦寻找，
以你的生命发誓，我曾把战壕寻遍，
让你的灵魂作证，一片面包也寻找不见。
你身负重伤，饥肠辘辘辞别人间，
我当时就立下誓言：
找到面包，我立即给你，
献到亲爱的儿子墓前，
起来吧，让我把面包和我的心一并奉献。

……

孩子呵，现在再也不用担忧，我们已经胜利，
我给你带来了面包和自由的信息。
你曾在我胸前吮吸母亲的乳汁，
那是对你，宁死不屈的战士的奖励。

此诗通过一位革命母亲在儿子墓前所言，歌颂了革命战士的牺牲奉献精神，揭示了胜利的来之不易。

伊朗立宪运动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还与当时革命刊物的大批涌现分不开。这些刊物培养了一批杰出文学家。当时宣传新思想，鼓励人民起来革命的代表性刊物有《天使号角》和《北风》等。《天使号角》周刊于1907年创刊于德黑兰，其主编是贾杭吉尔汗，主要撰稿人是著名作家和学者阿里·阿克巴尔·德胡达（1879—1956）。德胡达生于德黑兰，青年时入德黑兰政治学院学习，1903年游历欧洲，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回国后为《天使号角》撰稿，1908年，反动势力一时喧嚣时，《天使号角》被取缔，主编被处死，德胡达也被迫流亡瑞士。

德胡达主要为《天使号角》的《无稽之谈》专栏撰稿，其文章轻松活泼又尖锐泼辣，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腐败落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宗教上层人士的伪善愚昧均给予了辛辣的嘲讽揭露，是伊朗讽刺文学方面的代表作。

《北风》当时是在伊朗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它以刊载政治讽刺诗为主，其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均均为诗人赛义德·阿什拉芙尔丁（1870—1933）。阿什拉芙尔丁生于喀兹文，少年生活贫困，20岁时到大不里士学习，并开始诗歌创作。他在一首诗里表白自己的创作初衷说：“一千三百二十四年，我国兴起了宪政运动，我也吹起了这徐徐微风，散发阵阵清香，使人们头脑

清醒。”他的办报宗旨是“以朴实而优美的语言和民众交谈”。他的2万多首诗作正是他这种主张的具体体现。另外《北风》还发表其它一些诗人的作品。如1909年革命高潮时发表的一首揭露宗教首领谢赫·法兹罗拉·努利的诗就很有特色。该诗写道：

哈吉，市面之上生意兴隆，
来买吧，减价出售，血本牺牲，
拍卖的是整个伊朗，
连同穆斯林的尊严和名声，
勒计特、喀兹文、库姆和卡善
来买呀，整国拍卖，售价低廉。
哪个来买，哪个来买！

《天使号角》和《北风》等报刊，以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影响力和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家，对伊朗文学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这两个报刊上刊载的大量讽刺文学作品，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色。这些讽刺作品寓激愤于戏谑，以表面轻松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心中严肃的主题，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伊朗立宪运动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语言使用方面对伊朗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纵观伊朗文学史，在此之前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但是到了立宪运动时期，立志改革的先觉者利用文学创作宣传先进思想，启发群众觉悟，诗歌这种形式就有一定的约束，而散文的效果就会好一些，所以，富于表现力的散文就应运而生。新出版的百种以上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的大批接近人民大众的口头语的、反映现实的散文作品就是很好证明。此后，伊朗文学史上涌现出了大批优美的小说散文作品，为伊朗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光彩。

巴哈尔

密尔扎·穆罕默德·塔吉·巴哈尔（1886—1951）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著名诗人。他出生于伊朗东部城市马什哈德，其父穆罕默德·卡赛姆·萨布里亦是著名诗人，曾获得国王授予的“诗人之王”的封号。他自幼随父学诗，14岁即参加一些文人聚会，朗诵自己的习作。1903年他17岁时，他父亲去世，他也成长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并由国王下令承袭了其父“诗人之王”的封号。这宫廷诗人的荣誉与前程并没有太多地吸引他，他反而受1905年立宪运动的影响，投身到这场民主主义革命中去。但他的思想发展也是经过一个由保守、改良到激进的过程的，这在他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巴哈尔早期创作体现了他曾幻想通过规劝与请求使统治者关心民生、抵抗外侮的思想。如他在1907年创作的一首诗中写道：“君主啊！请睁开你那睿智的双眼，看一看来日的结局，请睁开你那明亮的双眼，看一看自己的下场，伊朗现在任人欺凌侮辱，眼睁睁地遭到灭亡！”但历史的事实证明，革命者与保守派之间是不可调和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

也更加尖锐起来，巴哈尔诗作也多了激切的言词。他在 1909 年写的一首诗中说：“君主啊！你不要再挖自家的墙脚，不要再把国家和自己抛入屈辱的深渊，不要再穷奢极欲，自毁根基，不要再暴虐枉法，自甘下贱，如果你还记得总有清算的一天。”显然这已从规劝转入激烈的指责。

1909 年伊朗民主党在马什哈德成立，巴哈尔被选为省委委员，并负责出版党刊《新春》。《新春》被封，他转而主持出版《早春》。后《早春》也被查封，他也被当局强迫迁到德黑兰定居。这样，由于他亲身参加了革命运动，使他思想认识也有了升华，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外国侵略者的危害，并清醒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决心呼唤他们觉醒。所以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有了拓展。如他在 1909 年写的一首诗作中抒发对祖国的爱和揭露俄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写道：

你怎么竟变成一片废墟，呵，祖国！
外国军队到处横行无忌，呵，祖国！
你本是我们聚会时的明烛，呵，祖国！
如今，竟成了别人烛火中的飞蛾，呵，祖国！
你是我的至亲骨肉，你是我的园中的鲜花，
可如今，你为何这样声名败落，呵，祖国！
俄国、英国都来把我们欺凌，
给我们带来灾难和苦痛。

……

祖国呵，你满目疮痍，
祖国呵，你到处是残垣断壁！

这首诗以沉痛的笔调描写了其祖国满目疮痍、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同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外国侵略者的痛恨和对本国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的指责。而当伊朗南北方革命力量联合行动，进军德黑兰，革命运动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巴哈尔创作的诗作就充满欢乐乐观的情绪，其间在马什哈德召开的一次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上，朗诵的都是巴哈尔的诗作。

伊朗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仇视与恐慌，他们决心要扼杀伊朗此次革命运动。如早在 1909 年 4 月，帝俄就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伊朗的大不里士。1911 年，俄国又与英国联手，借故向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紧接着俄英侵略军就对伊朗的革命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在此紧要关头，巴哈尔坚定地革命大声疾呼，号召人们起来与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呵！伊朗人，伊朗已经大难临头，
大流士之国，陷入尼古拉之手，
凯胡斯陆的国土要被恶龙一口吞下，
穆斯林的尊严何在？
民族崛起，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的正直的兄弟呵！你们为什么这样软弱可欺？

伊朗属于你们，伊朗是你们的。

伊朗 1905 至 1911 年的民主革命运动，最后在内外敌人的勾结镇压下，终致失败。这对巴哈尔的打击很大，使他一度陷入消沉。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巴哈尔主要精力去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学府”，并办有刊物《学府》杂志。他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并在《学府》杂志上发表他们研究和探讨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和一些文学作品。礼查上台后，巴哈尔退出政界，主要从事教学和著述，他曾任过德黑兰大学教授。但礼查政府还是不放过他，他曾被捕两次，一次被赶出德黑兰逃亡到伊斯法罕。他曾有诗描述自己被捕的经过。其中一首写道：

节日之夜，我已上床安眠，
一伙人突然闯到我的床边，
他们从我们外花园中的小路，
像一堆蚂蚁，偷偷地溜到我的面前。
带头的是瘸子法赫拉依，
两三随从与他走在一起，
他们翻检着我的书籍手稿，
然后就一古脑装进袋里，
随后他们便把我逮捕，

像豺狼把一只羊羔叼在嘴里。但巴哈尔并没有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屈服，他仍在为革命呐喊，仍坚定地相信革命的必然胜利。如他在 1930 年写的一首著名抒情诗《达玛温德》中，把“达玛温德”这座高山比作祖国，预言她“将获得自由，高声吼叫，像一头困兽，冲出兽棚。”并满怀信心地宣告“你那炽烈的光辉，将照彻阿尔卑斯和阿隆德群山！”这都是他暂时受压抑，但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念心情的真实写照。

巴哈尔一生创作了两万多行诗，其中 20 世纪初伊朗立宪运动时期所作是其精华所在，他的诗既继承了古代波斯诗歌的传统形式，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如他在立宪运动时期所创作的诗歌，几乎涉及了当时伊朗所有的政治社会大事，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精神。伊朗诗歌史上，1905 年至 1911 年是个大的变化时期，其突出标志是具有强烈的思想内容的政治诗的出现，而巴哈尔正是这一深刻变革的开创者之一，所以他也成为伊朗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

4. 印度文学与泰戈尔

印度近现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奴役的悲惨史。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转引自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 33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年。

最后 30 年，印度进一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人民的政策，经济上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加重了对印度人民的盘剥。这样，加剧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族人民的矛盾，爆发了多起反殖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如 1879 年的马拉特农民起义，将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虽未最后取得胜利，但却有力地促进了印度人民的觉醒。另外，19 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的投资，客观上也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使印度工人阶级也在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对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也展开了斗争。1877 年爆发了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工人大罢工，揭开了印度工人罢工斗争历史的第一页，并标志着印度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进入 20 世纪初，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起来。

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印度文学已改变了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上半期那种充满神秘色彩、停滞不前的状态，取得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其特点是既受西方文学影响，又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表现为多民族性和统一性的结合，古老传统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结合，反殖和反封建内容的结合，宗教色彩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等。当时不少印度进步作家已从盲目崇拜西方，转而认识到研究本国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性，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出现了大批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这是此时期印度文学的精华与主要成就。其中以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北印度的印地语，以德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文学成就最大。

东印度的孟加拉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领先于印度其它地区。著名启蒙者和散文大师罗姆·莫汗·罗易（1772—1833）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改革和文学改革的要求。他出身于孟加拉的婆罗门家庭，早年就读于巴特那高等伊斯兰教学校，精通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英文和希腊文。他要求社会改革的内容，包括反对种姓制度以及寡妇殉葬、一夫多妻和童婚习俗，提倡普及教育，要求保护出版自由。他要求文学改革，主要是提出文学要为社会服务的主张。他最早用孟加拉语从事创作，被称为“现代孟加拉散文的鼻祖”。其散文《耶苏箴言》（1820），风格明快流畅，很有影响。

般金·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是印度近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孟加拉语创作了七部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以长篇小说《毒树》（1872）最为著名。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第一次提出寡妇改嫁的问题，抨击了种姓制度。同时这部小说艺术构思精巧，很富感染力。另外，他还创作了 10 部长篇历史小说。其中代表作是《阿难陀寺院》（1882）。它描写 1772 年的“山耶西”（出家人）起义，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这部小说中有一首“礼拜母亲”的诗，成为以后群众集会时歌唱的革命进行曲。般金的历史小说富有传奇色彩，并将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表现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精神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思想感情。其后的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人都

受过他的一定影响。

另外，仅次于泰戈尔的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也是这一时期操孟加拉语的印度著名作家。他出身于西孟加拉邦的胡戈里县德瓦南德普尔村。少年家境贫寒，中学没毕业就到处流浪。1903年到了仰光，在一家木工厂当文书，并开始练习写作。190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引起人们的注意。1913年他回到了加尔各答，专门从事创作，成为孟加拉语的第一个专业作家。他一生共写了3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对地主、婆罗门上层贵族进行了揭露批判，对普通劳动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其中代表作是《斯里甘特》四卷（1917—1933）、《道德败坏的人》（1917）、《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等。《斯里甘特》是一部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斯里甘特和歌女拉佳·拉克什弥相爱的故事。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的小说以心理描写细腻、语言洗炼著称，对以后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弟那般豆·米特拉（1829—1874）是印度孟加拉语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以写社会政治剧而闻名。他的代表作《靛蓝园之镜》（1860），对靛蓝商残酷剥削压榨靛农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他的戏剧创作对其后印度戏剧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印度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举世闻名的泰戈尔（详论见后）也是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

这一时期印度文学中的印地语作家当首推帕勒登杜·哈里什·钱德拉（1850—1885）。他是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关心社会现实，要求文学作品反映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并以其杰出的创作开创了现代印地语戏剧发展的道路。他的代表作是《印度惨状》（1880）和《蓝色的女神》（1881）等剧作，其特点是力求以民族的传统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的诗歌创作也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如他在《巴拉特——杜尔大沙》中，以生动的生活画面和强烈的民族激情，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给印度人民带来的灾难。印地语作家中，还有诗人迈提里谢苍·古伯德（1886—1964）亦取得了一定成就。他的名篇《印度之声》，直接号召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勇敢地起来和殖民者及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他的叙事长诗《色彩的破灭》（1910）等，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并采用日常用语写成，对推广标准印地语做出了成绩。

在乌尔都语文学中，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如诗人迦利布（1797—1869）在印度人民心中就享有崇高威望，民间还广泛地流传着他反抗王公贵族的故事。他有《迦利布诗集》等作品，反映了印度的黑暗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对1857年至1859年的民族大起义等社会重大事件的鲜明态度。再如诗人勃拉志纳拉扬·恰克巴斯特（1882—1926），他的诗集《祖国的早晨》，以民族的形式反映现实社会内容。特别是他以口语写成的诗作，在民间很受欢迎。另外，沙尔夏尔（1846—1902）也是一位用乌尔都语创作

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自由幻想的故事》（1878），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矛盾，充满了幽默与讽刺，是人们熟知的佳作。沙尔夏尔的小说创作，为印度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另外，这一时期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亦取得了一定成就。如诗人苏布拉马尼亚·布哈拉提（1882—1921）就是泰米尔最早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精通印地文、梵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在继承 2000 多年泰米尔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用流行的民间语言进行创作。其诗饱含民族感情，愤怒揭露谴责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号召同胞们从迷梦中觉醒，争取民族的解放，得到了普通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他还创作了不少小说、散文，其短篇小说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特色，为泰米尔语短篇小说奠了基。

纵观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期的印度文学，其变化是深刻而明显的。首先，从内容方面来看，普通劳动群众成了文学的主人公，过去几千年占据统治地位的英雄豪杰形象退居次要地位。其次，艺术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不仅诗歌、小说、戏剧等传统文学体裁被吸收创造保留下来，而且日记、书信、散文、传记等新的文学样式也得以发展。这既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也是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客观要求。另外，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还表现在各种方言文学作品的出现。如前述的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等文学作品，都程度不同地丰富和发展了印度文学。其中泰戈尔是其杰出代表。

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现代著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长达 60 年的创作生涯中所创作的大批诗歌、小说、剧本和评论著述，形象地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对印度社会生活和文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宝库提供了大批珍品。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其父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其兄弟姐妹亦是爱好文艺的诗人或画家，他的家庭是当时孟加拉知识界的中心之一。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使泰戈尔从小就爱好文艺和关心社会问题。他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写诗，写剧本，16 岁时发表了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1878 年，泰戈尔遵从父兄之命到英国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不感兴趣，转而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不久，又由于他厌恶帝国主义的学校教育和对英国社会大失所望，所以他没等大学毕业，就于 1880 年提前回国，开始了他长达 60 年的文学创作生涯。

泰戈尔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1880 年至 1900 年是他创作的早期。这一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他父亲的谢里达庄园中度过，广泛接触了农村社会，目睹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他同情农民的悲惨处境，憎恶不平等的社

会制度，并极力寻求解决矛盾的途径，对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探索。其间故事诗和短篇小说的创作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

故事诗可分为佛教故事、锡克教故事、马拉塔及拉其斯坦的英雄故事等四个方面。其中代表作有《婆罗门》（1893）、《两亩地》（1894）、《被俘的英雄》（1900）、《更多的给予》（1900）、《比丘尼》（1900）、《丈夫的重获》（1900）等。这些诗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说，篇幅比较短小精悍，感情充沛，韵律优美，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揭露种姓制度的罪恶，有的批判封建习俗，还有的揭露并控诉地主对农民的强取豪夺等。如《被俘的英雄》和《更多的给予》，歌颂了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婆罗门》揭露了种姓制度的罪恶；《丈夫的重获》批判了“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的寡妇殉葬习俗；《比丘尼》反映了农民的贫困与地主珠宝商人的虚伪。特别是《两亩地》最为著名。它描写一个地主为了使自己的花园“长宽相等，四四方方”，使用制造假借据的卑劣手段，抢走了贫苦农民巫宾赖以活命的两亩土地，使巫宾全家流离失所。作者通过这个真实的故事，反映了印度封建主勾结法庭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不法封建主的揭露与控诉。作者在诗中揭示出，真正的盗贼不是巫宾，而是那些所谓的“圣贤”——地主老爷。如诗中说：“王爷的双手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唉，在这世界，谁越贪得无厌谁就越富裕”。

泰戈尔早期创作了60多篇短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19世纪末叶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社会现实。如《太阳与乌云》（1894），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专横暴虐；《委托保管的财产》（1891）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的罪恶；《加冕》（1898）批判了洋奴思想，提倡民族自尊；《喀布尔人》（1892）歌颂了劳动人民的纯朴感情；《河边的台阶》（1884）、《还债》（1891）、《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弃绝》（1893）、《素芭》（1893）、《献祭》（1898）、《摩诃摩耶》（1892）则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这也是泰戈尔早期作品的主要主题思想之所在。其中《摩诃摩耶》又最具代表性。

《摩诃摩耶》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一个24岁的姑娘摩诃摩耶与青年罗耆波真挚相爱，但其家庭却强迫她与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教徒在火葬场上举行婚礼，婚后第二天，丈夫死了，摩诃摩耶成了寡妇，可旧势力又强迫她与死者一起火葬，只是突降大雨，摩诃摩耶才侥幸未死，可她美丽的脸庞上却留下了烧伤的疤痕。她逃出来躲在情人罗耆波家，要求罗耆波永远不要揭开她的面纱。但后来在一个月夜，罗耆波还是看到了摩诃摩耶烧伤的面容，于是，摩诃摩耶就一句话也没说愤然离去。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愤怒地谴责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危害和寡妇殉葬制度的野蛮，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泰戈尔一生写了大批的短篇小说，但精华之作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些短篇小说题材重大而广泛，艺术手法方面叙事抒情结合，结构精巧简约，人物生动形象，是印度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开创之作。即使是到了今

天，在印度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没有人能超过泰戈尔。

1901年至1920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也是泰戈尔创作最富成果的时期。这期间的1905年至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泰戈尔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唱着自己写的爱国歌曲参加游行示威，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英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因参加反帝示威而被开除的大学生补课。同时他还致力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有长篇小说《小砂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中篇小说《四个人》（1916）等出版。其中《沉船》与《戈拉》最为著名。

《沉船》是泰戈尔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它通过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揭示了腐朽的封建意识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主人公罗梅西出身于富裕的婆罗门教家庭，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极富才华，但又胆小懦弱的大学生。他不顾教规束缚，大胆地爱上了梵教家庭姑娘汉娜丽妮，但在其父强令他与不相识的撒西娜结婚时，他又屈从听命。他的这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妥协与退让，注定了他虽然追求理想的爱情，但最后还是以悲剧而告终。作者正是通过罗梅西这个深受封建意识迫害而又无力反抗的艺术形象，批判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指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沉船》在艺术手法方面，作者善于细致入微地刻划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细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凝炼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泰戈尔在这一时期还创作发表了不少诗歌，如《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0）等。这些诗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印度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但与其早期诗作相比较，由于作者一度远离现实斗争，思想上处于理想不得实现的忧虑苦闷状态，所以思想性方面明显削弱了。他在这些诗作中，主要歌颂爱情，赞美纯洁的童心和纯朴的母爱，宣扬通过“爱”达到其“和谐、协调”的理想境界。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著名的、用孟加拉文写的宗教抒情诗集。它象征着诗人的思想发展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该诗集于191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本，引起了西方的注意，给诗人带来世界性的声誉，曾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吉檀迦利”在印度语中是“献诗”的意思，即献给神的诗。正如泰戈尔自己所说是“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的”。这个神不是一神教中的唯一神，而是泛神论中的自然神。诗集正是充满了对这种自然神的歌颂和诗人的泛神论思想。泰戈尔这种泛神论思想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和曲折变化中，他一方面强烈要求印度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一方面又害怕“极端派”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所造成的。他想通过宣扬泛神论，调解当时印度各教派的不和，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从而推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吉檀迦利》直接或

间接地反映了泰戈尔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民主平等观点，深厚的人道主义和他反对殖民主义的倾向。但由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追求人和神的融合与和谐，表达了脱离现实的神秘朦胧的思想情绪，所以此诗集也暴露了诗人社会理想的抽象性、空想性、妥协性和性格上的软弱性。

《吉檀迦利》在泰戈尔的创作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诗人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重要里程。由于有了这段探索，诗人才在晚年摆脱精神上的枷锁，重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写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作品。

《吉檀迦利》等泰戈尔中期创作的诗作，继承了印度古代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民歌和民谣的丰富营养，以其驰骋丰富的想象，优美抒情的格调，秀丽多彩的诗句，生动活泼的笔法，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诗人的人生哲学，并为泰戈尔成为世界著名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至1941年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期间泰戈尔经过探索，又一次勇敢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曾愤笔疾书严正声明放弃英王授予他的男爵封号，以示对英国殖民者的抗议和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声援。1924年，他曾到过灾难深重的中国，写了《在中国的谈话》（1924）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1930年，他怀着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景仰，访问了前苏联，并写了《俄罗斯书简》（1931）以示赞扬。另外，还写了大批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等作品。1941年8月7日，泰戈尔病逝于加尔各答的祖宅，享年80岁。

《戈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代表作，写于1907—1909年。先在《布拉巴希》杂志上连载，1910年出版单行本。它描绘和剖析了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印度社会充满变化和矛盾的生活，具有史诗的性质，被誉为印度文学中的《战争与和平》和现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

19世纪70至80年代，正是印度民族意识觉醒，渴望民族独立的呼声愈来愈高涨的时代。当时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方面分成两派：一是梵社中的印度梵社和元始梵社，一是新印度教社。前者崇拜西方文明，轻视本国文化传统，后者虽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民族传统，但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古老传统，表现出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戈拉》正是以印度梵社和新印度教两派的激烈斗争为背景，以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和梵教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的恋爱纠葛为线索，反映了印度民族开始觉醒和作者希望印度爱国者不分教派信仰，不分种姓，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也严厉批判了复古主义、教派偏见和维护种姓制度的错误观点及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倾向。

小说的主人公戈拉是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教徒青年们的领袖。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他“正直不阿”，对那些以做官为荣，丧失民族自尊，在英国主子面前摇尾乞怜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痛恨。在一次开往特里宾尼的轮船

上，他面对嘲笑跌入水中的同胞并污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畜性的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孟加拉人，怒不可遏，斥骂他们是“比无知的人民更不如的禽兽”。他在不幸被捕后，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正气，决不去奉承英国官吏，以求他们的怜悯和饶恕，同时也不许朋友去保释。这些都是殖民地民族中最可宝贵的品质。

但在戈拉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有明显的宗教偏见。他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是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上的，这就不能不使他在民族问题、社会问题上发生片面性，甚至走向极端。他反对殖民统治，捍卫民族尊严，但对西方的文明也一概排斥；他热爱祖国，富有民族气节，但又不加分析地肯定“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恪守教规，连印度教中落后反动的东西也一概给予维护，而对其它宗教一概反对，存在明显的宗教偏见。如他不喝异教徒手中的水，不许别人和异教徒谈恋爱，甚至为反动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特权辩护。他的这种局限与偏见在他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得到了克服和纠正。他在农村旅行时，看到了教派纠纷的危害，看到了劳动人民打破宗教偏见一致反帝的事实，从而觉悟到“再也不可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感到宗教传统“只是诗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特别是当他养父临终时告知他生身父母是英国人，他也没资格信仰印度教时，使他从宗教偏见中彻底摆脱出来，从而达到他思想发展的最高境界。作者对戈拉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对印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艺术概括，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中的洛丽塔，是一个开始觉醒的印度妇女的典型形象。她是梵社领袖帕勒席先生的女儿，她的性格特点是独立不羁、嫉恶如仇、坚韧不拔，她敢于反叛封建的陈规陋俗，追求妇女的自由解放。为此，她敢于冲破宗教偏见，不怕诽谤，不怕孤立，勇敢地和印度教徒结婚。在对待殖民统治方面，她拒绝为英国县长演戏，并说即使叫她自杀，也比给英国人演戏容易些，表现了令人尊敬的民族气节。作者正是通过洛丽塔这一形象，赞扬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鼓励人民克服宗教派别的樊篱，勇敢地投入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

小说中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是作者自始至终给予肯定赞扬的理想人物。她属于印度教派，但她反对教派偏见，反对种姓制度，被当作“世界所有母亲的化身”和印度民族的象征。她性格善良，通情达理，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与属于梵教的洛丽塔的父亲帕勒席这个与她具有同样性格特点、思想情趣的人物交相辉映，体现了作者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理想。

另外，小说还描写了哈伦这个买办洋奴代表的反面典型形象。哈伦除了皮肤容貌外，已经完全英国化了。他本是梵教首领，可要求梵教徒要抛弃印度传统文化。他在英国殖民统治者面前，奴颜卑膝，污蔑同胞“没有受过精神和道德的教育”，“没能吸收英国文化”，“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

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在梵社内部干尽了卑鄙勾当。他的形象反映了梵社分裂以后崇洋媚外一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特点，是英国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产物。

泰戈尔在《戈拉》中，通过不同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如他提出了当时阻碍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教偏见问题和联系劳动人民的问题。他试图号召人们要像戈拉那样彻底抛弃宗教偏见，要像洛丽塔那样冲破宗教教派的束缚，投入到全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去。但他在解决宗教偏见问题时，用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存在很大局限性。在解决联系劳动人民问题方面，他虽然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反抗传统偏见的精神，但并没从根本上认识到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身上。显然，这并不是印度人民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不过，《戈拉》中人物所体现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倾向，在当时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戈拉》作为一部世界知名的长篇小说，它在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首先，人物对话富有论辩性。小说中的对话很多，有戈拉和长者、朋友、情人、母亲、敌人的对话。这些不同人物之间的唇枪舌战，不仅揭示了小说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而且也表现了不同阶级、阶层、教派的人物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探索。同时，人物间的对话对刻画人物、表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是非常有效的。其次，人物形象的对比非常鲜明。《戈拉》中人物很多，其中正面人物与正面人物及反面人物之间，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戈拉与哈伦，一正一反，前者爱国，后者卖国；苏查丽与洛丽塔，同属妇女，一个沉静温和，一个刚毅勇敢；戈拉与宾诺耶，一个保守固执，一个思想解放。这种对比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充分表现，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另外，优美的抒情语言亦是《戈拉》的一大特色。泰戈尔本来是一个诗人，因此，他的小说就具有了诗一样的韵味。作者把叙事、抒情与论辩融为一体，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诗一样的语言灌注到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中去，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泰戈尔在长达 6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了 50 多部诗集，12 部中长篇小说，100 多个短篇小说，20 多个剧本和大量的有关文学、哲学、政治学方面的论著。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吉檀迦利》英译本于 1913 年出版后，当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掀起了席卷东西方的“泰戈尔热”。泰戈尔在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所到之处受到隆重欢迎。爱尔兰诗人夏芝在《吉檀迦利》序中说：“我每日读泰戈尔，读他的一行诗，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当然这与西方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政治气氛有关，不过也确实说明泰戈尔在西方的影响。泰戈尔为一度停滞了的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另外，泰戈尔对促进东方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也起了推动作用。当时

的中国很早就翻译介绍了泰戈尔的诗作。如 1915 年《青年杂志》第 2 期，发表了陈独秀译的泰戈尔的 4 首诗。陈独秀并介绍作者说：“达喝尔（泰戈尔），印度当之诗人。提倡东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诺贝尔奖’，驰名欧洲。其诗富有宗教哲学之理想。”1920 年后，泰戈尔的戏剧、散文、书信、讲演、自传等也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当时的《小说月报》、《东方》、《文学周报》、《晨报》、《少年中国》等主要报刊，都以醒目位置登载过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刘大白、叶圣陶、沈雁冰、许地山、徐志摩等人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

由于中印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大致相同的审美标准与审美情趣，所以泰戈尔作品译介到中国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起了良好的作用。如中国现代文坛巨匠郭沫若的创作就受到泰戈尔的明显影响。郭沫若于 1914 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接触到了泰戈尔的诗。他敏锐地感觉到泰戈尔的诗与英文诗不同，与崇尚格律雕琢的中国古代诗也不同，具有通俗易懂、散体化、清新隽永的特色。这正为刚刚摆脱旧诗桎梏，在寻求新形式的中国诗坛提供了借鉴的样板。郭沫若后来创作的《女神》等著名诗篇就具有这些特点，并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自己也承认他早期“清洗”、“简短”的诗歌是“泰戈尔式”的。中国另一位文坛泰斗冰心女士也非常崇拜泰戈尔，并说他们已经在“梵”中合一了。冰心那些歌颂妇女，崇尚童真的篇章，与泰戈尔有神似之处。冰心自己回忆说，她读了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后，那些“很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哲理的三言两语”，给予了她很大启发。于是她创作了《繁星》和《春水》等作品。中国现代文坛上还有不少著名作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这些都说明泰戈尔对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5. 世界现代前期的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前期文学从时间跨度讲，主要包括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前后这一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爆发了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创建崭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的“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和其前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的。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仗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建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诸如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城市。这样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统治，又把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与中国人民大众及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势力产生尖锐矛盾，引发了中国人民一系列的反抗斗争。诸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但直到伟大

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于 1911 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彻底推翻了封建清王朝，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决定性胜利。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次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由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和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这次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袁世凯上台后，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封建旧势力和买办势力，实行独裁统治，引起民怨天怒。最后于 1916 年在全国的一片讨伐声中下台并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先后把持政权。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 年 1 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此次会议提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而当时实际掌权的北洋军阀皖系派头目、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及其政府竟给予答应。这一决定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北京的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于 5 月 4 日在天安门前举行游行示威，并围攻签订协议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恰遇另一卖国者章宗祥，将其痛揍一顿。这就是有名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它如一声春雷震响全国，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参与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就其性质来讲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范畴。细分又可划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五四”运动以前属旧民主主义性质，“五四”期间和其后属新民主主义性质。其主旨是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又和中国近代文学有相同之点，继承和借鉴了中国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某些优秀之处。所以，要想论述中国现代前期文学，亦有必要对中国近代文学作一回顾。

中国近代文学虽然还有不少封建文学存在，但由于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反抗外侮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成为主旋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其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并强烈要求抵御外国侵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的改革主张，产生了不少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19 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它反映了人们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要求。梁启超后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所作的《饮冰室诗话》里，继续鼓吹“诗界革命”，并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是近代以来进步的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作品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理想。并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

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陈荣衮、裘廷梁等也提出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主张。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的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童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这一白话文运动虽没有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代替传统古文的地位，但它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古文的表达作用，对晚清的文体解放以至“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改良运动的需要，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也不断输入。严复、林纾成为这时著名的翻译家。严译《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思想影响。近代印刷事业的发达，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还促进了小说的繁荣，使小说这个过去不被文人重视的文学品种登上了大雅之堂。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成为改良社会和揭露黑暗时政的有力工具。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陶祐曾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文章，强调了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社会教育作用。

正是在近代文学这种反帝反封建和要求社会进步传统影响下，加之西方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的大量翻译引入，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与文学家。他们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对清王朝已不抱任何幻想，决心以文学为武器来配合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他们办了许多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组织了不少文学团体。其中革命家兼作家有章炳麟、秋瑾、邹容、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人，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有《东方杂志》、《苏报》、《民报》等，文学团体有“南社”、“春柳社”等。

章炳麟（1867—1936）字太炎，浙江余姚人。他曾先后师从俞樾、孙诒让，研究经学、小学、佛学与子书。中日战争后，他开始关心政治、阅读新书，并受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他一度与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但由于他倾向革命，终于大反属保皇派的康、梁。他热情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革命运动，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持人。后来又反对过窃国大盗袁世凯。鲁迅先生在其《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称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他确实是这一时期学问渊博、具有强烈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家与学者。

章炳麟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尤以散文为突出。早在1901年，他刻于苏州的《楹书》中《客帝》一篇，就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思想。发表于1903年《苏报》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更是

见黄遵宪 1887 年作《日本国志》卷 33。

旗帜鲜明地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对打击改良派和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的这些政论散文是他广博学识与革命激情的结合体，所以一般感情强烈，思想敏锐，内容充实，组织严密，有一种“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气概。后来他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由于不满汉及唐宋文，曾以魏晋文相号召。他的这种取法魏晋，好用古文，也是他政论文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章的宣传效果。

章炳麟还写有一些古体诗歌。这些古体诗一般取法汉魏乐府，其古奥的文辞亦影响了其流传，不过一些发抒怀抱、歌颂革命的小诗却清新流畅、通俗可读。如《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糍。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通俗明快中表达了革命家的友爱和英雄气概。

秋瑾（1878—1907）字璿卿，一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十八嫁予湘人王廷钧。1898年，随夫迁居北京。在北京这个新文化和革命思想活跃的地区，使她很快觉醒，并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妇女解放而斗争。1904年，她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并发起组织了妇女团体共爱会。1905年底，由于日本政府颁发了无理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她愤而归国。回国后，她创办了《中国女报》，并奔走于沪杭之间，积极组织起义。1907年事发被害。

秋瑾这位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随着她思想的发展变化，她将文学创作与革命活动结合了起来。她早期在江南家乡时，多抒发离愁别绪，感叹春去冬来之作。到北京后，随着她思想的觉醒，其作品一变而为充满激昂慷慨和爱国之情。如著名的《宝刀歌》：“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河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沐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中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号，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表达了作者不怕牺牲的坚定革命意志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还有《宝剑歌》、《剑歌》、《宝剑诗》《红毛刀歌》等，也以对刀剑的歌颂，表达了这一主旨。特别是她后期创作的诗作，对她这种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表现的更充分。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这些诗作为多宣传革命而作，不仅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而且表现形式方面注意大众化、通俗化。如《同胞苦》、《勉女权歌》、《支那逐魔歌》

等。

秋瑾还写了不少词。其前期的词作多吟咏花鸟，内容较单薄，后期词如[满江红]“小住京华”、“肮脏尘寰”等，就与诗一样，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豪迈爽朗胸怀。

秋瑾在散文创作方面，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崇尚白话文。如她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等文章，就以白话文写成，不仅表达了反对封建压迫，呼喊妇女独立解放的思想，而且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进步散文的发展方向。

秋瑾还写了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弹词《精卫石》，目录 20 回，今残存 6 回。这部作品有作者自传的成分，写出身书香门第的女主人公黄鞠瑞，不满封建家庭的束缚，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塑造了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艺术形象。

秋瑾丰富的创作完全是用她追求革命的一腔热血写出来的，即把革命和文学很好地统一了起来，因此她的作品闪耀着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的光辉，对当时的革命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还有邹容（1885—1905）和陈天华（1875—1905）也是此时著名的革命家和文学家。邹容的《革命军》（1903）歌颂革命，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共和国的具体政治纲领，在当时恰如“天清地白，霹雳一声”，使清廷大为震动，对政治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部作品还以奔放的感情，流畅的语言，使散文通俗化大大前进了一步，是一篇著名的表现革命内容的新体散文。陈天华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和出色的宣传家。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作品，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宣传革命思想，体现了作者优秀的宣传和艺术才能。其中《猛回头》是唱本，《警世钟》是白话散文，《狮子吼》是未完成的章回小说。这三部作品以它通俗化和高涨的革命热情，在当时广为传诵。

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团体主要有“南社”和“春柳社”等。“南社”成立于 1909 年，主要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他们配合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种族压迫，提倡民族气节。其取名为“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其于 1910 年出版《南社》期刊，分文录、诗录、词录三部分，到 1923 年，共出版 22 集。另外，1917 年辽出版《南社小说集》1 册。辛亥革命前有社员 200 余人，辛亥革命后猛增至 1000 多人，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南社”的成立对当时的文学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更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大大加强了。

“南社”的主要成员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拒俄义勇队（在日本），中国同盟会（在芜湖）等革命团体，并到岭南等地从事过革命活动。他勤于创作，诗歌尤多。著名者如《将游东瀛赋以自策》、

《图南一首赋别》、《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等诗作，表现了激昂慷慨的革命气势。高旭（1877—1925）字天梅，江苏金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归国提倡革命，曾为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他不喜吟花弄月诗风，提倡通俗的鼓动革命的诗作。如他的《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诗，就有这个特点。特别是他的长篇歌行体诗《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国亡歌》等，以奔放浩荡的革命热情，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可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进军歌。可惜他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陷入颓唐失意，连“南社”的革命作用也开始怀疑。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他于1903年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并到上海认识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坚定了革命理想。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年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成立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他同时是个著名的诗人，其作品歌颂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命的理想与怀抱，表达旺盛的革命热情和爱国思想。艺术风格方面与陈去病的拘谨板滞和高旭的恣肆汪洋均不同，表现得清新朴实、流转自如。他在辛亥革命后，仍然追随时代步伐，积极鼓吹革命，表现了一个爱国诗人的高贵品质。另外，南社作家中还有苏曼殊（1884—1918）、马君武（1882—1940）、周实（1885—1911）、宁调元（1885—1913）等人较为出色。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文学团体，它对辛亥革命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其中成员发生了分化。有的继续追求革命，有的陷入消沉颓唐，有的则走向了革命的反面，所以，它的作用不得不由“五四”前后新的文学团体和革命作家所代替。

“春柳社”是1907年至1908年间，由留学日本的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的。它主要是组织戏剧活动来宣传革命思想，曾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过《黑奴吁天录》等剧目。这个组织最早将话剧这种“新剧”或“文明戏”引入中国，对“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的繁荣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辛亥革命前后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总体看是对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但不可否认，它毕竟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学的范畴，它和辛亥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如它虽然高扬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但实际上它的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它在文学方面始终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反封建口号。同时一些革命派作家的脱离群众和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的模糊甚至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启蒙和文学改革运动。这样就造成了辛亥革命前后作为政治运动是轰轰烈烈，而作为文学运动却显得有些冷清，虽然其间也不乏响亮的口号，但却也淹没在政治运动中去了。致使这个时期文学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维新改良派大。一些维新改良派代表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还与遗老们合作起来，形成旧文学的大合唱以

对抗这时的文学革命。出现了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及其作品，陈腐俗套又脱离现实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以及充满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的戏剧等。这种局面的改变不得不由“五四”前后的新的文化运动来完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是有一个酝酿过程的，限于整套丛书的体例，本书只是着重论述这一酝酿过程的文学和“五四”期间的一些具体行动，更大的成绩即1921年以后，留待下一册书谈。但这一时期的文学从性质上讲应属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文学，而起实际领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先进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呈蓬勃之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中国的形势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接着，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各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和旧思想旧文化对民族意识的严重束缚，开展了唤醒民众、挽救危亡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中的杰出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丑恶面目，推动了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专门的文艺性质的社团、期刊和文学家，一些革命家和作家的文学主张及作品大多发表在《新青年》这个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上，所以论述此时期的文学必须围绕《新青年》等杂志来展开。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原名《青年杂志》。它创刊伊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如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卷首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对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退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6条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已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到了1916年9月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后，更成了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陈独秀陆续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封建的专制主义和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独立人格”。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提倡“尊孔读经”，并要求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国家宪法，针对此，陈独秀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实生活》、《宪法与孔教》等文，指出孔教与帝制不可分割的缘由和孔教的不适合现代生活，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即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也

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庭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当时同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则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说明社会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论述虽在理论的准确性方面有失之激切或偏颇之处，但它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战斗性，却对当时激进的民主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另外，这时的《新青年》还发表了不少要求个性解放、社会进步的文章。这些文章贯穿在对青年、妇女、人生、教育、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论述中，对人们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尊重科学知识有积极作用。

《新青年》作为一本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主张“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亦是其一个重要方面。它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所写，发表于1917年1月。胡适在该文中主张文学改良要从“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8事入手。并总结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价值。故草此论。”胡适的这种文学改良主张，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趋势。接着2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在该文中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此说宣示了反封建与民主革命的本质，接触到了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战斗精神比胡适坚定得多。这年《新青年》还发表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讨论文学革命的文章。

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取得了实绩，不仅《新青年》自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而且还发表了不少白话诗作和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同年，李大钊、陈独秀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

阔政府，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同时，在李大钊和蔡元培支持下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1919年1月创刊。

《国民》是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很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富有鲜明的爱国色彩。《新潮》（英文名The Renaissance，意即文艺复兴）是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创办的综合性刊物，它也发表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文学革命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其后，《晨报》改组第7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推动下也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发表了不少新文学作品。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了。在他们影响下，当时全国学生团体中出版了许多小型的白话报纸和期刊，如《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建设》等，都提倡新文化和新文学，并使它的影响遍及全国。另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等，也是当时著名的提倡新文化的副刊，影响很大。1920年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大杂志也改变内容并采用白话，将文学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作了这样总结：“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这段论述“五四”文化运动的文字，对“五四”以前，一段同样适用，可以说是很中肯的。

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矛头所向，自然遭到一批守旧人物的咒骂和抵抗。如1919年初，北京大学内流言四起，对《新青年》百般污蔑恐吓。三月，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国故》月刊，以所谓“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林纾（琴南）也在《新申报》上作小说，影射痛骂陈独秀、胡适诸人。并写了《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等文，攻击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同时对白话文也大加嘲讽。星云堂影印刘半农藏的《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序引描写这种状况说：“黄侃先生还只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

指林纾所作小说《荆生》中的一个伟丈夫（荆夫）痛击影射革命派田其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之事。

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另外，当时这些反对者还借用官方——国会出来弹劾支持文学革命运动的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虽然皆未成功，但也可知这些先驱者战斗的艰辛。同时，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并没有被吓倒，而是给予了坚决的反击。《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针对种种流言蜚语，猛烈地抨击旧人物，正式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并表示为此不惜“断头流血”。李大钊也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等文，揭露林纾等人企图假借军阀势力实行武装镇压的阴谋，并以俄国革命的实例，说明“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表示了同旧势力坚决斗争的非凡勇气。《每周评论》还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专页，转载当时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蔡元培先生也以公开信的形式答复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革命主张已经得到群众广泛支持，这些封建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暂时偃旗息鼓了。

“五四”运动前后(1921年前)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主要是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理论方面的文章著作比较多，创作相对显得弱一些，但也不是没有，也是取得一些实绩的。如鲁迅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而且还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1918年至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6首新诗，后收在其《集外集》里。另外，他在这时还写了不少战斗性极强的随感杂文。他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的杂文，指斥反对白话的人为“现在的屠杀者”，说他们“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极其痛快淋漓。特别是鲁迅先生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主要描写一个被迫害致病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并通过这种描写暴露了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罪恶，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吃人”的历史，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这个“迫害狂”患者看到人们的脸色和议论，联想到了狼子村佃户告荒时讲过的人吃人故事。从而把医生为他把脉让他吃药理解为赶紧吃他，并归结到这个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长期以来这个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如小说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先生就是通过巧妙的构思，通过主角狂人的感受和他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及某

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残酷性作出了惊人的艺术概括。继《狂人日记》后，鲁迅先生又创作了《孔乙己》、《药》这两篇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高超艺术水平的中篇小说，从而为中国现代前期文学史上做出了划时代的杰出贡献。

除鲁迅先生外，这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叶绍钧等人也创作了不少新诗和白话小说。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3期和6卷6期上发表了《山中即景》与《欢迎独秀出狱》等诗，陈独秀也在《新青年》里写过《丁巳除夕歌》、《答半农的D—诗》等诗作。他们这些诗采用新的形式，并且是为建设文学革命事业服务的，所以在思想内容方面极富现实性。如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中之一节：

除夕歌，歌除夕，
几人嘻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
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
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
团圆恩爱甜如蜜。
满地干戈血肉飞，
孤儿寡妇无人恤。

胡适于1920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据此诗集序中说，他从1916年7月就开始写新诗了。特别是刘半农可以说是这个时期在新诗创作方面最有成绩的一个了。他在《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上发表了两首新诗，其中《相隔一层纸》：

屋子里摆着炉火，
老爷吩咐买水果，
说“天气不冷火太热，
别任他烤坏了我！”
屋外躺着一个叫化子，
咬紧着牙齿，对着北风呼“要死！”
可怜屋外与屋里，
相隔只有一层薄纸！

此诗以通俗的语言，对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贫富悬殊的严重社会现实。刘半农的《学徒苦》、《卖萝卜人》、《饿》等诗，也对下层人民的穷苦生活作了冷静深刻的描绘。《铁匠》和《一个小农家的暮》则可以看出他对工人和农民力量及其品质的由衷赞美。发表于1920年《新青年》上的长诗《敲冰》，又用象征的手法歌颂了革命者冲破层层阻力走向胜利的

历程。他的这些诗作朴实无华，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在艺术方面也很讲究，譬如对比、象征、夸张的使用，声调韵律的和谐严谨等，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叶绍钧（圣陶）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他早在 1914—1915 年间就写有《穷愁》、《博徒之子》、《姑恶》、《终南捷径》、《飞絮沾泥录》等短篇小说。据他自己讲，这是较多接触了外国文学，特别是受了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这些短篇小说虽然用文言写成，但由于作者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写平凡的人生故事”，所以揭露黑暗社会现实与同情百姓疾苦的主旨很明显，已体现出了他以后创作的主要特色。同时也体现出了他与“五四”时期其它一般作家的不同之处，他已在生活积累与文学素养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到了 1919 年，叶绍钧开始创作白话小说，有《隔膜》、《火灾》、《线下》等几个最初的白话短篇小说发表。这几个作品直接描写下层社会贫苦百姓的不幸遭遇，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艺术手法也很成熟。

另外，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介绍也是这个时期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1918 年《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译载了《娜拉》等作品，使这种翻译介绍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鲁迅、刘半农、沈雁冰、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俄国及欧洲其它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被有系统地介绍进来。其中著名作家有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这对帮助中国文学摆脱旧形式的束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初步的文学实绩，才使 1921 年以后中国文坛上成长和出现了划时代的作家与作品。这留待现代后期部分论述。

6. 日本文学与夏日漱石

19 世纪上半叶，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对外无力抵御美、英、法、俄等帝国主义者的威胁逼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内无法控制藩阀的封建割据局面，社会矛盾尖锐激化，贫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起义不断。在此情况下，1868 年日本终于爆发了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从此，日本结束了 300 年的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也得以壮大，西方各种进步思想也传入日本，使全国范围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活跃起来。如爆发了 19 世纪 80 年代的自由民权运动，就是一次不满日本统治者对内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外侵略掠夺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民主运动。虽然这次

见叶圣陶《未厌居习作·过去随谈》。

运动在天皇政府的镇压分化下，在右翼领导人的妥协背叛下失败了，但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人民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以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进步势力为代表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对此，天皇政府又进行了残酷镇压，于 1910 年 5 月捏造了所谓的“大逆事件”，逮捕了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并把幸德秋水等 12 人杀害。

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其间它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从明治维新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欧洲文学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所经过的历程，并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和变化不定的局面。即或多种文学流派并存争雄，或一种文学流派刚刚诞生，另一种文学流派即予取代，形成其复杂、多样、交叉的特色。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成长、成熟、分化这样 3 个时期。

从明治维新到 19 世纪末是其成长期。其中明治维新后十几年尚处于启蒙阶段。这时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的需要，开始输入西方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科学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出现了福泽谕吉、西周等启蒙思想家。福泽一个人就翻译了一部包括地理、历史、文化、制度、物理、化学、演讲法以及诸如射击法、簿记之类的《西洋情况》，几乎全面地介绍了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西周编纂了《百学连环》这部日本最早的百科全书，在社会思想、哲学或者美学方面发挥了卓越的见解。在文学方面主要是翻译文学和政治小说。翻译文学有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李顿、迪斯雷和司各脱的作品，法国作家凡尔纳、费内隆、大仲马和雨果的作品，还有一些俄国作家作品等。这些翻译文学作品，由于其着眼点并不是对文学本身有多大兴趣，而是着重在介绍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及其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所以其译文并不讲求文字的优美和忠实于原文，而是一种改编性翻译，但它和其它学科的翻译作品一样，犹如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们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看到了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学流派，并通过这种途径吸收西方文学的先进部分，从而对日本文学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至于政治小说在产生时间方面与翻译文学平行或互相衔接，其目的多以启发人民政治觉悟和宣传政党理想为主旨，作者多是职业政治家。其中代表者有改进党大人物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和强调国家权力思想的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经国美谈》的内容以希腊历史上底比斯的勃兴和完成霸业为主，同时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改进党的主张和意见。《佳人之奇遇》以广阔的世界作为舞台，满怀深情地描绘了那些处于困境和逆境中的国家，流露出激昂慷慨的感情。这些政治小说其主要目的亦不在于文学，但它改变了以往江户时代认为文学不过是给女人和孩子看的观点，使社会上层人物给予关心并亲自执笔，和翻译文学一起使人们认识到文学是形成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它对日本现代前期文学的启蒙推动作用亦应给予肯定。

在翻译文学和政治小说的推动下，紧接着出现了文学评论家坪内逍遥

(1859—1935)及其《小说神髓》(1885)。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这部文学论著中,详细地阐述了小说的写作方法和它在文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提出小说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并主张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他的这些文艺观点,对政治经济等已经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文学还停留在封建主义观念状态的日本文坛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日本现代前期文学的发展。

日本现代前期文学的第一个奠基者是二叶亭四迷(1864—1909),他原名长谷川辰之助,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期在明治维新的“开化革新”气氛中度过。1881年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俄文,接触了大量的俄国进步文学,并对文学创作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1886年,他发表了文学评论《小说总论》,主张“文以载道”,通过形象揭示社会本质,在创作手法方面,提倡现实主义的方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于1887年用现代口语写出了日本现代前期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浮云》。

长篇小说《浮云》主要描写一个正直的知识青年内海文三曲折坎坷的命运。内海文三从学校毕业后,被录用为政府机关的下级职员。他在机关勤勤恳恳、尽职尽责,在家孝敬老母,并与堂妹阿势热恋着。但由于他生性耿直,对上司不会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所以被解雇了。而他的同事本田则恰恰与他相反,得到了升迁。文三被解职后,身边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苦楚。阿势的母亲再也瞧不起他了,阿势也在轻薄才子本田的蛊惑下倒向了本田,文三对此感到很痛苦。后来阿势还劝文三通过本田设法复职,生性耿直的文三坚决不从,两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浮云》就是通过文三、阿势、本田三人纠缠不清的恋爱关系的描写,反映了明治维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和新旧两种思想的对立。内海文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屈从于日本封建官僚的压迫,不愿采取与现实妥协的处世哲学,终于被关在幸福大门之外。而本田则是封建官僚的典型,他与文三恰好相反,他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得以步步高升。作者通过他俩的不同命运的描写,揭示了明治时代官场的腐败黑暗。而对势利小人阿势母亲的描写,则批判了当时小市民贪财附势的庸俗心理。另外,阿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她看上去是个比较开明、追求欧化的知识女性,可骨子里仍旧受封建思想的深深桎梏。她开头与进步知识青年文三热恋,可当文三被解职后,她却一步步倒向了本田。作者通过她这一似新实旧的形象,触及了明治时代单纯模仿西方的种种肤浅的所谓“文明开化”现象。作者在主人公文三身上,还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之后,知识分子的苦闷、迷惘,以及作者对日本现代社会的憎恶与失望。正是由于这部作品典型形象的塑造、真实细腻的心理刻画及深刻有力的社会批判,使它为日本现代前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中第一部现实主义著作。

二叶亭四迷在创作了《浮云》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搁笔沉默,直到1906年才又写出第二部小说《面影》,1907年发表最后一部小说《平凡》。这两

部小说同样以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表现他们在天皇政府统治下的挣扎、苦闷、失败和作者对社会的探索。

《浮云》之后，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是森鸥外（1862—1922）及其短篇小说《舞姬》（1890）。森鸥外青年时代曾游学欧洲，受到了古希腊以来的美学和自由精神的深刻影响，回国后一度从事医学专业方面的启蒙和评论文章的写作，并创办了日本最早的文艺评论杂志《堰水栅》。他以这个刊物为基地，对坪内逍遥认为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把理想隐没起来的所谓“没理想”论提出挑战，认为“没理想”就等于“无理想”，强调了艺术上理想的重要性。不管这场论战的结果如何，其客观上使日本文坛对文艺的本质或者文艺上种种形式的特点的看法明确深入了，这却是事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森鸥外于1890年创作了《舞姬》。《舞姬》描写一个青年官员太田丰太郎留学德国，接触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后，再也不愿做官僚机构的工具，勇敢地去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他与德国穷舞女爱丽丝相恋，但却遭了解职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坚持到底，而是在朋友相泽谦吉的劝告下，屈服于封建官僚制度和道德观念，抛弃了爱丽丝回国。最后爱丽丝也疯了，他们的爱情也以悲剧结束。《舞姬》虽然在表现反抗性方面显得弱了一些，但它却以浪漫主义情调表现了个性自由追求者的失败和悲哀，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开拓性作品。

到了19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文学在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人所开创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出现了“砚友社”和“文学界”两个重要文学团体与一批著名作家。“砚友社”成立于1885年，1905年左右解体，以尾崎红叶（1867—1903）为代表，是在日本文坛上非常活跃和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团体。这派作家以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为理论指导，崇尚写实主义，但因其以赢得读者廉价的眼泪为主旨，对社会的描写流于肤浅，有迎合小市民的倾向，所以实际上是对初期现实主义的一种退化。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派有些作家后来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写出了一些揭露社会黑暗，同情百姓困苦的好作品。“文学界”是以北村透谷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和评论家组成的文学团体，以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人创办的杂志《文学界》而得名。这批青年作家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要求个性解放，梦想幸福的海市蜃楼，讴歌青春的活力，在日本掀起了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潮，并为日本现代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北村透谷（1868—1894）是一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评论家。他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活动，后运动失败转而从事文学创作。他反对日本的黑暗社会现实，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的诗剧《楚囚之歌》（1889）和《蓬莱曲》（1891）是日本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品之一，洋溢着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炽热感情和对黑暗社会现实愤怒诅咒的情绪。他称“这个无聊的世界，这个无所作为的世界，这个虚伪的世界，这个狡诈的世界，这个丑恶的世界，这个肮脏的世界，怎么能叫我的心得到片刻安宁！”（《蓬莱曲》）。

他创作了大批格调清新、形象优美的抒情诗，流露了一个觉醒者和反抗者的孤独寂寞之情。最后他在理想和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满怀悲愤和迷惘，自杀身亡，年仅 26 岁。

这个时期的日本文学还流露出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的迹象。其中首先在小说散文方面体现出来。青年女作家樋口一叶（1872—1896）以短篇小说创作而知名于文坛，主要作品有《埋没》、《浊流》、《十三夜》、《青梅竹马》等。樋口一叶出身于下层社会，对普通百姓在日本现代生活中的凄惨命运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的作品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处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底层的妓女、女仆、小商、小手艺人等人物形象。描绘他们，特别是妇女受凌辱欺压的悲惨命运。这些文章感情真挚、文笔清秀纤巧，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国木田独步（1871—1908）先是一位追求个性解放自由的浪漫主义诗人，后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步转向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他一生创作了数十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诗歌评论等。其中以小说创作的成就最大。他的小说大多以社会下层劳动人民为描写对象，特别是晚年的现实主义佳作《穷死》（1907）、《竹栅门》（1908）等，真实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国木田独步的创作标志着此时日本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

另外，由于这个时期日本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加快了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产业工人面对资本家和政府的剥削压榨，不断举行罢工起义，加之西方无产阶级思想的传入，在日本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斗争与思潮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产生了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文学。其中小说方面以德富芦花和木下尚江为代表，诗歌方面以儿玉花外为代表。德富芦花（1868—1927）是一个基督教人道主义者，他不满黑暗时政，热切关注社会问题，积极探讨社会主义思想。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不如归》和《黑潮》。前者通过女主人公浪子的一生写出日本妇女的悲惨命运，后者以尖刻的笔法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这两部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1900 年至 1911 年是现代前期日本文学的成熟期。这时的日本社会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贫富两级分化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正直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了认真地探索与分析。在此形势下，西方传入的自然主义成为日本风靡一时的文学运动。其早期鼓吹者不仅继承发展了左拉的理论，而且还受欧洲“世纪末”怀疑主义、悲观主义的影响，提出“破理显实”的口号，主张“原封不动地写真实”，反对文学中的想象与虚构，反对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件的描写，有的还赤裸裸地暴露人间丑恶，充满庸俗低级的内容。但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与理论家，或是把西方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淆起来，或是继承浪漫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自由的精神，也创作了不少不满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

岛崎藤村（1872—1943）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青年时期

与北村透谷一起是“文学界”的重要成员，并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而知名于文坛。如他的第一个诗歌集《嫩菜集》（1897）歌颂青春与爱情，充满浪漫主义情调。后由于生活的坎坷和对现实的不满，转而着力于对现实的描写。他发表于1906年的《破戒》就是一部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和具有一定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这部小说主要描写出身于社会底层的青年教师濑川丑松的觉醒。濑川的父亲告诫他要终身隐瞒自己的低贱出身，否则的话就将被社会抛弃。但在现实的逼迫下，特别是在同是贱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感召下，濑川经过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向社会宣布了自己的出身，表现了他“不以低贱为耻”的觉醒。小说通过濑川的破戒与觉醒，批判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仍存在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人权解放的民主要求。同时小说还描写了天皇专制统治下教育的腐败，政界议员争夺选票的黑幕及普通百姓的贫困生活等。这样，使《破戒》这部小说广泛地勾勒出了日本明治末年的社会画面，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继《破戒》之后，岛崎藤村又创作了《春》（1908）和《家》（1910—1911）等小说。《春》以作者青年时代生活为题材，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抱负。《家》写两个封建家庭在资本主义冲击下的没落、衰败，对黑暗社会和封建残余做了抨击。但这两部小说与《破戒》相比，社会批判力显然削弱，多是作者的个人感受，充满阴沉苦闷情调，表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消极色彩。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潮的冲击下，岛崎藤村又写出了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黎明之前》（1935），广泛描写了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的动荡与激变。

田山花袋（1871—1930）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原来也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到1907年写了中篇小说《棉被》后，才确立了他自然主义作家的地位。《棉被》完全按照自然主义理论写成，主要描写一个中年作家与女弟子“恋爱”的故事。它以细致的笔触描写男女由于爱慕情欲而引起的苦恼、妒嫉及最后失败的悲哀，是一篇赤裸裸的情欲忏悔录。它被认为是当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范本和独特的“私小说”的先河。不过田山花袋后来也还创作了反映知识分子贫困潦倒一生的《乡

村教师》和描述日俄战争日本普通士兵悲惨遭遇的《一士兵》等现实主义小说。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还有德田秋声（1871—1943）、正宗白鸟（1879—1962）等人。德田秋声被看作是最具有自然主义特色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新家庭》（1908）按自然主义的主张，描绘了一对市井夫妇平庸灰暗的生活。另外，《足迹》（1910）、《雷》（1911）、《烂》（1913）等作品，语言质朴、格调深沉，塑造了多种不同的市井妇女形象，正宗白鸟有《尘埃》（1907）、《到何处去》（1908）、《泥玩偶》（1911）、《微光》（1910）等作品。有较浓厚的世纪末色彩和虚无主义倾向。

这一时期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潮

流，它推动了现代日本文学创作的繁荣。不过它也表现了两面性。它在打破传统道德观念和文学观念，提倡写实主义，表达人民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反抗等方面是有功劳的。但它缺乏明确的社会意识，过多描写生活琐事等也给日本现代文学带来了消极影响。

另外，随着现代日本文学走上繁荣，除上述文学流派外，此时还出现了一批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其代表人物是诗人、小说家石川啄木（1866—1912）。石川啄木生于本洲东北部的寒村涩民村，幼年家境贫寒。后当过小学教员、记者等。他创作初期崇尚浪漫主义，后写了咏叹个人生活悲苦和愤懑情绪的和歌集《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以及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云是天才》、《道路》、《我们一伙和他》等。他通过“大逆事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天皇政府的反动，朦胧地意识到必须用暴力摧毁“国家政权”，决心倾向社会主义。如他说“长期以来，我对自己以社会主义者相称而迟疑不决，今天不再迟疑了。”（《给濂川的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当时以自然主义文学为代表的文坛给予了批评。如他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里说：“今天的小说、诗、和歌，几乎全是嫖妓、私娼、野合、通奸的记录。”他还号召青年们“我们青年为从这毁灭的状态中振拔出来，现在已经是认清‘敌人’的时候了。……要以全部精神贯注在对明日的考察上——即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有系统的考察上。”他在晚年创作的《无结果议论之后》等诗歌中，还对知识分子不务实际、只尚空谈的作风进行了批评，在《墓志铭》等诗中歌颂了“时时刻刻准备斗争”的先进工人。特别是他的最后一部诗集《笛子和口哨》（1911—1912），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诗歌的代表作。石川啄木这种敢于和黑暗社会抗争，敢于探讨未来道路的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他在贫病交加下，年仅27岁就去世了。不过他的文学创作在日本文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说是现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从1912年开始，是日本现代前期文学的分化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自然主义潮流。其中又分为“新浪漫派”、“白桦派”、“新思潮派”等流派。“新浪漫派”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没落、颓废给予露骨的描写，并在其作品中宣扬变态的性心理和唯美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白桦派”标榜人道主义思想，宣扬人类爱，主张以个性的发展来改造社会。不过其作品也有触及或批判黑暗社会的内容。代表人物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人。“新思潮派”提倡冷静理智地剖析社会，但其作品所表现的现实多为小市民变化无常的日常生活。代表人物为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

志贺直哉（1883—1971）在日本现当代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定地位。他从20世纪初就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多以小见大，以身边琐事和点滴生活来反映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如他的《到网走去》（1910），描写一个在封建礼教重压下的妇女日常生活的悲苦凄惨，折射出

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妇女的同情。《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1918），借对一次日本士兵的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的描写，揭露了军国主义的残暴。他晚年所写的《灰色的月亮》（1945），以列车中习见的小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他的这些作品清新隽永、形象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有岛武郎（1887—1923）这位人道主义作家创作了《一个女性》、《该隐的后裔》、《诞生的苦恼》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特别是发表于1919年的长篇小说《一个女性》被视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它以年青女子早月叶子不满封建家庭束缚，勇敢冲出家庭牢笼去追求个性解放为线索，揭露了日本封建道德的虚伪，表达了作者对不幸妇女的深深同情。芥川龙之介（1892—1927）也是这个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他早期推崇艺术至上主义，但也有不少作品对利己主义等不良风气给予了剖析批评。晚年，他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用讽刺和幽默的手法对“大逆事件”以后的日本社会给予了揭露批判。其中童话小说《河童》（1927）为其代表作。另外，还有一批青年作家积极探索新的社会道路和创作道路，以激进思想和出色的作品，对现代日本革命文学的诞生作了准备。

夏目漱石及其《我是猫》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现代前期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原名金之助，漱石是他的号，出生于江户（东京）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他少年求学，深受汉文化的陶冶，1881年14岁时曾在东京二松学舍学习汉文。1888年夏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其间曾写了不少汉文诗歌，收入其《木屑录》一书里。1893年，夏目漱石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后，曾从事了7年教育工作。1900年，他又被官派到英国伦敦留学，专攻英国文学。其间他体会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对其“金钱万能”感到十分厌恶，对所谓的“西洋文明”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所以，他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威夫特、奥斯汀、梅瑞狄斯等人的作品非常喜欢。另外，他还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收入他后来编成的《文学评论》（1908）和《文学论》（1907）两部专著中。他在英国两年多的留学生活，对他世界观与文艺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1903年，夏目漱石学成回国，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1905年在《杜宇》杂志上发表《我是猫》第一章，得到好评，于是将其写成长篇小说，出版后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他也成为全国知名作家。1907年，夏目漱石辞去教职，成为《朝日新闻》的特聘作家，他后来创作的10多部长篇小说就都先在《朝日新闻》连载。1910年，夏目漱石由于不满时政，加之身患重病、爱女夭折，逐渐产生了悲观厌世情绪。如他的汉文五言诗“大风鸣万木，山雨摇高楼，病骨棱如剑，一灯青欲愁”。就抒发了这种思想感情。不过就在此时，他对社会仍持一种批判态度，曾点名批评高级官员，并拒绝官方授予的博士称号。1916年12月9日因病去世，享年49岁。

夏目漱石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一生创作了 10 多部长篇小说和大批中短篇小说，2500 句俳句，208 首汉诗，以及大量的书信、日记、散文、评论、讲演稿、回忆录等。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高。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代表作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社会批判锋芒。其早期作品除长篇小说《我是猫》外，还有中篇小说《哥儿》（1906）、《旅宿》（1906）和短篇小说集《漾虚集》（1906）等。《哥儿》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塑造了一个憨厚正直的教员形象，揭露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黑暗。《旅宿》虽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但也通过主人公想摆脱现实而不可得，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夏目漱石中期作品有通过描写男女爱情反映自己道德观念的《虞美人草》

（1907），揭露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矿工》（1908），表现男女爱情的三部曲《三四郎》（1909）、《后来的事》（1909）、《门》（1910）等。这部分具有强烈批判性和深刻思想性的作品，在夏目漱石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夏目漱石晚期作品大都以知识分子精神的孤独及其利己主义、忏悔为主题，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批判锋芒有所削弱。如长篇小说《行人》（1912）、《过了春风时节》（1912）、《心》（1914）、《道草》（1916）等。

夏目漱石是一位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以其思想内容丰富，艺术风格独特的作品将日本文学推向世界。他的创作追求一种“法天去欲”的道义理想境界，其思想内容方面主要是对日本明治时期社会生活的揭露与批判，但也有一些具有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继承日本文学中如“俳谐”文学的风趣，通俗文学“落语”的调侃，古典文学的情调氛围等传统，以及西方文学长于心理描写的有益成份等，形成了其描写细腻，结构完整，讽刺尖锐，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鲁迅先生曾称赞他以“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长，并说他“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戸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于 1905 年开始在《杜宇》杂志上连载，1906 年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主要通过教师苦沙弥家所养的一只猫的观感和议论来描写、评判现实生活。这只猫眼睛中看到的是苦沙弥及其家人清贫琐碎的生活；察沙弥等一批崇尚空谈、吟风弄月、滑稽可笑的知识分子；心术不正、残忍歹毒的资本家；以及乐于恶作剧的顽童等，从而揭露抨击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黑暗及资产阶级的丑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正直及其软弱可怜。

《我是猫》虽然以猫的观感来反映现实，但其着力刻划的还是一群知识分子形象。其中苦沙弥是中心人物。他虽平庸无奇，但他正直善良，嫉恶如仇。他痛恨资本家及其走狗，骂他们“算什么东西”。可另一方面，他又软

鲁迅：《关于作者的说明》，见《鲁迅全集》第 11 卷。

弱虚荣，以至于窝囊，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另外，小说还刻划了迷亭、寒月、东风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迷亭才华横溢，可又由于无处发挥而消极懈怠。寒月与东风也各有所长，可最后也一事无成。作者通过这些人物，谴责了社会对他们的摧残，批评了他们自身的弱点。还有对官僚机构、警察制度的讽刺抨击，对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批判，对明治时期腐朽的文化、教育和虚伪的伦理道德的嘲讽鞭挞，都体现了小说作为一部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著作的深刻的思想内容。

《我是猫》在艺术上也是独具特色的。作者把猫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引入故事中，并以它的见闻来展开故事，这样就取代了一般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线索，结构新颖。其次，作者将日本文学中的讽刺传统与 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幽默讽刺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极具情趣的语言特色。如妙趣横生的猫态猫语，荒诞离奇的逸闻轶事，插科打诨的对话等。主人公苦沙弥为一个研究空间论的“天然居士”写的铭文是：“天然居士者，乃研究空间、读论语、吃烤羊、流鼻涕之人也。”将一个不学无术又装腔作势者的丑态刻划得淋漓尽致。另外，作者还善于通过想象和夸张来加强小说的讽刺力量。如描写资本家的面容“扁平到使人疑心：他是否在幼小的时候和人打架，被顽皮孩子抓住颈根，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压给压扁了，所以 40 年后还留下那副具有前因后果的尊颜。”将资本家外表的丑陋与内心的奸诈恶毒联系起来，加强了读者对他的厌恶，形成了全书语言生动活泼、滑稽幽默、韵味深长的特色。最后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这部小说也存在结构松散、内容庞杂、议论过多、油腔滑调等瑕疵，但也瑕不掩瑜。《我是猫》确为日本现代文学中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对其后的日本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四、世界现代前期的美国文学

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算起才不足 500 年，如果从美国建国算起才 200 年左右时间。200 多年前，当时的美国大陆尚处于殖民地时期，只有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民间口头创作和英国移民所写的游记、日记等类东西。1775 年，美利坚民族与英国宗主国之间爆发了史称的“美国独立战争”。1776 年 7 月 4 日美国宣布独立，1783 年独立战争取得胜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美国独立后即很快跨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但发自欧洲的工业革命在美国南北方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北方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制，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1860 年跃居全世界第 4 位。而南方却还延续着蓄奴制。这样南北方两种制度产生了尖锐矛盾，终于在 1861 年爆发了南北战争。经过近 5 年的内战，最后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这近百年的历史是美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阶段，是美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对外扩张的时期。其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由 1860 年的世界第四，一跃于 1894 年成为全球第一。随之出现了大垄断性质的托拉斯，工业与金融巨头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另外失业、贫民窟、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相继出现。同时，美国垄断集团也加紧向外搞资本输出，企图建立整个美洲的政治经济垄断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以中立国的身份大发军火交易横财。使它在战后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又取得了极大发展，进入世界强国行列，但相应的贫困、污染和阶级冲突也更加尖锐地体现出来。同时它向外扩张也更广更大，辽参予了扼杀中国、菲律宾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时期正是本书所要重点论述的时期。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美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当然也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美国 200 多年的文学史，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南北战争前可为第一时期，南北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为第二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可为第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为第四时期。

南北战争前即第一时期，浪漫主义是美国文学的主流。因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反映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想与热情，表现形式新鲜活泼，加之又受当时还处于全盛时期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所以造成其浪漫主义基调。其代表作家及作品，小说方面有：欧文及其《见闻札记》（1820），库柏及其《开拓者》（1823），霍桑及其《红字》（1850），麦尔维尔及其《白鲸》（1851）等；诗歌方面有爱伦·坡及其《乌鸦》（1845），朗费罗及其《海华沙之歌》，惠特曼及其《草叶集》等。这些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大多以美国生活为题材，闪耀着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光辉，标志着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其间还产生了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这一废奴文学的代表作品。

从南北战争结束（186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而成为美国文学主流。其中马克·吐温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被称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的百科全书”。杰克·伦敦的小说《铁蹄》是揭露“工资奴隶制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比欧洲晚了几十年。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之时，美国还正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但当南北战争结束、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如中小资产阶级不断破产，失业大军不断扩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种族歧视仍然存在等更加暴露，使人们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想感到幻灭。于是新的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出现。如科技领域细胞、能量转化、生物进化的发现，爱因斯坦“相对论”理论的建立，促使人们辩证地发展地看待问题。哲学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继续发展，尼采的“超人”学说、孔德的实证主义、威廉·詹姆斯和约·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也风行美国。宗教领域由于科技与哲学的发展，人们对它越来越采取疏远的态度。这样普遍关注现实的时代大趋势，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实，于是浪漫主义与时代已不再合拍，加之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从而促使现实主义文学的蓬勃兴起。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有几个特点：1. 不满现状。这不满现状表现为对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批判。因为此时美国已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工人、农民、中小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诺里斯的长篇小说《章鱼》（1901）描写了农场主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控诉了垄断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通过柯帕乌的一生真实地反映了金融资产阶级的丑恶发家史，并揭露了美国金融资产阶级如何控制美国政权的真象。还有欧·亨利的小说等。2. 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真挚同情。如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与《珍妮姑娘》以两个穷人女儿的不幸命运为线索，广泛而真实地描写了美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还有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等。3. 由于美国种族歧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反对种族歧视也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傻瓜威尔逊》，道格拉斯的《一个美国黑人奴隶的自述》，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等。另外，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也有其明显的局限，如不少作家以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为出发点，来揭露批判社会政治中的不合理现象，一旦他们的理想感到破灭，就会充满悲观失望情绪。还有颂扬美国社会的“民主”，美化资产阶级，宣扬改良主义等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美国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很多，主要者有豪威尔斯的《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詹姆斯的《贵妇人画像》（1881）、华顿的《快乐之家》（1905）、诺里斯的《章鱼》（1909）、克莱恩的《街头女郎梅季》（1893）等。而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三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是继惠特曼和斯托夫人之后把美国文学推向世界的著名作家。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文坛除现实主义文学外，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达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以及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的流行，又涌现出了不少文学流派。如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流行。其中有“垮掉的一代”文学、“黑色幽默”文学、“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等。这些都进一步将美国文学推向世界。

1. 马克·吐温及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讽刺幽默大师。

马克·吐温是其笔名，他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镇。他少年家境贫寒，曾先后当过报童、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水手和领航员。南北战争爆发后，他转而当记者，并开始文学创作。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就是从这时开始采用的。

马克·吐温的早期创作主要是短篇幽默小说。1867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及其他》出版。1869年，他游历欧洲各地写成的散文集《傻子国外旅行记》，既嘲笑了欧洲的封建残余和宗教愚昧，又讽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无知，以较高的艺术成就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坛上的地位。《田纳西的新闻界》（1869）、《我怎样编辑农业报》（1870）揭露了资产阶级新闻界的勾心斗角与浅薄。《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1870）暴露了所谓“人人平等”的美国对华工的迫害。《竞选州长》通过一个独立党人参加纽约州长竞选，遭到民主党、自由党对手的诽谤打击不得不退出竞选的故事，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是一幅绝妙的政治漫画。

马克·吐温中期转入长篇讽刺小说的创作。其风格幽默轻松逐渐减少，辛辣讽刺批判成了主色调。1874年，他与华纳合写了《镀金时代》，揭露批判了内战后美国政界的腐败现象和弥漫全国的“投机”风气，并把这种现象和风气用夸张的手法加以表现，说明此时（70年代）美国的自由竞争并非“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王子与贫儿》（1881）和《在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这两部历史传奇小说，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罪恶。《傻瓜威尔逊》（1893）对种族歧视进行了尖锐批判。历史小说《冉·达克——圣女贞德》（1896）讴歌了法国民族英雄，谴责了贵族和教会的叛卖活动。《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这一对姊妹篇小说，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佳作。《汤姆·索亚历险记》借描写汤姆和哈克两个小主人公追求活泼自由生活的故事，巧妙地讽刺了社会弊端，并以其生动的情节和细致的心理刻画，为各年龄段读者所喜爱。

另外，马克·吐温还以他早年在密西西比河上当领航员的生活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密西西比河上》（1883），记叙了舵手协会的斗争实况，既是

美国 50 年代劳工斗争的史料，又是作者对 80 年代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的响应与支持。

这些长篇作品，标志着马克·吐温的创作达到了高峰期。

马克·吐温晚期创作的主题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其讽刺揭露一如既往，但同时也出现了悲观失望情绪。如著名的旅行随笔《赤道环行记》（1897），对“做尽了各种坏事”的英国总督罗德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给予了批判。他写道：“世界各国的领土——当然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从别人的晾衣绳上盗窃来的衣服”，而“各基督教国家的政府现在正讨论互相抢夺晾在绳上衣服的计划”。还有杂文《托钵僧和傲慢无礼的陌生人》（1902）、政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1901）及《为范斯将军辩护》（1902）等，亦都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掠夺屠杀罪行，可有时候又流露出认为帝国主义的无可救药和自己的悲观失望情绪。《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1899）与《百万英镑》（1893）两个小说也是马克·吐温晚年创作的名著。1907，他开始写自传，1910 年不幸病逝。

马克·吐温的作品发展了美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在解放前就翻译介绍了他的作品，鲁迅先生还曾为他的《夏娃日记》（1906）中译本作过序，称他“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它将追求自由和黑奴解放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白人孩子哈克与黑奴吉姆结伴逃亡的故事。哈克在受不了父亲的毒打而外逃过程中，遇见了同在外逃的黑奴吉姆，俩人结伴同行，顺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途中遇到两个卑鄙的骗子，吉姆被卖掉。但哈克和吉姆在逃亡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哈克在汤姆的帮助下救出了吉姆，吉姆也在汤姆宣布其女主人华森小姐的遗嘱中获得了自由。

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谴责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揭露了其专制制度的残忍粗俗，体现了作者对黑人的友好感情。其中吉姆是个理想的黑人典型。他虽多年遭受奴隶生活的折磨，但他并未变得驯服、麻木。他的逃亡是为了挣钱来救出妻儿，共同过自由人的生活。他在逃亡途中，以大朋友的身份尽量照顾小哈克，特别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去救助受伤的汤姆时，他敦厚善良的崇高品质体现得更明显。作者塑造吉姆这一黑人形象，正面倡导了种族平等的民主思想和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哈克是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作者在他的身上花的笔墨最多，他渴望自由，但起初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认为“帮助一个被追捕的奴隶逃跑”是大逆不道，甚至要写信告发吉姆的逃亡。后来在吉姆的高尚行为感召下，

鲁迅《〈夏娃日记〉小引》，见《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

哈克毅然倾全力帮助他争取自由，自己也终于从一个带有偏见和幼稚倾向的顽童变为有健康心灵和正直无私品质的少年。哈克这一形象也成为世界儿童文学中受人喜爱的典型。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顶峰之作。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多方面的艺术才能。首先，作者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上，很好地与浪漫主义结合了起来。如作者在描写密西西比河一带的城镇和乡村时，在刻画吉姆和哈克这两个典型人物时，都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而比较客观地再现了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而在描写密西西比河上的迷人景色和人物渴望自由的心情时，又表现了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其次，这部小说运用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也是其显著点。如作者在作品首尾用不少篇幅写汤姆的空想和醉心当一个传奇英雄，就衬托了哈克的清醒与质朴。另外，马克·吐温幽默讽刺的创作特色在这部小说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作品围绕着哈克与吉姆的历险，描写了不少动人滑稽又富传奇色彩的故事。如对两个绰号“国王”与“公爵”的江湖骗子的描写，充满漫话式夸张和尖锐嘲讽。使整个作品充满幽默诙谐情趣，并寓庄于谐，含意深刻。在语言使用方面，整部作品采用美国南方方言，只有黑人吉姆的话用黑人口语，这样一种创新使小说清新别致，并对以后美国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艾略特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其在美英两国开创了新文风，是“英语的新发现”。

2. 欧·亨利及其《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锡特内·波特，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生之家。少年由于家贫读书时间较短，15 岁即出来工作，先后当过学徒、牧童、会计员、办事员和银行出纳员。在当出纳员期间，由于技术事故亏空资金，欧·亨利逃往拉丁美洲避难。次年，他回国探望病重的妻子，被捕入狱 3 年。出狱后迁居纽约，从事专业写作。1910 年 6 月 5 日因病去世，享年 49 岁。

欧·亨利是位才华横溢又多产的作家。他早在监狱中就开始以笔名“欧·亨利”发表作品，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共创作了 1 部长篇小说和 300 多个短篇小说。欧·亨利主要以短篇小说创作见长，他的短篇小说作品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因此，习惯上把他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合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至今，美国还以“欧·亨利”的名字来命名其优秀短篇小说奖。

欧·亨利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类题材。第一类是反映拉丁美洲生活的作品，以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为代表。该小说以讽刺的笔调揭示了美国对拉美各国的殖民掠夺和粗暴干涉，批评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第二类题材是描写美国西部草原生活的短篇。在欧·亨利看来，美国西

部草原上的人们纯朴正直、勤劳乐观，因此，他的这类描写西部的作品与城市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圣罗沙里奥的朋友们》写一个讲义气、重交情的牧人，他为了帮助患难的朋友，不惜作出自我牺牲。第三类题材是描写城市生活，特别是纽约及其曼哈顿的短篇。这类作品在欧·亨利的创作中，不仅数量多，而且也是其精华所在。他把曼哈顿大至上流社会、小至街道饭馆描写得十分逼真，因而有“曼哈顿的桂冠诗人”称誉。他针对当时一些作家认为组成纽约社会基础的是400个“上流人物”之论，特意将一个短篇小说集命名为《四百万》，声言真正受关注的应是400万纽约普通人。

欧·亨利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黄雀在后》、《最后一片叶子》等。其间同情歌颂普通人的处境及其善良品质，揭露鞭撻上层者的虚伪奸诈是其创作主基调。如《警察与赞美诗》这部描写“小人物”的著名短篇小说，写一流浪汉因无法生活去犯罪，希望能被捕入狱而避寒的故事，既表现了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又抨击了社会对小人物的冷酷无情与漠不关心。《最后一片叶子》描写几个穷困潦倒的画家相濡以沫的友情。破旧的艺术家的公寓楼上住着两个失业的女画家琼西和苏，琼西得了肺炎，苏尽心地护理着。琼西每天数着窗外长春藤的叶子，认定哪天叶子落光她也就必死无疑了。住在楼下的另一失业老画家得知此事后，雨夜爬上墙画了一片不会凋落的叶子。琼西发现了这一片永不凋落的叶子后，恢复了生活下去的信心，终于治好了病。可老画家却因雨夜爬墙得了急性肺炎而去世了。《黄雀在后》则对城市中的罪恶现象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揭露批判。它主要讲三个落魄的强盗、骗子、大市侩碰到一起的一次精彩“大合作”。强盗偷来一笔钱做本金开了一个赌馆，骗子在其赌牌上做记号将强盗的财产全骗了去，而骗子用这笔钱去买了金矿股票后，又被签署此股票的大市侩全掳走。这篇小说就是这样形象巧妙地说明市侩比骗子更狡猾，骗子又比强盗更厉害，从而概括嘲讽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

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名作，它主要描写的是一对贫穷的青年夫妇在圣诞节前夕互赠礼品的故事。丈夫杰姆有一块“三代祖传的金表”，妻子德拉有一头“小瀑布”似的秀发。而美中不足的是金表没有一条匹配的表链，秀发缺少一套贵重的发梳。可圣诞节是西方国家的一个传统节日，习惯上需要互赠礼品。在这节日之际，杰姆与德拉互相给对方送什么礼品好呢？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要为对方的“宝物”配上相应的饰物。但二人都又没钱，于是互相卖了宝物买礼物。小说详细地描写了这一过程，给人造成一种夫妻相见互赠礼物时一定会喜出望外、热烈拥抱的假象，但结局可想而知，宝物都不在了，要礼物还有何用！使读者在苦涩的惊愕后，不得不赞叹作者构思的精巧和意味深刻。宝物虽然没用了，但却是“麦琪的礼物”，是三位贤人——麦琪送给圣子耶稣的礼物，因而是最

圣洁的礼物。从而说明这一对穷困夫妻的感情是真挚的，各自都可以为对方献出“最宝贵的东西”。另外也表达了作者对穷困百姓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曲折指斥。

欧·亨利是美国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但又受到感伤主义和后浪漫主义的明显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在艺术方面有自己明显的特点。首先，他善于从平凡小事中发现不寻常的意味。如《麦琪的礼物》所描写的互送礼物这件小事，被作者写得激动人心，意味浓烈深长。《警察与赞美诗》也如此。其次，构思精巧，出人预料。如《警察与赞美诗》中，开头主人公设法想入狱入不了，可最后在他想重新做人的情况下，却出于误会被判入狱 3 个月。还有《麦琪的礼物》、《黄雀在后》等。再次，欧·亨利的小说善于用准确的细节描写来渲染气氛、刻画人物。如《忙碌的经纪人的浪漫史》中对交易所里紧张气氛的描绘。另外，欧·亨利小说语言幽默风趣又带嘲讽意味的特色表现得很明显。他能够通过生动的比喻及双关语、谐音词、旧典新意的运用等手法，将看似平常的事情描绘得妙趣横生、耐人寻味。如他描写大都市人物浮沉情况时说“这个城市像是一片没底的大流沙，不断地移动着他的砂粒，今天还在上层的砂粒，明天就沉沦到粘土污泥里去了”。他描写一个穷汉吃一顿免费饭菜时写道：“在敌人军马中杀开一条血路的英雄，都没有他这样勇敢。火鸡、肉排、汤、蔬菜、馅饼，一端到他面前就不见了。”欧·亨利通过他这种幽默的文笔，描绘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色人等，其作品被称为“美国生活幽默的百科全书”。

3. 杰克·伦敦及其《铁蹄》

杰克·伦敦（1876—1916）是美国进步文学的杰出代表，其《铁蹄》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作品。他出身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从小就从事体力劳动，曾干过童工、水手、铁路杂工等，后还流浪到阿拉斯加淘金，因得“坏血症”返回旧金山，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在政治思想方面，杰克·伦敦由于和下层劳动者关系亲密，所以倾向革命，90 年代加入美国社会党，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其间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和尼采等人的著作，使他既有社会主义思想，又受尼采超人哲学和“白人优越论”的明显影响。1913 年以后，杰克·伦敦政治热情转入消沉，讲求声色犬马，创作方面出现衰退倾向，粗制滥造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他于 1916 年退出社会党，最后因精神空虚而自杀。

杰克·伦敦是个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共写了 19 部长篇，150 多个短篇，3 个剧本，以及大量的随笔、特写和政论文。但他的创作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中前期。他早期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以理想化的创作手法，描写美国北方的某些传奇性生活。这些作品后被收入其短篇小说集《北方故事》。1903 年，他创作了中篇名作《野性的呼喊》，从而奠定了他文坛巨匠的地位。这

部小说是一部动物小说，它主要描写一只叫布克的狗被从城市卖到寒冷的北方后的曲折经历。布克的形象是强者和力量的化身，它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凶残动物的拼搏中，赢得了生存权利。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体现了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审美情趣。即一方面通过布克这一由狗变成狼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强者生存观念的推崇，另一方面当涉及到人的世界时，作者却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以强权为基础的关系。另外，他的特写集《深渊中的人们》（1903）对英国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工人进行了血泪控诉。

1905年至1910年是杰克·伦敦创作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由于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热诚信仰，所以其小说创作具有重大的社会主题和对当代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如他于190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铁蹄》是20世纪初美国进步文学的重要作品，他自己也成为美国最早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家。另外，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丁·伊登》（1909）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天大亮》（1910）和《月谷》（1913）两部长篇小说，则是他晚年思想消极、追求“世外桃源”思想的流露和反映。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社会小说代表作。它是主人公成名后自杀的故事，带有作者自传的性质。主人公马丁·伊登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水手，他爱上银行家的女儿罗斯后，在爱情鼓舞下发愤写作，立志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但他的稿件总是被退回，同时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士根本瞧不起他，罗斯的父亲也强迫其女与他解除婚约。正在马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的稿件被采用的通知到了，稿费和约稿信像雪片一样飞来，马丁成了一名大作家。这时，银行家把他的女儿送来，要求恢复婚约。可马丁觉得再也无法和好了，罗斯再也不是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而是一个浅薄庸俗的女人，于是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其间他虽然觉悟到银行家父女所看重的只是他的荣誉与财富，要想寻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谊，只有到广大劳动者中间去，可他是个人主义者，再也没有勇气回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所以他最后还是以自杀了结了一生。这部小说就是通过马丁·伊登的经历，形象的告诉人们，在美国，一个人成名的过程就是理想幻灭的过程。《马丁·伊登》这部小说也成为“美国理想”幻灭作品的先驱。

《铁蹄》作为美国第一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作品，它对美国工人运动作了很好的概括反映。当时美国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广大工农的迫害愈来愈烈，无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也更加波澜壮阔，工人阶级组织和政党也先后成立。如1876年成立了社会党，1897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1886年5月1日在工人组织和政党领导下，在几个大城市爆发了数十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运动，要求八小时工作日，最后取得了胜利，“五一”国际劳动节也由此而来。这些都在小说《铁蹄》里得到了形象地反映。

《铁蹄》是以革命领袖艾佛哈特与爱薇丝的爱情为引线，引出了对社会党领导下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描写。艾佛哈特是爱薇丝父亲——一个思想开明的教授的座上客，他对垄断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揭露，引起爱薇丝的注

意，爱薇丝并亲自做了调查，认为艾佛哈特讲得有道理，并产生了爱慕之情。接着，小说描写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写统治者对工人运动的破坏和镇压，写人民群众如何举行推翻美国资产阶级寡头政治——“铁蹄”的芝加哥武装起义等。另外，小说对革命派内部的斗争也进行了描写。一些人热衷于议会道路，以为靠选票能夺取政权。主人公艾佛哈特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认识到武装起义的必要性，于是组织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失败，“铁蹄”把他关入监狱，他在狱中又积极准备第二次起义。小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中断。

杰克·伦敦在《铁蹄》里指出了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指出其民主已为垄断资本的专政所代替，所以号召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预言要消灭法西斯主义，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但在具体描写中又夸大了英雄的作用，把艾佛哈特写成一个“超人”，他企图用恐怖手段来推翻“铁蹄”，在描写工人运动的组织参加者方面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铁蹄》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回忆者是爱薇丝，爱薇丝的手稿在她遇难前藏于洞中，几百年后才被人发现并公布。

